

马克思主义 文化研究



RESEARCH ON MARXIST CULTURE

2024年第2期

总第14期

张士海 程恩富◎主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 济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 2024 年. 第 2 期 : 总第 14 期 /
张士海, 程恩富主编. -- 济南 :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24.
9. -- ISBN 978-7-5607-8403-8
I. A811.67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第 20249V0H73 号

责任编辑 肖世伟
封面设计 王秋忆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24 年第 2 期,总第 14 期)
MAKESI ZHUYI WENHUA YANJIU (2024 NIAN DI 2 QI,ZONG DI 14 QI)

出版发行 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政编码 250100
发行热线 (0531)8836300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济南华林彩印有限公司
规 格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15.25 印张 322 千字
版 次 202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访 谈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本质特征及世界意义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王立胜研究员 韩玉洁/3

本刊特稿

评现代化迷思和单向虚无主义 张允熠/17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的传承 刘 仓/35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特质、科学内涵及时代价值 肖唤元 张茂杰/49

探赜“第二个结合”科学内涵的三重向度 杨海波 裴召杰/6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可能性分析

——以艾思奇《中庸观念的分析》为例 董起帆 董玉娴/73

“两个结合”的文化指向、方法依托和现实路径

——基于对毛泽东中西文化观的考察 戴一帆/84

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研究

留法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初步探索

..... 罗芳芳/101

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理论贡献及当代启示

..... 周永松/113

毛泽东传统文化观的多维审视	张 慧 张雅琪/128
红色日记中的自我革命思想及其对传统修身文化的继承与超越 ——以《人民日报》的“日记摘抄”为例	张会芸 王富羽/142
作为政治记忆与修辞的“延安”：改革开放初期的“延安”话语与党的建设	吴 昱/157
李大钊“第三新文明”思想的生成及其历史贡献	王 伟 邵明众/171

文化建设

论文化数字化建设的创新维度	肖 庆/187
生态纪录片中的中国生态正义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 ——基于《共同的家园》叙事分析	王 巍/197
“东方主义”的源头始于《波斯人》否?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	徐 振 庞楷奕/208

动 态

为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贡献学术力量 ——“习近平文化思想学术研讨会暨教育部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文化 理论发展研究’成果发布会”研讨述要	武文豪/223
论点摘编	/232



访 谈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本质特征及世界意义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王立胜研究员

韩玉洁*

【王立胜简介】王立胜，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历任中共山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中共潍坊市委副书记，中共昌乐县委副书记、县长，中共青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山东省援疆工作指挥部副总指挥、潍坊市副市长、山东省对口支援办公室副主任，中共喀什地区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喀什地区行署常务副专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院长。兼任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全国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等。多次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颁发的优秀对策奖、山东省人民政府颁发的优秀科研成果奖、全国党校系统优秀研究成果奖等。出版《晚年毛泽东的艰苦探索》《重新认识毛泽东》《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等专著十多部，主编《新中国哲学研究7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70年全景实录（1949—201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名家论丛》《中国政治经济学学术影响力评价报告》等著作十多部。近年来出版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初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探索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问题》《强国之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发展理念》《共同富裕》《读懂新发展阶段》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

* 韩玉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等全文转载。主要致力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疆问题、中国乡村振兴问题研究，着力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

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拓展和深化。”^① 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它是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理论来源于实践。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实践中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借鉴并吸取西方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将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规律性认识总结上升为一整套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虽然发轫于中国，但其实践意义具有全球性。针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本质特征及世界意义，访问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王立胜研究员。

访问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以全局视野、战略思维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形势，把握人民群众新期盼，明确提出了新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那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②。那么，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是什么？

王立胜：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期实践中所形成的智慧结晶，具有厚重的历史基础。

近代以来，中国历史面临两大基本问题：一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发展国家工业化。这两个基本问题是中国式现代化中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统一的实践过程。在历史实践中，这两个基本问题又演变为极其复杂的三个具体问题。

其一，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建立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实践基础上，在社会生活的整体上包含了多重特征。因此，中国在现代化实践中必然也要面临西方国家现代化的部分问题。这使中国现代化在实践中受到多维度力量非线性耦合的作用，该如何有效解决这种耦合所带来的问题和矛盾是中国式现代化必然面临的挑战。

其二，从西方现代性这一视角来看，西方现代性本身就存在着多重的内在矛

^①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8页。

盾,“三个主轴”的存在塑造了现代性矛盾多重的存在。“三个主轴”具体是指世俗趣味的高涨、工具理性的蔓延、个性表现的放纵。“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需要在世俗趣味、工具理性、个性表现三者之间寻求一种恰当的动态均衡。”^①然而,西方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却往往是这三种典型取向“不仅在骨子里有一种强烈的越界冲动,而且以各自的方式使这种越界冲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现实地彰显了出来。正因如此,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图景是一个包含着矛盾要素、衍生着剧烈逆向摩擦的分裂性图景”^②。

其三,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层面来看,一方面我们要不断推进高质量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积蓄深厚的物质力量;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进一步强化理性精神,防止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式现代化造成的消极影响,规避并努力解决现代化过程所面临的问题。

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两个基本问题及其所带来的三个方面的问题的存在,使我们的现代化发展不得不面临“选择的困惑和两难处境”:“经济上的平等与效率、高技术与适用技术、政治上的权威与民主、思想观念上的传统与现代化,以及涉及诸领域的商品经济与道德完善、历史与伦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等等,这一系列二律背反,使得我们的任何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都将可能以丧失某一方面为代价。”^③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过程就是解决上述两大基本问题及其带来的三个方面具体问题的过程。从1921年至今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三种道路的转换,因而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1921年到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中国选择的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但历史实践证明,这一现代化道路于中国是行不通的,也无法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和具体问题。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承担起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并带领中国人民进入早期现代化的探索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实现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体制,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基础。

第二,1949年到1978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始于对苏联的学习和模仿。然而,由于国情不同,苏联的现代化虽然具有借鉴意义,但同时也具有局限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具体问题。

第三,1978年到2012年。在这一阶段,中国通过自主探索现代化,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度提升,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于现代化的经济基础而言,

① 张风阳:《现代性的谱系》,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② 张风阳:《现代性的谱系》,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③ 何中华:《社会发展与现代性批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页。

中国已经实现了巨大跃升，但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选择的困惑和两难处境”，如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第四，2012年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完成了由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并开启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在这一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日益得到重视，党的十九大报告便明确规划，到2049年，我们要建成的现代化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意味着将对以往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系列现代性二律背反进行全面回应，并继续探索适应中国发展的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中国现代性。

回顾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历程，可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形成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个新道路成功实现了现代化发展，同时又避免了西方现代性弊端，创造了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①。这一论断意味着这一新的文明形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世界文明形态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而这一产生于中华文明基础上具有特殊性的现代化道路同时也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访问者：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您能否谈一谈二者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能否找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实践？

王立胜：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这种认识有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依据。

从概念来理解，物质文明是建立在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基础之上的。可以说，它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体现社会生产力发展进步的成果。精神文明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思想、道德和教育、科学、文化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能够为精神文明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精神文明形成于物质文明基础之上，也反过来对物质文明发展产生一定影响，二者统一于人类社会实践。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及它们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物质文明建设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前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支持推动现代化发展。为此，就必须重视物质文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要求在遵循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10页。

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前提下，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好宏观调控，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作用，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发挥国内国外两种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着力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

另一方面，精神文明建设反作用于物质文明发展，保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坚持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辩证法，尽可能地消除精神文明建设不足所带来的生产力发展不足问题。在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我们做到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事业日益繁荣。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倡导树立并积极践行正确的价值导向。始终坚持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相统一，坚持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相统一，早日实现共同富裕。从各个方面运用不同的措施，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丰富和高尚的精神生活的向往，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从实践来看，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这一相协调始终贯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进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辩证统一的思想已经萌芽。这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对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作用给予了同样的重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了物质与精神的协调发展对军队建设的重要性，他说：“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①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展了一系列的建设运动，努力提升社会的物质发展水平，加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毛泽东指出，对当前而言，“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②，这一任务十分重要和艰巨。党中央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提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和目标，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提出了两方面的任务：一是在全社会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二是贯彻“双百”方针，以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探索更具多元性、更具人类文明普遍意义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启了通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8页。

调发展以建设现代化的新的实践。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发展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提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①，强调落实“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同时，党的十六大、十七大详细部署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目标，将社会生产力发展与民族文明素质提升相结合，将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相统一，努力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总结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之一，努力建设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在精神文明建设层面，强调提升国民文化素质，丰富人民精神生活，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增强国家精神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开拓进取的主动精神。在物质文明建设层面，强调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建设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②

访问者：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除了从内在的角度理解其本质特征外，从外在的、人类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共性与个性特征是什么？其具体表现有哪些？

王立胜：从人类现代化发展的共性与个性的角度看，共性是指在发展中形成的与西方现代化相同或类似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经济高度发展。无论是西方现代化还是中国式现代化，都是以工业化发展推动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中国的工业化开始于 19 世纪 60 年代为应对资本主义列强而开办的机器工业。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的现代化在党的领导下曲折开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有了稳定的政治环境。三大改造完成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标志着社会主义现代化顺利推进。改革开放后，党领导人民坚持解放生产力，不断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实力显著增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济基础愈发雄厚。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实现了高质量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翻倍增长。当前，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达 18.5%，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到 81000 元；谷物总产量稳居世界首位，十四亿多人的粮食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城镇化率达到 64.7%；制造业规模、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08 页。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147 页。

其二，社会现代化。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推进现代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中国拥有比所有发达国家加起来还要多的人口，在中国推进现代化，属实是人类历史的壮举。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为目标，带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同时，推动城乡平衡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城乡居民住房条件明显改善，“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①。

其三，人的现代化发展。当前，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人的现代性发展获得了巨大的提升。人的现代化主要体现在科学文化知识、理想与进取精神、现代人格和道德建设等方面，具体表现为社会公共道德建设不断完善，人民精神境界不断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得到提升，全体公民的科学知识文化水平得到整体提升，人们的理想追求和进取精神得到激发。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的现代化、精神的现代化，最根本的是人的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任何时候都要以人的现代化发展为本。

基于各国国情、现代化发展的条件等的不同，各国的现代化都具有不同的特征。把握现代化，重要之处在于认识现代化的个性。中国式现代化的个性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从建设内容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个性表现为“五位一体”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② 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物质层面带动的现代化，而且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等各个方面协同发展的现代化。

从保障层面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个性表现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的领导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正是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探索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在未来的发展中，只有继续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继续前进。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9页。

^② 参见《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8～19页。

提供了全新选择。”^①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使党始终成为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方向,确保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政治凝聚力、发展自信心,集聚起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磅礴力量”^②。

从本质特征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个性表现为坚持人民至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③。现代化的落脚点是不是人,决定了这种现代化是不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以人为根本,有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根据。根据历史唯物主义,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生产力中最具创造性的力量。对人在现代化发展中力量的激发的程度,决定了现代化推进的程度,而保证人的发展与社会现代化发展水平之间的平衡,则决定了现代化的类型。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核心,造成了见“物”不见“人”的发展状况,也引发了西方现代化发展不可调和的矛盾。与西方现代化相比,中国式现代化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人的解放而不断发展。

访问者:刚才的谈话中您多次提到西方现代化,那么您如何看待西方现代化?西方现代化产生的文明基础是什么?其造成的人类现代化发展的困境是什么?

王立胜:西方现代化建立在工业发展的基础上。这种现代化产生的文明基础是西方文明,西方文明的核心是西方中心主义。

历史地看,古希腊时期智者们的唯我主义和中心主义奠定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基础。这在古希腊政治家伊索克拉底与其统治者腓力的对话中可以得到印证:“说服可用于希腊人,强迫可用于蛮族人。”^④古希腊统治者将缔造“希腊帝国”这一具有强大统摄力的中心帝国作为一生追求,这一政治追求也塑造了“泛希腊化”的文明论调。无独有偶,亚里士多德也将同样的信念输送给亚历山大大帝,提倡以希腊种姓来治理世界上其他所有民族,也因此产生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中心主义”政治论调。

古希腊虽然已经产生中心主义的政治论调,但却尚不具备全球性传播和实施政治统治的现实基础。这一问题到罗马时期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变化。罗马塑造了以地中海为中心具有非凡政治影响力的庞大帝国,这一帝国的诞生意味着西方文明世界影响的开始。这也意味着,西方中心主义获得了对外传播和统治的物质和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4页。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2页。

③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6页。

④ [古希腊]伊索克拉底:《致腓力辞》,《古希腊演说辞全集·伊索克拉底卷》,李永斌译注,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版,第122页。

空间条件。同时，当基督教教义在罗马被接纳以后，西方中心主义在宗教信仰的加持下赢得了更广泛的传播机会。

自此以后，基督教体系和古希腊哲学在融合发展中实现了“互利共赢”。一方面，基督教信仰体系借助古希腊哲学的理性精神，论证了自身的合法性，加深了宗教信仰的世俗基础，从而也实现了宗教精神对西方文明的影响。另一方面，古希腊哲学借助宗教教义的传播实现的自身的广泛传播，体现为所谓“普世价值”在西方文明内容中的产生。借助这一融合发展，西方文明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地位得以确立，从而使西方中心主义价值预设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传播。在西方中心主义价值的指导下，西方中心主义的政治实践逐渐得以实施，并由此造成了更大范围的殖民扩张。

在经历了中世纪漫长的神权的发展阶段以后，西方文明最终借助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以现代工业文明的样态完成了世俗化改革。在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的现代理性的发展之后，现代文明成功延续了基督教绝对同一的教义精神以及古典形而上学理性主义的内核，这从内在进一步强化了西方文明主张“一”反对“多”的观念。这一观念在工业革命的大背景下获得了物质上发展的基础。借助资本主义逻辑和殖民统治，西方中心主义实现了现实发展，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反过来也得到了进一步巩固。由此，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内核的西方现代化在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牢固的中心观念以及资本逻辑主导下发展的叙事模式逐渐形成。

西方文明虽然在科技进步、社会变革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其文明中心主义所产生的殖民主义却对其他文明造成了巨大冲击和影响，在这一文明中心主义的主导下，西方现代化本身也面临着诸多困境。

文明中心主义主张以自身为模板的“同一”观念，其结果是文明冲突。随着世界范围内现代化的推进，各国自主发展现代化的需求受到了文明中心主义和中心论的阻碍，并由此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现代化发展的诸多矛盾。西方中心主义在现代的核心表现为中心主义价值理念和所谓“普世主义”精神。在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的主导下，西方的现代化不断向着将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西方化”“同质化”的方向发展。例如，亨廷顿就认为：“文明之间最引人注目的和最重要的交往是来自一个文明的人战胜、消灭或征服来自另一个文明的人。”^①这是由文明中心主义导致的文明冲突论，然而这种观点却并非个例。在这些观点之下，世界范围内文明体之间的观念和力量的冲突被看作天然的存在，并塑造了“文明发展必然导致矛盾，只有‘同一’才能避免矛盾”的观念。由此，基于不同文明观念而产生的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世界范围内

^① [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的冲突频频爆发，波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以后，秩序平衡被打破，文明的冲突更具条件。这表现为除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冲突之外，更深层次的冲突在于不同文明传统与西方文明传统的碰撞和矛盾。

如果只从贸易、产业发展、旅游通信等经济方面来看，世界各国和不同地区仿佛存在着广泛合作，但若深究其内部，在不同领域的合作背后是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对其他文明的征服，是西方文化对其他文化的霸权，甚至在理性合作的背后也往往隐藏着一些“阴谋”和“诡计”。因此，从当前来看，西方现代化的确带来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但却永远无法克服内在“中心主义”所造成的广泛的冲突，进而影响合作的悲剧。

访问者：确实，从西方现代化的文明基础来看，西方现代化已经展现出了不适于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部分。那么回看中国式现代化，您认为对于人类文明发展而言，其理论基础及世界意义是什么？

王立胜：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产生于中国现代化实践，是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但从人类现代化视野来看，这一理论同样具有深刻的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丰富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解释模式。与西方学者提出的现代化理论相比，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虽然也承认现代化是解释世界历史发展的核心范畴，但却赋予现代化以独特内涵，从而丰富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解释模式。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产生于走自己的路、建设自己的现代化的实践之中，因而以承认道路和理论的多样化解为前提。2016年，习近平主席在埃及开罗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中指出：“现代化不是单选题。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① 尽管现代化最初开始于西方，世界秩序最早建立于西方现代化所主导的工业文明基础之上，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不同文明的现代化必须要适应西方现代化的发展，只能走西方现代化道路。因而，基于不同的现代化发展样式，总结和解释不同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对人类文明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前提，倡导不同国家和平竞争、互利共赢实现现代化，同时明确反对武力侵略、霸权主义和殖民政治，强调以“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发展姿态在合作共赢中谋求现代化的共同进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世界历史意义恰恰在于其打破了以往学界对现代化的刻板理解和垄断性解释，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藩篱，开创了兼容并包、共同发展的现代化发展新理念，从而丰富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解释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改变世界提供了全新的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成果。这一理论秉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

^①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372页。

方法论，坚持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相结合，是产生于中国现代化道路基础之上、同样适用于其他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理论。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不仅是能够改变中国的道路，也是一条能够改变世界的发展道路。西方国家现代化始终伴随着武力压迫和殖民战争，始终以牺牲其他民族的利益为代价，而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西方现代化的道路相比，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总结出的这条道路在政治上坚持国家平等，反对殖民战争和殖民统治，在生态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反对牺牲自然、破坏生态，是一条兼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总结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率先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进而改变世界经济布局和发展重心，增强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兼顾各国国情的不同和人类文明的多样性，能够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指导。党的二十大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①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要求。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在实践中丰富了人类文明发展形态，促成了人类文明多样化发展，更在理论上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之所以能在人类文明发展问题上交出一份中国答卷，恰恰在于中国式现代化在观念理解 and 实践方式上与西方现代化截然不同。西方现代化理论以西方中心主义为核心，其理论视域是十分狭窄的，是以经济现代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而中国式现代化指涉广泛，涵盖从政治、经济等到人的现代化，不仅扩大了现代化的范围，更扩大了现代化的内涵，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向度。现代化的本质是推动社会制度、文化理念和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通过科技进步和全球化的互动，推动社会朝着更为先进、开放、包容的方向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人类提供了一种从空间和内涵上追求全方位繁荣的现代化新思路。这一理论不仅促进了中国的崛起，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贡献了智慧力量。

新航路开辟以及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历史翻开新的篇章，由此，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为人类改变世界提供了理论指导，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路向。以上现实充分说明，中国式现代化关注的对象不只局限在中国一国范围之内，更辐射整个世界以及人类文明。正是基于这一前提，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才能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可靠的理论视域，中国式现代化才能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可供选择的道路。

[责任编辑：杨鹏]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0页。



本刊特稿

评现代化迷思和单向虚无主义

张允熠*

【摘要】中国近代是被动地卷入现代化浪潮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进程中不期酿成了一个西化运动。西化运动作为一种文化思潮从“西化”汉语言文字肇始，有人分不清“向西方学习”与“西化运动”之间的本质差异，以至于跌入现代化的迷思陷阱。把“西化”思潮推向高潮始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西化派，他们大都有着朴学背景，激进反传统和激进西方化的言论折射出中国的部分知识精英对于在中国实行现代化变革怀有一种急切的诉求。由于理论和实践的局限，他们误入了认知盲区，把“全盘西化”解释为“充分现代化”，将人们带进了“现代化”的迷局。“全盘西化”的实质是单向虚无主义，走出现代化的迷思势必要拒绝虚无，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关键词】西方化；现代化；虚无主义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西方化”（以下简称“西化”）是“现代化”的代名词，“全盘西化”就被解释为“充分现代化”。现代化实非“西化”，现代性也不能完全等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这已成为学界共识，本文不拟赘述。我们只就近现代以来中国的部分知识精英深陷于“西化”泥淖不能自拔、长期沉湎于现代化迷思和虚无主义窘境而不自知以致无法正确认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价值而丧失民族精神的现象给予批判总结，反思这一负面经验，吸取其教训，这对于当前彰显文化自信、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启示价值和理论意义。

一、“向西方学习”与“西化运动”

20 世纪 30 年代，历史学家蒋廷黻写道：“在东方这个世界里，中国是领袖，

* 张允熠，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西文化交流。

是老大哥，我们以大哥自居，他国连日本在内，也承认我们的优越地位。到了19世纪，来和我们打麻烦的不是我们东方世界里的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①早在蒋廷黻说这段话之前，梁启超也有过类似论述：“原来中国几千年来所接触者，除印度外，都是文化低下的民族，因此觉得学问为中国所独有。‘西学’名目，实自耶稣教会入来所创始。”^②这反映了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由于中国长期处于文化优越势位，偶遇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外来“蛮夷”，心理上出现了严重的不适应和失衡感。

实际上，西方是在经历了长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巨大变革后才嬗变出现代文明，相比之下，中国延续数千年来的农耕社会没有发生质变。15—17世纪是西方大踏步超越中国的时代。正当明王朝实行海禁之时，哥伦布的航船扬帆破浪向“新大陆”进逼；正当中国明代王阳明心学流行之时，西方出现了哥白尼天文学；正当中国清代考据学如日中天之时，西方诞生了牛顿经典力学……这些历史和时代的错位最终造成文明发展程度的巨大落差。因此，在跟西方工业文明的角力中，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下，中国人的“上国”心态受到极大冲击，传统的“夷夏大防”被剧烈摇撼，“西化”思潮自此萌生。

同面对西方文明而惊慌失措的人相反，先进中国人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应当向西方学习。早在明万历年间，徐光启就提出了对待“西学”应当“会通”“超胜”的主张。“会通”包含着通晓吸收西学的意蕴，“超胜”则表达了对自我文化的信念。徐光启还说“会通之前，先须翻译”^③，翻译是学习和研究西学的必由途径，也是会通与超胜西学的初始化阶段。清代中前期的开明士人基本上都持同徐光启相似的观点，如王锡阐试图寻找“贯通中西之术……能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④；梅文鼎主张中西之学“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毋拘名相，而取其精粹”^⑤；等等。这是一种合乎理性的中西文化观，至今仍具有借鉴价值。

中国近代是被动地卷入现代化浪潮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进程中不期酿造了一场西化运动。当徐光启提出“会通与超胜”200余年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这促使魏源产生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想法。不难发现，“师夷”有“会通”的痕迹，“制夷”有“超胜”影子。然而魏源的提法则更直接、更激进，思路同徐光启一脉相承。“师夷”是“以夷为师”——这在“夷夏大防”的思想传统中是一种破天荒的提法，它揭开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序幕。大幕背后不光有西方的“长技”，还有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人文、哲学、艺术、社会

①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

③（明）徐光启：《徐光启集》，王重民辑校，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74页。

④（清）阮元：《薛凤祚》，《畴人传》第36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449～450页。

⑤（清）梅文鼎：《梅文鼎全集》第5册，韩琦整理，黄山书社2019年版，第202～203页。

科学和政治制度——这些具有“现代性”的新事物在中国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激发出中西文化之间的“体用”之争。延至戊戌变法时期，在康有为向光绪皇帝的献策中，他从西方搬来的不再是早期西学中的天文历法和鸦片战争时期的西方“长技”了，而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法治和君主立宪的国体政体。孙中山认为，康有为和梁启超主张的改制过分保守，因而不合时宜，应当效法1848年欧洲革命推翻封建专制，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即世界性的现代化洪流。于是，“师夷之长技”变为“师夷之国体”；“西学”不能只取其“西用”，还要取其“西体”——此即为“西化”，时人亦称“欧化”。

“西化”（Westernization）作为一个名词，原由日本引入，本来表示一个在特定时空条件下一种存在对另一时空实体的复制存在，实际上指的是对西方现代化（Modernization）或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社会实体的翻版——日本就是现成的案例。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世界上最早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作为现代化的样板，它使19世纪末开始实行工业化改革的日本社会把符合西方标准的文化、经济、科技、政治样态统称为“西化”。“西化”（Westernize）也是一个动词，意含一个动态过程，这一过程是使一种社会实体向另一种社会实体转型的现在进行式，即现代化（Modernize）运动，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这样一种运动。在19世纪末的日本和20世纪初的中国，大家都把“西化”或“欧化”完全等同于现代化，即认为凡符合西方标准的就一定是现代性的，凡实现了现代化的必然是符合西方标准的——至今仍有人深深误入这种盲区而不自知。

在中国，西化运动作为一种文化思潮滥觞于“西化”汉语言文字。清末即20世纪开始的最初十年，思想文化界发生了一场“国粹派”与“欧化派”因“万国新语”而引发的论争，争论的焦点是汉语的存与废，当时无论是“国粹派”还是“欧化派”，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所谓“万国新语”，指当时由波兰人柴门霍夫创造的“世界语”（Esperanto）。1907年，旅居巴黎的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在他们创办的无政府主义期刊《新世纪》上发表文章，首次提出要废除汉字改用“万国新语”。吴稚晖说：“中国略有野蛮之符号，中国尚未有文字，万国新语便是中国之文字。”^①把中国文字说成是“野蛮人的符号”，这反映出当时一批决意欧化的中国人已经完全丧失了文化自信心。需要指出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值欧洲种族主义甚嚣尘上之时，这批“《新世纪》人”对号入座，自认“劣等民族”，暴露了他们患有一种心理上的“种族自卑症”。

吴稚晖和“《新世纪》人”的主张一出就遭到了当时国粹派首领章太炎的迎头痛击。章太炎认为，汉字汉语确有一些需要改革的问题，如中国方言差异太大，方言使用实有不便。但是，汉语方言差距再大，本是同根，若以“万国新

^① 吴稚晖：《新语问题之杂答》，《新世纪》第44号，1908年4月25日。

语”来取代汉语，这不仅是文字书写问题，还有语言的发音问题，不仅书写而且说话都要用外来的“万国新语”，势必“南北互输，孰难孰易”^①？与其这样，还不如全国各地都学“官音”（普通话）。吴稚晖则坚持认为，语言不仅是个发音问题，文字本身负载着文明，中国欲要融入世界文明，就不能不用文明的西文来取代野蛮的中文，“新字眼”代表着“新文明”。这就涉及中文当不当废、国粹能不能保的大问题了。在章太炎看来，那伙主张汉字“以象形字为未开化人之用”为由提出应当废除汉语改用“万国新语”的学者，实为“好尚奇觚，震慑于白人侈大之言，外务名誉，不暇问其中失所在”^②，其不智之举甚明。他说，所谓“万国新语”，其实就是以欧洲白种人的语言为标准，那种旨在统一欧洲内部、独在欧洲使用的人造语言，如何能拿来通行世界呢？再说，文字有象形、拼音（合音）之别，并无优劣高下之分。如今要废弃母语，代之以“万国新语”，这纯为舍本逐末之举。学术探索的目的就是要深究字义，越是深奥精细的概念和用语，越要用原文字，否则就很难使文意畅达。章太炎说，眼下这一批无政府主义者的政治口号是“废除强权”，可是政治强权未废，中国学术先亡了：“盖跣趾以适履者，工之愚也；戕杞柳以为杯棬者，事之贼也。”^③

章太炎在同吴稚晖等人论战时，不免也表现出一种文化保守的心态，如他指责《新世纪》的学人：“诸子在巴黎，习用铅笔，则言铅笔之善，向若漂流绝域，与赤黑人相处，其不谓芦荟叶胜于竹纸者几希！”^④在章太炎的眼中，无论是现代文明的欧洲还是原始部落的非洲，相对中华文明，皆归“野者”，其骨子里透露出一种华夏文明优越的情结甚至种族主义偏见。他总结道：“趋时之士，冥行盲步，以逐文明，乃往往得其最野者，亦何可胜道哉？”^⑤从总体上看，章太炎的驳论没有一味情绪化地去批驳论敌，而是较多地从学理上做了探讨，应该说是切中要害的。贬中国为“野蛮之邦”，奉西方为“文明世界”，幻想像日本一样“脱亚入欧”，“新世存纪派”是第一个这样的知识群体。

有人认为晚清的洋务派已开西化运动的先河——“洋务运动”（Westernization Movement），英译文即“西化运动”。蒋廷黻在谈到当年李鸿章筹办海军的艰难程度时就对洋务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写道：“近代化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⑥“全盘接受西洋文化”像日本那样“脱亚入欧”，这绝非李鸿章和洋务派的宗旨，而只是蒋廷黻

① 《章太炎全集》第8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55页。

② 《章太炎全集》第8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53页。

③ 《章太炎全集》第8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60页。

④ 《章太炎全集》第8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69页。

⑤ 《章太炎全集》第8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69页。

⑥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49～50页。

个人想法。清末“数千年未见之大变局”让李鸿章万分惊恐，也让整个中国知识界无比震撼，在西方现代化成果的强烈刺激下，近代一切关于中国或维新或改革或革命的所有话题，以及所有关于中国前途、命运和“向何处去”的讨论，都是在中西碰撞的大背景下展开的，都离不开“向西方学习”“拜西方为师”的话题。不过，有人分不清“向西方学习”与“西化运动”之间的本质差异，以至于跌入现代化的迷思陷阱。

二、从“朴学”情结到“西化派”

把“西化”思潮推向高潮，并使之渗入新一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之中的历史契机是新文化运动，这一运动的主力是“新文化人物”——时人又称为“西化派”的一群知识精英。在人们的心目中，陈独秀就是激进西化派的代表人物。在贬损民族文化方面，陈独秀与吴稚晖等人相比难分轩輊。吴稚晖不仅提出要废除汉语言文字而改学“万国新语”，而且对中华传统文化竭尽谩骂之能事，如“这国故的臭东西……非再把他丢在毛厕里三十年”^①。陈独秀也说：“中国文字，既难转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②

但陈独秀比吴稚晖稍有不同。他提出废除汉字后“改用罗马字母书之”^③，即废字存语（音），吴稚晖要求改学“万国新语”，是音字皆废。陈独秀深知中国偌大的国家，人口众多，方言多如牛毛，要把汉语一下子全废掉，实属不可能。汉字罗马化（拉丁化）不失为一条可以探索的拼音化道路，但全部采用字母文字来表意，必将丢失大量的文化记忆和民族智慧。所以新中国成立后采用一套汉语拼音方案，同时又推行了一批简化汉字，实践证明是一种成功的尝试。虽然陈独秀比吴稚晖似乎理智一些，但梁漱溟却认为他是一个“主张西方化主张到家”^④的人，换言之，是彻底的西化派。

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和现代新儒学的开创者，梁漱溟对陈独秀的评价并无贬义。新儒家的宗旨是“民主开出新外王”，几代新儒家对西方的科学、民主价值观都持认同态度，这是他们与清末文化保守者最大的不同之处。“主张西方化主张到家”一句，因系演讲记录，纯为一种口语表达方式，实指一种彻底的西化主张。梁漱溟自从读过陈独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后难掩钦佩之情，他认为从前讲西化的人都是“不中不西的人，说许多不中不西的话，做许多不中不西的事”^⑤，只是些“枝枝节节”“零零碎碎”的“西化”，唯有陈独秀才是真正“主

① 张君勱等：《科学与人生观》，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303页。

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63页。

③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63页。

④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34页。

⑤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34页。

张西方化主张到家”的第一人。陈独秀为了给中国人启蒙从西方请来了两位先生，即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这两位先生恰是西方近代以来现代性的精神标识。陈独秀发誓说：“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①为了“西化”不是壮士断腕，而是“断头流血”——这种决意西化的勇气和担当，还不是“到家”了吗？

人们对激烈要求废除汉字的钱玄同深表不满，陈独秀却为他辩护，并质问道：“难道你们能断定汉文是永远没有废去的日子吗？”^②作为章太炎门生的钱玄同，当年《新世纪》一批人提出要废除中国语言文字改学“万国新语”时，他是站在其师的立场上持反对态度的。在钱玄同眼里，章太炎属于“国粹”派，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则是“全盘承受欧化”派。钱玄同回忆说：“我那时对于《新世纪》的其他主张，反对的很多；但稚晖先生用秽褻字样丑诋满廷，却增加了我对于满廷轻蔑鄙夷之心不少。丙派和甲派的主张，在排满问题上毫无不同；惟有绝对相反之一点，甲派怀旧之念甚重，主张保存国粹，宣扬国光，丙派则对于旧的一切绝对排斥，主张将欧化‘全盘承受’。太炎先生可作甲派的代表，稚晖先生可作丙派的代表。”^③不料后来钱玄同接受了吴稚晖的影响，一转身倒向了西化派，不但举起了“尤不可不先废汉文”^④的旗帜，而且大骂“中国文字，自来即专用于发挥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故”^⑤。这种激越过火的言词，不仅招致一班守旧人士的怒斥，即便连一般国人也难以接受。

有必要指出的是，民族主义始终是一个纠缠于中国知识群体心理中的矛盾情结。作为同盟会元老的章太炎和吴稚晖，本来都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章太炎曾骂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吴稚晖每提到清廷更是脏话连篇，在排满的民族立场上他们并无二致。钱玄同在日本留学时，日本称中国为“清国”，寄往中国的家信地址上不准写“中国”而一定要写“清国”两字，他断然拒绝，于是改写成“支那”（China的音译词）两字。“支那”在日本人那里是带有侮辱性的称号，旅日中国人忌用这一名称，钱玄同却说：“我宁可用他们认为轻蔑的‘支那’二字；因为我的的确确是支那国人，的确确不是清国人。”^⑥难以想象，这么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后来在“西化”路上却义无反顾。钱玄同的老师章太炎既排满又反“欧化”，甚至认为“欧化”之举与“排满”宗旨相悖，如他说：“国粹日微，欧化浸炽。穰穰众生，渐离其本。重以科举，驱策人心，排满宗旨，如何可达？”^⑦相较之下，吴稚晖独排“满夷”不排“西夷”。在他看来，前者是

① 《陈独秀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62页。

② 《陈独秀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62页。

③ 沈永宝编：《钱玄同五四时期言论集》，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302页。

④ 沈永宝编：《钱玄同五四时期言论集》，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63页。

⑤ 沈永宝编：《钱玄同五四时期言论集》，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64页。

⑥ 沈永宝编：《钱玄同五四时期言论集》，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303页。

⑦ 《章太炎全集》第1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0页。

最野蛮最落后的民族，后者是世界上最现代最文明的民族。他以中国被一个野蛮落后民族统治了 260 多年为耻，以尊崇现代文明的西方民族为荣——这就是困扰激进西化派文化心理的民族主义怪圈。

在蔡元培聘任陈独秀、胡适之等新文化人物执教北大之前，以林纾为代表的桐城派文人占据上风。随着林纾出走北大，西化派成为北大的思想主流。有一奇异人文景观出现：在竭力鼓吹“新文化”和“西化”的队列中，多数人怀有浓厚的朴学情结，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毛子水等人，基本上都是章太炎的及门弟子或私淑弟子，连坚决反对写白话文的章太炎的嫡派传人黄侃也执教于北大文科。即使章太炎的同辈人如蔡元培、吴稚晖等人，以及同章门并无学脉渊源的晚辈如胡适等人，也无不有着朴学背景。胡适晚年在台湾招致围攻，李敖本来想为他解围，撰文肯定了他在五四文学革命中提倡写白话文的贡献，但接着笔锋一转，却批评他在学术上“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①，这种批评对胡适来说可谓一针见血。不唯胡适如此，五四时期几乎所有的新文化人物都割不断朴学这根思想脐带。为何朴学出身的人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骨干力量且最后都热衷于西化运动呢？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朴学肇始于清代经学的复兴。顾炎武于明清交替之际鼓吹“理学即经学”，或“经学即汉学”，于是汉学复兴，乾嘉时期达到鼎盛，戴震集朴学之大成。梁启超指出：“戴震全属西洋思想，而必自谓出孔子。”^②说戴震的学术成就全部来源于西学，虽有夸张之嫌，但并非毫无根据。晚明西方耶稣会士引介的西方哲学、逻辑学、数学和天文历算等自然科学，作为传教工具，至清代雍正年间全面禁教后影响式微，但其遗绪仍为一些中国学者所器重。至乾嘉年间，不仅梅文鼎在研探西学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数学体系，戴震也把归纳逻辑的推理之法用于其对《水经注》的考辨之中。尤其戴震《策算》一书可谓中西数学融通的代表性专著；戴震在讲授《观象授时》一书时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新的天文历算知识，在中国无疑是非常前卫的。然而，戴震却又是清代宣扬“西学中源”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包括他的弟子阮元，也极力鼓吹“西学中源”说，此说蔓延至晚清。

如果“西学中源”说出于顽固保守派，易理解；然而这种理论却为深谙“西洋思想”的戴震所倚重，似乎难以理解。但如果放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作具体分析，就会对戴震的“西学中源”说持有一种同情的理解。首先，“西学中源”的提倡者是康熙皇帝，作为乾隆朝被官方重用的学者，戴震不可能与先皇帝反向而行。其次，康熙皇帝是一位终生热爱西学、钻研西学的君主，他提出“西学中源”的本意却非出于贬低或抵制西学，相反，这是在肯定西学与中学原本同根同源之时欲进一步接近西学。再次，“西学中源”说为西学融入中国思想境域

① 李敖：《播种者胡适》，《当代青年研究》1989年第3期。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0页。

提供了一个精神管道和切磋平台，客观上打破了自古以来“华夷二分”“汉胡不两立”的二元壁垒，为近代“援西入中”和“中西会通”打开了一个缺口，其积极意义和正面作用不言而喻。更重要的是，戴震不仅是一位考据大师，而且是一位启蒙主义思想家，他的《孟子字义疏证》标志着18世纪中国民主主义思想的萌芽。我们从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之、鲁迅、周作人等人反对封建专制、提倡个性自由、要求妇女解放的战斗檄文中，能清晰地看到《孟子字义疏证》痛斥宋儒“以理杀人”的反理学的影响。最后，可以说戴震是中国近代之前最接近西方启蒙主义思潮的人，而陈独秀从西方请来的“德”（民主）、“赛”（科学）两位先生，可视为当年朴学大师戴震的启蒙和科学意识在20世纪的延伸与弘扬。

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没有断绝其形成于本土的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而是以这个传统为根基去接受具有现代性的西方文化。我们不能说戴震开创的朴学是五四时期西化派们的精神和学术坟典，但清代的朴学及其后学们在数百年来中西学之间确实开凿了一个通道，无论是他们打出“西学中源”的旗号，还是他们推崇“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都拉近了中学与西学之间的距离，成为“向西方学习”的时代需求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隐曲表达。可见，五四时期新文化人物激进反传统和激进西化的言论折射出部分中国知识精英对在中国实行现代化变革中怀有一种急切的诉求，然而由于理论和实践的局限，他们误入了“西方化=现代化”的认知盲区。

三、“全盘西化”及其批判

新文化运动时期西化派开始形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重要的派别，“三分天下居其一”。五四之后西化派产生了分化，其中部分骨干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而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与西化自由主义派分道扬镳。自由派的领头羊胡适在文化观上褒西贬中，认为“西洋近代的文化真是精神的文化。我们还可以大胆地说：在世界上最唯物的、最下流的文化之中，中国文化要算数一数二的了”^①。他完全不赞成梁启超、杜亚泉等人关于所谓“东西文明”孰优孰劣的分析，认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没有共同的标准，如果要有，那就是“凡能运用人的心思智慧，来打破物质的限制拘束，来征服或改造物质的环境的，那就是精神的文明。凡受物质的环境束缚，不能用智力来征服改善它，只能逆来顺受，自安于现状，而用‘乐天’、‘安命’、‘知足’等等好听的名词来自慰自欺的，那就是唯物的文明”^②。“唯物的文明”或曰“物质主义”——这在胡适那里

① 胡适：《西洋文明的本质：胡适讲西学》，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

② 胡适：《西洋文明的本质：胡适讲西学》，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

是一个贬义词，即恩格斯所指出的那种“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贪吃、酗酒、娱目、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简言之，即他本人暗中迷恋着的一切齷齪行为”^①的庸人唯物主义。在胡适眼里，“中国文化——中国人”的本色就是这个样子的，直至他生前所做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中，仍然刻意贬低中国文化，以至于对胡适一向敬重的徐复观也忍无可忍。徐复观痛斥胡适是“以一切下流的辞句来诬蔑中国文化，诬蔑东方文化……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东方人的耻辱”^②。不久，胡适就在一片争议声中惨然离世。

早在1929年，胡适在《中国基督教年鉴》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的短文，由于是英文，在国内没有产生影响。6年后（1935年），他以《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为题公开刊文于天津《大公报》，这才引起人们注意。胡适在这篇文章中否定了应在中西文化间选择折中的意见，旗帜鲜明地支持“全盘西化”的主张，以便让中国“一心一意的现代化”、“全力的现代化”或“充分的现代化”，等等。^③“全盘西化”的字面含义不但是百分之百量的增长，而且也是百分之百质的嬗变。难以想象，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五千年文明被百分之百的“西化”所取代！胡适辩解道：“所以我不曾特别声明‘全盘’的意义不过是‘充分’而已，不应该拘泥作百分之百的数量的解释。”^④胡适把“西化”等同于“现代化”，把“全盘西化”解释为“充分现代化”，又否认“全盘”有“数量”的意义，从而将人们带进了“西化”等于“现代化”的迷局。

虽然当时西方依靠工业革命和科技创新已经领先世界潮流二百年，可以代表现代化发展的最高水平，但是“全盘西化”毕竟触及了不同民族心理的敏感畛域，这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问题，关乎一种文化生命有可能被另一种文化机体吞噬的存亡问题，因而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警惕的问题。而“充分现代化”就不同了。现代化是一个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目标，有着一系列可以从质和量上品衡的指标，各国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制定具体的发展指标，别国可以参照，没有义务和责任必须照搬和套用。“现代化”的提法之所以能被人们接受，是因为任何传统都要走向现代，任何现代都由传统进化而来，世界上没有完全离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也没有绝对排斥现代化的传统文化。胡适把“全盘西化”改为“充分现代化”或“充分世界化”毕竟只是一种文字游戏，这种游戏制造了百年的现代化迷思。

不过，在中文语境中最早公开提出“全盘西化”的人并不是胡适，而是陈序经。陈序经于1930年写成了《东西文化观》，1931年修改后以《中国文化的出路》为名出版。他在书中明确表示研究东西方文化就是要给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9页。

② 沈卫威：《晚年胡适与蒋介石的矛盾与冲突》，《江淮文史》1994年第3期。

③ 参见《胡适全集》第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84～587页。

④ 《胡适全集》第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85页。

寻求一条出路，并把自五四以来关心中国文化前途的人分为三个派别：一是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二是主张复返中国固有文化，三是主张折中办法的。他对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提出以后的所有中西文化观的代表人物逐一批判：张之洞的理论已经成为历史“陈迹”，没有人再讲；辜鸿铭、梁漱溟是复古派的代表；李大钊的“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①的说法“不妥当”，“也是一个大错误”^②；杜亚泉所说“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③，“是心理变态的东方人的自慰话，这是东方人的夸大狂”^④！陈序经推崇现代西方文化，他认为这种文化的特质是中国固有文化所没有的，西方近代以前的文化中也没有，唯独“现代西洋文化”才具备。“全盘西化”就是要在“中国全盘实行这种‘现代西洋文化’”，“全盘西化”不仅要改变中华文化的固有样式，而且要大力提倡西方现代文化的核心——个人主义，因为“这种个人主义，又是西洋近代文化的主力”^⑤。陈序经对吴稚晖、钱玄同、林语堂等人彻底否定中国文化、真诚接受西方文化的立场表示赞赏，他特别指出胡适不算“全盘西化论”者而是折中论者。

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发表之后，引起了长达一年的争论。率先对陈序经进行批评的是一位叫张磬的作者。张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陈序经，令陈序经十分恼火，旋即写了一篇长文回击，指责张磬只从马克思“经济史观”的角度谈文化问题，只会“抄袭”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中的话，怒斥张磬的文章是“村妇骂街的口气来胡说”^⑥。之后张磬也进行了回击，说自己不是马克思学说的盲从者，“我只拥护事实，事实上既有了证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就做了我的中国文化运动的理论基础”。张磬认为，中国的“西洋化运动”原不自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始，陈独秀等新文化人物其实是始作俑者。“五四的时代的资本主义文化运动，敲醒了全国思想界的梦。谁不异口同声力主全盘西化。果然，浩浩荡荡，颇极一时之盛，所谓塞恩斯与德漠克拉西——这大概是被指为所谓精神文化的东西——的高潮，弥漫了全国，懿欤盛哉！”“我早已说过，要懂得‘纺车上产生不出电力’的原理，才可以谈中国的文化问题。但是，这些蠢笨的文化园丁，还想全盘把西洋文化移植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园地里，他们既陷入了不可通的死路，却还在口口声声地梦想着出路。”^⑦ 事实是：中国文化生

① 《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08页。

② 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104页。

③ 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38页。

④ 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105页。

⑤ 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110页。

⑥ 陈序经：《关于中国文化之出路答张磬先生》，吕学海编：《全盘西化言论集》（“南大青年”特刊），岭南大学青年会，1934年，第19页。

⑦ 张磬：《在文化运动战线上答陈序经博士》，吕学海编：《全盘西化言论集》（“南大青年”特刊），岭南大学青年会，1934年，第29～30页。

长在中国农耕文明的土壤上，西方文化生长在工业文明的土壤上，土壤不改就要全盘移植，势必南橘北枳。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文化，经济基础不变，文化不可能自变。以中国现有的封建土地制度，要全盘实行西方的现代文明，只能是死路一条：这就是张謇对马克思“经济史观”的运用。

在批判“全盘西化”的队列中，有一位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胡绳，他在上海的《大众生活》上发表了一篇《谈“全盘西化”》的短文，指出把中国的新文化建设说成是“全盘西化”是不妥当的。“全盘西化”的人不仅要学西洋文化之“用”，亦须学其“体”。西学之“体”是什么呢？除柏格森哲学、新黑格尔派哲学之外，还有西洋文化之源泉的欧洲中世纪文化，“全盘西化”似乎成了自欧洲封建文化以来的“全盘”。“西洋文化不是单纯的东西：从时间的发展上，则至少已有欧洲中世纪的封建文化，有资本主义向上时期的文化，有资本主义腐败期的文化；而从空间的不同来说，则也至少有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文化，有法西斯文化，有社会主义文化，这实在一大盘炒什景，倘要全盘吃下去，将如何吃得消呢？”^①由此，胡绳认为对于西方文化必须有所选择，有所甄别，不可持“极端的全盘西化论”，而是要“很好很适当地‘西化’”^②。胡绳对“西化”两字加了引号，意思是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中属于现代社会主义的文化。

当时以通晓马克思主义哲学而知名的理论家叶青撰文指出，亲欧美的一派要把中国变成经济殖民地，亲日本的一派要把中国变成政治殖民地，亲帝国主义的一派（胡适等人）宣传要“全盘西化”，“则比前两派还进一步主张把中国变成文化的殖民地。他的口号叫做全盘西化。前一派夺我们的市场，中一派夺我们的土地，后一派夺我们的精神”^③。叶青指责胡适、陈序经等人抛出“全盘西化”就是要把中国“殖民地化”——即便他们在主观出发点上未必如此，但是在客观结果上必然如此。

在这场围绕“全盘西化”的辩论中真正支持陈序经的人微乎其微，不少人都对“全盘”两字进行了解析。例如，吴景超认为接受西方的科学不一定接受基督教，学习西洋精确治学的方法不必见了妇女就脱帽子，读《莎士比亚》不一定弃读《牡丹亭》等，但这统统被陈序经看成是“折中调和论”。陈序经坚持认为，西方文化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比中国文化进步，唯有“全盘西化”的中国文化才有出路。讨论的终场是陶希圣等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该宣言针对“全盘西化”推送了“中国本位文化建设”^④这一提议。虽然“十教授宣言”有着国民党官方背景，但他们提出的问题至今仍有价值，现代化潮流在中国传统社会所激起的文化心理浪花不断卷动，甚至使人们无暇去冷静地反思。

① 胡绳：《谈“全盘西化”》，《大众生活》（上海）1941年新16期。

② 胡绳：《谈“全盘西化”》，《大众生活》（上海）1941年新16期。

③ 叶青：《全盘西化？殖民地化？》，《申报》1935年6月22日。

④ 王新命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文化建设》1935年第1卷第4期。

四、走出迷思，拒绝虚无

“西化”一词至20世纪40年代后逐渐被“现代化”所取代，在此之前汉语中的“西化”两字实指现代化。此后，除少数沉迷于西方文化的人之外，人们很少再把“现代化”称为“西化”了。

对于这种改变，冯友兰颇有感想。他说：“这并不是专是名词上改变，这表示近来人的一种见解上的改变。这表示，一般人已渐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的，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的，而是因为它是近代的或现代的。我们近百年来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的，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的。这一个觉悟是很大的。即专就名词说，近代化或现代化之名，比西洋化之名，实亦较不含混。”^①这是说，在没有把“西洋化”改为“现代化”之前，理解上是充满含混性即不确定性的，认知上陷入迷思态或恍惚态。例如，假若从“西洋化”来看待中国文化，我们的文化是中国的，而非“西化”的；假若以“现代化”来看待中国文化，它是农耕时代的（中古的）产物，而非现代文明的成果。因此，从传统到现代，必须有一个创造性转换的过程。再如，如果只讲“西化”，中国人信基督就是西化了，但基督教绝不能代表现代化。因此，现代化不能只有西方式的，也应当有中国式的。

长期以来，一些国人在“西化”思想引导下不知现代化的真谛是什么，甚至提出“全盘西化”这种既不合逻辑又不切实际的荒谬命题。对此，罗荣渠曾写道：“用‘现代化’概念来取代‘西化’概念，这绝不仅是一个修辞上的问题，而是对观察现代世界的‘西方中心论’观点的修正和突破。”^②“西化”确是“西方中心论”的产物，“西方中心论”又是近代西方殖民者向全世界推行“西化”和西方霸权的文化软实力。鉴于中国自觉自为地由传统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历史背景，在“向西方学习”的进程中，很容易忽视西化殖民意识对民族精神的腐蚀。“全盘西化”之所以能成为影响全社会的一大思潮并且至今仍在某些人脑中持续发酵，是因为他们沉醉于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认知迷思。

要走出对现代化的迷思，不仅不可用“西化”代替“现代化”，也不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完全等同于一般现代化。邓小平同志曾多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

^① 冯友兰：《别共殊》，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上册，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346页。

^② 罗荣渠：《“现代化”的历史定位与对现代世界发展的再认识》，《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

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①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是什么？首先，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并没有舍弃现代化的普遍特征。如从人类发展的纵向上来看，任何族群都有一个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逐步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即都必然遵循着社会进步的一般规律。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大势所趋，它并不专属于地球上某个地方的特定族群。其次，如从横向上来看，现代化也是一个地理空间范畴，居于世界不同区域的民族进入现代化的过程并不同步，在同一时间的不同空间存在着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有的民族处于前现代化社会，而有的民族却已经步入“后现代化”阶段，这绝不是一个“西化”可以剪裁的。再次，各民族都有其特定的文化传统，传统赋予现代化以不同的民族特性。虽然欧美各国早在17—18世纪就实现了工业化，他们为后发展国家提供了一个可供学习、借鉴的样板，但这绝不意味着必须亦步亦趋地跟着西方，而是要根植于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打造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最后，中国务必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把现代性的普遍原则同中国实际的具体场景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

走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势必要拒绝“西化”所带来的精神虚无。“全盘西化”的实质就是虚无主义——民族精神的全盘虚无。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虚无主义者所虚无的对象只是本民族宝贵的历史和价值，而不是“万法皆空”的僧侣主义的全景虚无。“虚无”的对立面是“实有”，在他们眼中，彼方（西方）的一切都是令人艳羡的实有，己方（中国）的一切都不值一提。可见，这是单向度的虚无主义，是自轻自卑的虚无主义，是丧失信义、骨气和底气的民族虚无主义。西化派虚无主义者分开来讲有三种，即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但合起来讲就是一个——单向虚无主义。所谓“单向虚无主义”，就是虚无主义者单向度地虚无本民族的历史而歌颂西方历史，单向度地虚无本民族文化而赞扬西方文化，单向度地丑化中华民族而美化西方民族。民间所说的“恨国族”和“洋粉党”并非指两类人群，他们恰是同一类人，是同类人的两张面孔和双重人格。在单向虚无主义的语汇中，“文明世界”是暗赞西方的借喻，“专制野蛮”是影射己方的隐喻。他们完全丧失了民族主体性、历史主体性和文化主体性，归根到底就是单向度地自我虚化，自我抹杀，自毁长城，自灭志气！

虚无主义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西化”运动的衍生体，是反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的产物。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

^①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

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① 所谓“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是非辩证、无分析、机械死板的方法，“全盘西化”就是这种形式主义错误的典型，毛泽东同志指出：“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② “全盘西化”仅是一句口号，虚无主义才是其内在本质。

单向虚无主义至今仍在支配着个别知识精英的精神世界，左右着他们对中西文化、民族遗产、历史人物、革命传统的认知和评价，其危害程度不容小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③ 他还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④ 这种虚无主义思潮客观上起到了国外敌对势力起不到的作用，是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障碍。因此，我们务必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铲除各种虚无主义产生的思想文化土壤，“只有真正弄懂了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才能更好识别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更好抵御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谬论”^⑤。

On the Myth of Modernization and Unidirectional Nihilism

Zhang Yunyi

Abstract: China was passively involved in the wave of modernization in modern times.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from the West, modern Chinese people unexpectedly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1～83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③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79～48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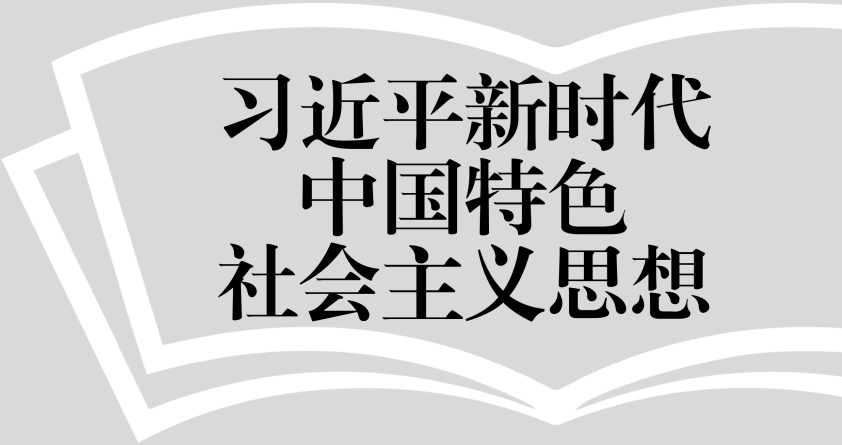
④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⑤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

led to a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which as a cultural trend began with the Westerniz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writing. Some people cannot distinguish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learning from the West” and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leading to falling into a cognitive trap of modernization. The climax of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began with the Westernized groups during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Most of them had a background of textual research school, and the statements of radical anti-tradition and radical Westernization reflect the urgent demand of some Chinese intellectual elites for implementing modernization in China.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hey have fallen into a cognitive blind spot. Interpreting “Overall Westernization” as “Full Modernization” has led people into the mystery of “Modernization”. The essence of “Overall Westernization” is unidirectional nihilism. To get out of the myth of modern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reject nihilism and unswervingly follow the path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Keywords: West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Nihilism

[责任编辑：于少青]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的传承^{*}

刘 仓^{**}

【摘 要】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是推进中华文化复兴和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从传承“德法合治”思想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从传承中华法系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从“以法治国”到全面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从“观时制法”到“新十六字”方针等，都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的思想精华。中华法律文化中的改革与法治、德治与法治的关系，以及隆礼重法、民惟邦本、德主刑辅等观念，都在全面依法治国方略中展现出了时代价值。习近平法治思想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规律，是在法治领域坚持“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

【关键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依法治国；“两个结合”

党的二十大从建设法治中国的高度，提出“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的任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历史来源，既是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的独特资源，又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了历史借鉴。梳理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的传承，对于增强全面依法治国的历史主动和战略自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的时代意义

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了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与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举措的关系，阐述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十一个坚持”。这标志着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学术界围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研究”（项目编号：22BKS001）阶段性成果。

^{**} 刘仓，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绕法治建设的重要地位、根本立场、主要任务、总体安排、重大关系、重要保证等方面，集中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的传承。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的传承，一时间成了学术界关注的重点课题。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认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若干重要理念传承了礼法并重、德法合治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扎根中国文化；中华法系彰显了中华法制文明的历史底蕴；提升中国法治体系和法治理论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是讲好中国法治故事。^① 张文显从构建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单一制的大国体制的治理优势、良法善治等方面，进一步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华法治文明中挖掘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经验智慧。^②

易继苍和孙周银归纳了从“民惟邦本”到坚持人民至上，从“以法治国”到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从“观俗立法”到新十六字方针，从中华法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从德法合治到正确处理法治和德治的关系、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关系等方面的内容，阐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华法律文化的传承。^③ 陈玺论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传统“德法合治”理念、法治论断和中华法系的传承，阐述了弘扬中华优秀法律文化对完善法治体系、建设法治政府、推进公正司法、引导全民守法的借鉴意义。^④ 吕廷君从“奉法者强则国强”“民惟邦本”“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德刑并用”“法不阿贵”“德才兼备”等方面阐释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历史渊源。^⑤ 顾华详从汲取依法治国的智慧、汲取治国理政的经验、强化法治生命力的路径等方面，阐述习近平法治思想中蕴含的中华法律文化底蕴。^⑥ 房广顺、闫鑫从传承中华优秀法律意识和法律精神、法律规章、法律教育、尊法守法等方面探讨了对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⑦ 本文尝试以习近平法治思想的若干内容为框架，探讨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的传承。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高度重视弘扬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战略举措。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

① 参见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习近平法治思想开辟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求是》2022年第24期。

② 参见张文显：《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③ 参见易继苍、孙周银：《传承与超越：习近平法治用典的传统法律文化意蕴》，《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④ 参见陈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传统法律文化观》，《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

⑤ 参见吕廷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历史渊源——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前线》2021年第2期。

⑥ 参见顾华详：《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的传承创新——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依法治国的视角》，《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⑦ 参见房广顺、闫鑫：《新时代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

华，借鉴国外法治有益经验，但决不照搬外国法治理念和模式”^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注意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座谈会，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三次会议，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第二十次集体学习、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等场合，明确强调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是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重要措施，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从中国历史经验来看，建立有效的法制是实现国富兵强的重要途径。韩非子认为：“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韩非子·有度》）春秋战国时期，管仲主张“以法治国”才使齐桓公成为五霸之一，秦国通过商鞅变法迅速跻身强国之列。汉武帝时形成的汉律六十篇，两汉沿用约四百年。唐太宗制《贞观律》，成就“贞观之治”。“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什么时候忽视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③在新时代，建设现代化强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要总结中国法治经验和传承法律文化。“只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同时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法治基础。”^④从追求富国强兵到建设现代化强国，体现着对中华法治历史的传承。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需要。法治往往是历代君主治理国家的重要举措。管仲主张：“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管子·明法》）韩非子也赞成“以法治国”的主张，强调“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韩非子·难势》）王安石认为：“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王安石《周公》）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有关法治功能的论述，为全面依法治国方略提供了历史依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⑤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战略举措，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从良法善治到建设法治国家，体现了对中华优秀法律文化的传承。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5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86页。

③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94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290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41页。

指出：“我们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规律，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世界法治文明有益成果，形成了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举措。”^①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推进中华文化复兴的需要。中华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前提条件和重要内容，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法律文化中的独特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包含圣贤君主对富国强兵的追求，包含对安危治乱兴衰成败的思考，包含对国家统一、民族和睦、政权巩固、社会稳定的期望，包含对大业千秋万代、国家长治久安的期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包含反映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精神，包含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实践方面的经验，体现了对治理什么国家、构建什么社会和塑造什么人的理念。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是新时代弘扬法治精神、建设法治体系的重要内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有助于为“四个自信”提供历史根据。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法学体系的需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构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要条件。中国先人早就探索如何驾驭人类自身这个重大课题，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中华传统法制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法系中独树一帜。法家代表人物管仲、李悝、商鞅、韩非子等影响深远。中国历史上秉公执法、法不阿贵、正法为民等法治故事为世人津津乐道。中国特色法学体系的时代使命是以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作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要总结和运用党领导人民实行法治的成功经验，围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丰富和发展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依法治国提供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② 2017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座谈会上强调：“加强法学学科建设，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突出特色。”^③ 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是构建中国特色法治理论的思想来源。

二、中国特色法治道路对德法合治传统的继承和改造

注重总结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挖掘和传承中华传统法律文化，有助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方略，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决定的。中国古代德礼兼施、德主刑辅的治理特点，为全面依法治国方略提供了历史来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历史上很多人主张“儒法并用”“德刑相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304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86页。

③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76页。

辅”，也就是思想教育和法制惩罚并用。“党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古人这方面的治理思想与经验。”^①

古代中国早就出现礼制和刑罚合治的思想。周公主张“明德慎罚”，提出“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齔寡，庸庸，衎衎，威威，显民。”（《尚书·康诰》）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继承周朝礼制，以仁为核心，以礼制为规范，以刑法为补充。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这体现了德治、礼治、刑治的结构关系。管仲注重礼治作用，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同时还强调刑治，主张“劝之以庆赏，纠之以刑罚”（《管子·小匡》）。《汉书·刑法志》中说：“圣人取类以正名，而谓君为父母，明仁爱德让，王道之本也。爱待敬而不败，德须威而久立，故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唐朝继承汉代礼法合治的思想，确立“德礼为本，刑罚为用”的方式。长孙无忌在《唐律疏议·序》中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德礼是政治教化的根本，刑罚是政治教化的工具，这概括出德礼、政教、刑罚三者的关系，确立了德礼为本、政教为制、刑罚为用的治理方式。国家治理是以德为主、德法兼治的方式。德礼为本，政刑为末；以德治、礼治为主，以政治、刑治为辅。

201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历来就有德刑相辅、儒法并用的思想。法是他律，德是自律，需要二者并用。”^②2017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座谈会上说：“我国历史上有十分丰富的礼法并重、德法合治思想。周公主张‘明德慎罚’、‘敬德’、‘保民’。孔子提出‘为政以德’，强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荀子主张‘化性起伪’，提出‘隆礼重法’。西汉董仲舒提出‘阳为德，阴为刑’，主张治国要‘大德而小刑’。尽管古人对德法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尽相同，但绝大多数都主张德法并用。”^③

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传承和改造德法合治的思想，发展了法治和德治的辩证关系。第一，道德是法律的基础。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是制度化的道德。只有符合人们意愿和利益，具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才为人们所自觉遵守。第二，法律是道德的保障。法治以其强制性来规范行为，引领道德风尚。第三，坚持道德和法治的转化。要使基本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使法律法规体现道德理念和人文关怀；通过法律的强制力来强化道德规范，使守法尊德成为人们的自觉言行，推动全社会道德素质提升。第四，提升道德素质和提升法治能力相统一。只有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才能提升法治意识和纪律意识，增强法治的

① 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学习时报》2011年9月5日。

②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51页。

③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78页。

能力和水平,反之亦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① 这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提供了思想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强调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党的十八大从文化强国建设高度、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角度提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②。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③的原则。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依法执政基本方式落实好,把法治中国建设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④ 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方略,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⑤。

改革开放以来,党把依法治国确定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条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⑥ 从古代“德法合治”传统到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刘云山评价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等论述,“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本质要求,体现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理念和方略”^⑦。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对中华法系的传承

中国先民早就重视法律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惩罚功能。相传,尧舜时期就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85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5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59页。

④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65页。

⑤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6页。

⑥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66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64页。

已出现专职法律的官吏——皋陶。奴隶制国家出现后，也承袭皋陶之法。“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左传·昭公六年》）战国时期，法家提出“塞民以法”（《商君书·画策》）、“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管子·明法》）。秦朝沿用法家思想，湖北睡虎地秦简、湖南里耶秦简等都反映了秦朝法制的成果。汉承秦制，汉武帝时形成的汉律六十篇，两汉沿用近四百年；唐太宗时期的《贞观律》和唐高宗时期的《永徽律》《唐律疏议》等，为大唐盛世奠定了法律基石。“中华法系形成于秦朝，到隋唐时期逐步成熟，《唐律疏议》是代表性的法典，清末以后中华法系影响日渐衰微。”^①

中华法系在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和中华法制文明的历史底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汲取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吸收借鉴人类法治文明有益成果，坚决抵制西方错误思潮错误观点影响，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②把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内容，中华法系为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供了历史依据。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引用“治国无其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衰”（《慎子·逸文》），强调“要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使之更加科学完备、统一权威”^③。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总抓手。构建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以及党内法规体系，都可以从中华法制史中汲取历史智慧。

中华法典是中华法治体系代表性的制度成果。盛唐时期，长孙无忌等编撰的《永徽律疏》成为中华法典的代表作。新中国成立后，党多次启动制定和编纂民法典的相关工作。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从全面依法治国的高度，对编纂民法典作出部署。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三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分别审议民法总则草案、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民法典草案。2020年5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系统整合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长期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汲取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优秀法律文化，借鉴了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是一部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民法典……是一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的民法典。”^④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对于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289～290页。

②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73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293页。

④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583页。

会有借鉴意义。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美国期间引用“法者,治之端也”,提出中国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强调全面依法治国就是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①。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为法治国家提供历史借鉴。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都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在封建社会中,历朝历代都把法律作为维护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的工具。“是以圣王在上,经国序民,正其制度。”(荀悦《前汉纪·孝武皇帝纪一》)商鞅主张:“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国务不可不谨也,事本不可不抟也。制度时,则国俗可化,而民从制;治法明,则官无邪;国务壹,则民应用;事本抟,则民喜农而乐战。”(《商君书·壹言》)用法律规范巩固国家制度,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结了革命和建设经验,把人民民主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植根于中华文明所积淀的深厚历史文化传统,吸收借鉴了人类制度文明有益成果,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为建设法治社会提供思想资源。《管子·法禁》中说:“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刑杀毋赦,则民不偷于为善;爵禄毋假,则下不乱其上。三者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其余不强而治矣。”这是说,法制不容置疑,则民众不私自妄为;刑杀不赦免,则民众不苟作善事;爵禄名副其实,则下属不犯上作乱。三者施于官府,则为法治;施于社会,则成风俗;其余不必强制就能治理。201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说:“用明确的法律规范来调节社会生活、维护社会秩序,是古今中外的通用手段。”^②

四、新十六字方针传承中华法律实践精神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求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等场合,运用中华法律文化精华阐释其中的道理、学理和哲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88页。

②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9页。

科学立法体现对“观时制法”思想的传承。一是传承法治的社会规范功能。管仲主张：“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管子·明法解》）法是社会行为的规范，是判断善恶臧否的标准，是衡量行为短长的尺度。2017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刑警组织第八十六届全体大会开幕式上，引用“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管子·七主七臣》），强调“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①。二是传承“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史记·商君列传》）的理念。201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实践是法律的基础，法律要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②三是传承“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战国策·赵策二》）的传统。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引用“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③，强调坚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必须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要加强国家安全、科技创新、生态文明、防范风险、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重要领域立法。

严格执法包含令行禁止、奖善惩恶的传统。“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张居正《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这是严格执法的历史训诫。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引用张居正的话，强调“推进法治体系建设，重点和难点在于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推进法律正确实施，把‘纸上的法律’变为‘行动中的法律’”^④。法不阿贵、严格执法是法治精神的真谛。商鞅主张：“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商君书·赏刑》）赵蕤记述蜀国张裔评诸葛亮说：“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以无功取，刑不可以势贵免，此贤愚之所以企忘其身也。”古人说：“当赏者不赏，而当罚者不罚，则为善者失其本望而疑其所行，则为恶者轻于国法而怙其所守。”（赵蕤《长短经·政体》）201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做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就要信仰法治、坚守法治。‘法不阿贵，绳不挠曲。’这就是法治精神的真谛。”^⑤加强法律实施工作是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引用“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要求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坚决

①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83页。

②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9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86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302页。

⑤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47页。

整治以权谋私、以权压法、徇私枉法问题，严禁侵犯群众合法权益”^①。

公正司法包含对“无偏无党，王道荡荡”的传承。一是公正司法是对执法人员的基本要求。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引用孔子这段话后，要求司法人员刚正不阿，“坚守公正司法的底线”^②。二是公正司法是关系国家治乱的关键环节。《尚书·洪范》中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管仲说：“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则听治不公。听治不公，则治不尽理，事不尽应。治不尽理，则疏远微贱者无所告诉。事不尽应，则功利不尽举。功利不尽举，则国贫。疏远微贱者无所告诉，则下饶。”（《管子·版法解》）这段话的意思是，“法度必须公正，不公正则判案不公平。判案不公平，治理就不合理，事情就不应时。治理不合理，老百姓就无法伸冤；事情不应时，功利实业就不能兴办。功利实业不能兴办，国家就贫穷。老百姓无处伸冤，民间就会骚乱”^③。三是公正司法关系执法者和政府的形象。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引用房玄龄“尽公者，政之本也；树私者，乱之源也”（《晋书·刘颂传》）的格言，指出“公平正义是执法司法工作的生命线”^④，事关党和政府法治形象。

全民守法包含“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理念。司马光主张：“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则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资治通鉴·汉纪六》）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上指出：“要坚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高度重视道德对公民行为的规范作用，引导公民既依法维护合法权益，又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做到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相一致。”^⑤全民守法的关键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做尊法守法的模范。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引用“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后身”（荀悦《申鉴·政体》），要求领导干部牢记法律底线，“带头遵守法律、执行法律，带头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⑥。全面守法，必须推进法制宣传教育，法制宣传教育是法治建设的基础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引用“法立于上，教弘于下”，要求在全社会开展尊崇宪法、学习宪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56～57页。

②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15页。

③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46页。

④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59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91页。

⑥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39页。

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宣传教育活动，弘扬宪法精神和社会主义法治精神。^①

在剥削阶级社会，法律是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劳动阶级的工具，君主立法、执法为私、司法不公等现象比比皆是。诸如“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贪赃枉法，权钱交易、为钱司法等现象屡见不鲜。这些现象的根子在于人治大于法治。习近平总书记深知旧制度旧法治的弊端，强调要解决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以权压法等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法机关，不能搞成旧社会‘官府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② 要从政法机关做起，坚决破除各种潜规则，改变找门路、托关系等现象。

五、弘扬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理念的时代价值

全面依法治国中的重大关系蕴含着中华法律文化的理念。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正确处理政治和法治、改革和法治、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关系。”^③

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关系。中国历史上的变法，一般都是把改革和法治相结合。“从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宋代王安石变法到明代张居正变法，莫不如此。”^④ 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这就是改革和法治两个“轮子”的含义，也是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辩证关系。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上所作《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决定稿和方案稿的说明》中指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要做到改革和立法相统一、相促进，发挥法治规范和保障改革的作用，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依法依规进行。同时，要同步考虑改革涉及的立法问题，需要制定或修改法律的要通过法定程序进行，做到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⑤

坚持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的统一。依法治国，公民不能越过法律底线；依规治党，党员不能超越纪律红线；以德治党，使每位党员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以德治党的“德”，是指党的理想信念、宗旨道德、作风纪律，其内核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一脉相承。时任中央纪委书记的王岐山指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历来都讲德法相依、德治礼序，家规族规、乡规民约传承着中华文化

① 参见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05页。

②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51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623页。

④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8页。

⑤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43页。

的DNA。中华民族历史传统中的‘规矩’和崇德重礼的德治思想，也是党规党纪的重要源头。”^① 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必然要求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紧密结合。道德使人向善，是纪律的必要前提和基础；纪律用来惩恶，是道德的坚强后盾和保障。”^② 纪律和规矩是道德的保障，崇德向善必须与遵规守纪相辅而行。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是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的制度规范。其中，后者“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紧扣廉洁自律主题，重申党的理想信念宗旨、优良传统作风，重在立德”^③，是党执政以来第一部规范全党廉洁自律工作的重要基础性法规，展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道德追求。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结合，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促进，标志着党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境界。

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统一。全面依法治国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依规治党深入人心，依法治国才能深入人心。全面从严治党的丰富实践，为党内法规制度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把党规、党法和党德加以制度化规范化，体现了依法治国、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的要求。党的十九大从全面依法治国方略高度指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④ 这是依法治国、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的统一。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确保党既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又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从严治党。”^⑤

中华法系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有很多优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传承。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指出：“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平等观念，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孺的恤刑原则等，都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的智慧。”^⑥ 例如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西汉时期，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把人伦关系概括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合乎天道，“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董仲舒主张：“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763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依规治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77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724页。

④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6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288页。

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290页。

生。”（《汉书·董仲舒传》）在德刑关系上，主张“德主刑辅”。《汉书·刑法志》说：“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辅助也。”魏征主张君主“专尚仁义”“慎刑恤典”（《贞观政要·公平》）。

中国古代倡导“听讼”而“无讼”。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朱熹引用宋朝大儒范祖禹的“听讼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则无讼矣”，主张“圣人不以听讼为难，而使民无讼为贵”。习近平总书记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引用“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葛洪《抱朴子·内篇·地真》），强调法治建设不仅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中国国情决定了中国不能成为“诉讼大国”，否则不堪重负。他要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推动共建共治共享，促进社会和谐稳定。^①

政法工作队伍建设包含对古代“人法兼资”理念的传承。在古代中国，立法权属于最高统治者。韩非子提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韩非子·五蠹》）赵蕤在《长短经》中说：“明主审法度而布教令，则天下治矣。”中国共产党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最高领导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关键在于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②“得人则兴，失人则毁。”选拔任用具有法治素养的人才，是执法和司法的关键。包拯曾以诗言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201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引用包公的这段话，要求干警“把法治精神当作主心骨，做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的执法者”，“不偏不倚，不枉不纵，铁面无私，秉公执法”。^③

从“善禁禁己”到“关键少数”，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高级领导干部都要做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是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目标和任务的关键。如果领导干部违法乱纪不受惩罚，则会形成“破窗效应”。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冯梦龙《警世通言》中的“人心似铁，官法如炉”，强调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和“铁帽子王”。^④领导干部要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中起模范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敬一贤则众贤悦，诛一恶则众恶惧”（《群书治要·典语》），强调“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标准就是德才兼备，而法治观

① 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295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51～352页。

③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48页。

④ 参见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40～141页。

念、法治素养是干部德才的重要内容”^①。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是干部成长成才的重要因素。

习近平法治思想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规律，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的精神特质融会贯通，是在法治领域坚持“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华法律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Inheritance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Legal Culture of Xi Jinping's Rule of Law Thought

Liu Cang

Abstract: Inheriting the fine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of China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promoting the revival of Chinese culture and advancing Law-Based Governance. From inheriting the thought of “rule of law and virtue” to adhering to the road of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inheriting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to building a socialist leg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governing the country by law”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of a rule of law country, a rule of law government, and a rule of law society, from the “time observation system” to the “new sixteen character” policy, which include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fine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form and rule of law, rule of virtue and rule of law in Chinese legal culture, and concepts such as valuing the law with respect to etiquette, putting the people at the center of the country, and prioritizing morality as the mainstay and supporting punishment, demonstrate the value of the times in the strategy of advancing Law-Based Governance. Xi Jinping's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grasping the rule of socialism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 shining example of adhering to the “two combinations” in the field of the rule of law.

Keywords: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Legal Culture; Xi Jinping's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Advancing Law-Based Governance; “Two Combinations”

[责任编辑：杨鹏]

^①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42 页。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特质、科学内涵及时代价值*

肖唤元 张茂杰**

【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题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利文化条件，其形成发展具有深厚的理论依据、丰富的实践基础和鲜明的现实指向，是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的内在统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内涵集中体现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极端重要的深邃历史观、坚定文化自信的独立自主观、秉持开放包容的共同发展观、坚持守正创新的科学文化观、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文化为民观、“七个着力”的整体系统观。习近平文化思想标志着党的创新理论进一步体系化学理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擘画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彰显完成新时代文化使命的真理力量。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体系；党的领导；“七个着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高度重视并科学谋划部署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秉持强烈的责任担当和问题导向，聚焦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持续加强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研究、阐释，并自觉贯彻落实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①。科学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揭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增强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自觉认同，对提高做好文化工作能力和水平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 本文系辽宁省社科基金思政专项重点课题“以立德树人为中心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发展路径研究”（L17ASZ001）阶段性成果。

** 肖唤元，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张茂杰，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建设。

①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人民日报》2023年10月9日。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特质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博大精深、开放包容的科学体系,“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①。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题是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利文化条件。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立足新的起点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这一时代背景下所直面和必须着力完成的新的文化使命。完成这一新使命绝非易事,而是面临许多新矛盾新问题新挑战,因而必须顺应时代发展变化,用科学理论来指引。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②,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文化建设发展之“的”,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和理论彰显,为推进文化建设、增强文化自信进而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等多个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域座谈会,科学全面且各有侧重地就一系列根本性、全局性问题阐明原则立场、明确行动方向,廓清了理论是非,划清了底线红线,校正了工作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新时代党领导推动文化建设发展的丰富实践经验,不断深化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围绕为什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要求和新部署。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中国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发展具有深厚的理论依据、丰富的实践基础和鲜明的现实指向。习近平文化思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运用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立场观点方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与时俱进。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内蕴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深

①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人民日报》2023年10月9日。

②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人民日报》2023年10月9日。

刻把握的基础上，坚持文化建设“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①，用“助推器”“导航灯”“黏合剂”^②来阐述文化力量与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交融互动、融合发展的关系，用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③为中华文明“精准画像”，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聚焦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开展一系列重大创新实践，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创造和制度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要有新气象新作为。”^④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鲜明的现实指向，立足国内外环境演变、自身发展现状以及技术发展趋势，着力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的内在统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明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使命任务，提出“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论断，深刻回答了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毛泽东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⑤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坚持为人民服务，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满意与否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要求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卓越的政治智慧，坚持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从赓续历史文化中坚定自信，为文化强国建设擘画蓝图路径，明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使命任务，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建设翻开崭新篇章。宣传思想文化实践的主体、客体和中介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因而实践的基本结构也是历史地变化发展的。作为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必将随着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要求而不断丰富发展。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322页。

② 参见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9页。

③ 参见《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

④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人民日报》2023年10月9日。

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内涵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特殊与一般、整体与部分的有机贯通。对于这一思想的学理阐释，必须将“理论特质”与“理论形态”结合起来予以整体性考察，以期系统全面地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内涵。

第一，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极端重要的深邃历史观。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三个事关”的重大判断，深化了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纵观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史，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始终与党的事业相伴而生、同向而行。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程中，党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上积累形成了宝贵经验。比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上立场坚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思想文化相关领域工作的重要性。“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①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及一些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就是前车之鉴。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关乎旗帜之争、道路之争、命运之争。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总结党领导宣传思想工作的百年历史经验和苏联的教训，聚焦当下宣传思想战线肩负的宏大使命，以前所未有的理论深度、历史厚度和时代高度全面审视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最终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

第二，坚定文化自信的独立自主观。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② 这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彰显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强大力量。“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③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文化自信”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坚持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④。当今时代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切实提升国家综合国力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时代课题。文化在国家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加凸显，因而必须站在国家繁荣发展和民族前途命运的高度，深刻理解坚定文化自信的时代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1页。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9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6页。

④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38页。

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① 有没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坚定的文化自信，是影响国家文化安全与否的基础性问题。文化是精神的载体，文化自信事关民族精神独立。中华民族精神之“实”孕育在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壤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彰显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独特的民族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之基。习近平文化思想围绕新的文化使命鲜明提出坚定文化自信的重大原则，进一步明确了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必须牢牢把握住了文化自信“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重要特征，重视发挥优秀文艺作品的力量，扎实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工作，推动形成文化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第三，秉持开放包容的共同发展观。回望历史，中华文明在五千多年的传承中开放包容、不断兼收并蓄、创新发展。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汉化改革，从洛阳胡乐到羌人汉歌，从边疆少数民族雅歌儒服到中原上下胡衣胡帽，中国各民族文化开放包容、相互尊重、交流互鉴、兼收并蓄，共同丰富和创造了璀璨的中华文化。再看发展，中华文化始终以兼收并蓄的开放包容性与其他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创新繁荣发展。从中体西用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改革开放以及全方位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②，创造了丰富多彩、璀璨斑斓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贡献了中国色彩和华丽篇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全球和平发展、公平正义、交流互鉴、开放包容的主基调，秉持中华文化兼收并蓄的开放包容性，坚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从“一带一路”倡议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到全球文明倡议，从创立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到举办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观和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着力于促进文化和文明的交流互鉴。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开放包容的宣传思想文化建设原则，必须充分借鉴并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文明成果，推进文明之间互融互通，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注入力量。

第四，坚持守正创新的科学文化观。守正创新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基因，也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守正创新”的词义就是恪守正道，勇于创新。中华文化既讲“正心诚意”“守正直而佩仁义”，又讲“革故鼎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表现了恪守正道、勇于创新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③ 守正，守的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228页。

^③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

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新，创的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没有创新的守正一定是陷入僵化教条走向绝路，缺乏守正的创新必然偏离真理误入歧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通过守正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守正就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但不是刻舟求剑，还要往前发展、与时俱进，否则就是僵化的、陈旧的、过时的。”^①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激发守正创新、奋勇向前的智慧。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守好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之“正”。要坚持科学方法，大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坚持“两个结合”中实现文化发展。

第五，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文化为民观。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创造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为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指引，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落脚点。马克思主义把人的精神生活的丰富性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把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作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人民精神富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也是反映中华民族精神的理想形态。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兼而有之是一个民族复兴的重要前置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②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理想文化样态，纳入人生和社会理想之中。这是对传统精神文化形态的超越，是对马克思主义精神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一条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文明建设发展道路，并由此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树牢丰富人民精神生活的价值导向，丰富高质量文化产品供给以健全丰富人民精神生活的需求体系，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完善丰富人民精神生活的现实支撑，巩固了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精神文化建设领域取得的这些成就为新征程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定了良好基础。

第六，“七个着力”的整体系统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具有整体性。作为一个铸魂育人的复杂系统，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七个着力”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其中，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是根本，在“七个着力”的工作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③如果离开了党的全面领导，就会偏离正确方向。百余年来，党的

①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77页。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9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6页。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之所以取得长足进步、发挥重要作用，最根本的就在于始终坚持党的领导。顺次中间五个着力点强调的是国内文化工作的格局和要求，致力于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在“七个着力”的工作系统中属于“国内循环系统”。“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①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一旦旁落，就会犯无可挽回的错误，这是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关键，必须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②，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努力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两者间的联结点，致力于推动形成崇德向善的社会风尚，为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良好环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治国理政的大事，关乎整个宣传思想工作成败。这是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的重要原因。文脉同国脉相连。就我国而言，文脉具体化为各类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是赓续传承文脉的有效途径。新时代文化建设工作不断推进，必须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越是在历史演进的关键阶段，越要激发文化的强大支撑力和感染力。当前，我们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激荡的历史时期，迫切需要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体现的是中华文化的国际作为，在“七个着力”的工作系统中属于国际循环系统。“七个着力”最终形成“党的领导、内外互补、整体提升”三位一体的系统布局。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代价值

作为“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③，习近平文化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新时代文化建设实践中展现出强大伟力，在担当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中彰显出卓越的真理力量。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53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63页。

③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人民日报》2023年10月9日。

（一）标志着党的创新理论进一步体系化学理化

“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①体系化要求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能够形成相互关联、相互支撑的结构，使理论内在统一、逻辑严密。学理化要求理论的创新必须与学科的基本原理和法则相符合，总结和归纳实践经验，深入研究实践问题，探索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使理论创新能够更好地反映客观规律。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统一，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创造出新的理论。这既是提出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的过程，也是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的过程。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理论成果，都经历了从渐次提出观点论断到内部之间形成逻辑关系、完善理论系统框架，呈现出结构清晰、层次分明的体系化学理化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创新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主要从两个方面推进，在整体建构方面，明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形成逻辑以及重大意义等，形成一个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系统全面的科学体系；就专题深化而言，至今，围绕强军、经济、生态文明、外交、法治、文化领域形成了六个“思想”，表明党的创新理论是一个不断深化拓展、系统化的过程。这有助于在各个方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取得更大成效提供因应现实发展变化的科学理论指引。

（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确立新时代的文化价值内核，明确文化是国家和民族之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②面对改革发展稳定复杂局面、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以及媒体格局深刻变化，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回答国家发展的目标、社会前进的方向、公民行为基本准则的问题，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表达、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强调文化建设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文化创新工作的落脚点，是新时代推进文化创新的根本价值追求。二是坚定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巩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文化的主体性是一个民族文化生命的根本维系。习近平总书记以大历史观建构文化自信的逻辑，指出中华文明有“深刻的思想体

^①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人民日报》2023年7月2日。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页。

系、丰富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独特的制度创造”^①，这是文化自信的历史基础，在进一步凸显中华文明主体性的同时，更为中华文明的赓续更新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引。三是强调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②党的二十大再次明确，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③。这是文化创新的关键所在。四是面对中外文明交流交融交锋，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在个别国家炮制“文明冲突论”论调、大搞意识形态对抗的背景下，阐明围绕全球文明发展的中国立场、中国方案，特别是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坚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致力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主张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

（三）擘画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宏伟蓝图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时代产物和理论形态，并顺应时代潮流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回答时代之问中不断丰富理论内涵。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肩负新的文化使命，“什么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什么要加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怎样加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亟待回应和解答。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以强烈的问题意识，积极探索和遵循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客观规律，关切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提出关于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明确“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④，提出“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论断，规划“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长远目标。习近平文化思想博大精深，极具前瞻性、战略性意义，从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责任使命、功能价值等方面，科学回答了文化层面的一系列难点问题，是我们担负新时代新的使命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立足文化实践中扩展思想视域。一切伟大的实践，都需要科学理论的正确指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挥动如椽大笔，于新时代卷轴上写下精彩绝伦的文化篇章，推动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并在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中将文化建设理论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中国式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07页。

②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

③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5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53页。

现代化文化建设的实际，紧扣时代脉搏，总揽文化建设全局，从党的二十大对文化强国建设的新部署，到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对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再到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提出“七个着力”的重要要求，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总体谋划，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习近平文化思想涵盖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为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提供行动指南。

（四）彰显完成新时代文化使命的真理力量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使命型政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高质量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党在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完成这一使命，“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①，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习近平文化思想为高标准完成好这一使命提供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的行动指南，并在担当和完成新的文化使命的过程中，不断彰显其真理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站在时代发展前沿，始终植根社会发展客观需要，不断从经验积累和实践总结中升华提炼出规律性认识，深刻阐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意义，引领党和人民在新时代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为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文化思想来源于丰富生动的中国实践，同时又引领着新时代、担负着新使命、推动着新实践。踏上新征程，新形势新任务的现实变化迫切呼唤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做出新作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②必须聚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个首要政治任务，持续加强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思践悟，系统全面掌握其在文化理论观点上的重大创新和具体要求。要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系化研究、学理化阐释，以充分的理论准备应对更加复杂的形势、承担更加重大的责任、完成更加艰巨的任务，不断开辟新时代文化建设理论创新更加广阔的前景。

^①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6页。

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Scientific Connotation and Era Valu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Xiao Huanyuan Zhang Maojie

Abstract: The them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is to provide a strong ideological guarantee, strong spiritual power and favorable cultural conditions for comprehensively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and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s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have profou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rich practical basis and clear reality. The orientation is the inner unity of scientific nature, people nature, practicality and openness.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is embodied in the profound historical view of the extremely important propaganda of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work, the independence and autonomy of firm cultural confidence, the open and inclusive view of common development, the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view of innovating on the basis of what has worked in the past, and the cultural for people view of enriching the people's spiritual world and the overall systematic view of the "seven focuses", which marks the further systematization of the party's innovative theory, enriches and develops the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outlines the direction and measur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ulture in the new era, and demonstrates the truth power for completing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era.

Key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Scientific System; Party Leadership; "Seven Focuses"

[责任编辑: 杨鹏]

探赜“第二个结合”科学内涵的三重向度

杨海波 裴召杰*

【摘要】“第二个结合”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新时代理论创新的高度自觉。这一理论阐释在总结与时俱进的实践经验之中、在互通共荣的理论特质之内以及在多元主体团结协作之下得以生成和发展。“第二个结合”的核心要义聚焦“结合之新”“结合之成”“结合之思”三个议题，分别作出“新意所在”“成果所得”“思维所悟”的回答。这一理论要变为现实，需要坚守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文化建设中的统领地位，挖掘中华文明在宏阔历史纵深中的接榫机制，拓展中国方案在时代激荡变局中的优势空间，促进文明主体在惠己达人关系中的友好交流。只有深刻领悟“第二个结合”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才能更好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范式研究。

【关键词】“第二个结合”；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以文化主体意识和历史主动精神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关键，在于找到思想解放的引擎。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重点论述了“两个结合”的历史意蕴，深刻指明“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作用，为我们“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①提供了科学定位。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命题本身出发，论证了坚守好“魂脉和根脉”^②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的“习近平文化思想”^③包

* 杨海波，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裴召杰，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①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②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人民日报》2023年7月2日。

③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人民日报》2023年10月9日。

含了赓续中华文脉的使命任务，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呈现出文化道路的新气象和文化格局的新图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第二个结合”讲述了许多新思想新论断，为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根基和历史脉络提供了基本遵循。当前学界对“第二个结合”的研究和探讨已形成一定规模，但对“第二个结合”的整体性研析有待深入。鉴于此，本文围绕“第二个结合”的生发机制、核心要义和实践路径三个向度展开论析，希望对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作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学理性阐释、学术性表达和系统性建构有所助益。

一、何以生成：“第二个结合”的生发机制

“第二个结合”的生成和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都是社会历史条件下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具体来说，“第二个结合”的生发机制应从实践基础、理论前提和主体依托三个向度展开。

（一）实践基础：与时俱进的实践经验推进“第二个结合”

任何认识的形成和发展都不能脱离实践并受其检验，“第二个结合”同样如此。它虽是当代的原创命题，但是其生发历程贯通着与中国现实紧密相连的实践逻辑。因此，要了解“第二个结合”，就要了解我国文化建设的实践走向。

近代以来，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成为中国人民必须回答的中心问题。面对这一问题，不同阶级进行了各自的探索，在历史浪潮冲刷之后，免受侵蚀的方案却所剩无几。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革命的无产阶级自觉担负起这个历史责任，为实现民族复兴进行坚持不懈的奋斗。围绕“站起来”的革命主题，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从中国基本国情、历史变革和人民的思维方式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自主寻求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为紧迫形势找到科学之道。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毛泽东团结广大人民创造出以“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①为指导，以“我们民族的特性”^②为特征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用辩证唯物的观点赋予“实事求是”崭新的哲学内涵，完成了《实践论》《矛盾论》等多部经典著作，让带有中国风格、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③，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了改造现实的实践经验和智慧。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页。

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5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与时代和平发展的大势,确立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时期围绕“富起来”的时代课题,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定“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①,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展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强大生命力。处于新时期的历任领导集体深刻把握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历史性嬗变,注重“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②,弘扬和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此催发中国人民对“第二个结合”的进一步探索,创制出丰硕的原创性概念。比如,中国现代化建设融入了“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希冀,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小康之家”;“如乐之和,无所不谐”的“和合”思想理念,衍生出“和谐社会”的追求。“第二个结合”兼顾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和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在一脉相承中与时偕行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围绕“强起来”的时代课题,全国各族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带领下,奋发进取地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不断开辟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新境界。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转变,标志着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正本清源工作建设,身体力行地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治国理政的各个领域。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结了诚心正己、仁爱友善的精神追求,“全球文明倡议”彰显了求同存异、弘义融利的价值取向,“一带一路”倡议创造性地传承了古代丝绸之路精神等等。这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理念主张镌刻着中国文化的印记,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③。

(二) 理论前提: 互通共荣的理论特质促成“第二个结合”

业已存在的思想资源为生成“第二个结合”供给了理论条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要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需求相契合,二者在差别性统一的关系中相互补充、共创辉煌。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特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要求相互成就,为“第二个结合”建构起得以生发的理论空间。如果把“第二个结合”仅仅理解为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传统文化的单向作用,则难以把握“第二个结合”双向运动的全貌,还需要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开花的滋养作用。一方面,产生于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发挥出强大的实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践效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①,取得中华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的本土关怀,形成科学真理、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交相辉映的丰硕成果。另一方面,农耕文明孕育的中国传统文化以不发达生产力为基础,其中落后消极的内容不可避免地成为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桎梏”。面对这一文化形态暴露出的历史局限性,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伟大的认识工具”^②科学地批判、改造、重塑文化传统,才能激发中华文明现代性的基因活力,更好地“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③。

其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逻辑观点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理思维形成差别的同一,为“第二个结合”提供契合会通的多个领域。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质上完全一致,则凝固了“第二个结合”的动态过程,需要看到二者基于“中外之异”和“古今之别”的相通之处。一方面,二者的差别为“第二个结合”提供了必要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在地域、民族上存在差异,但不是主要差异,主要的是时代和阶级的差别。这种差别的存在启发我们思考如何形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先进性,并为解答这一问题找到“第二个结合”的必要途径。另一方面,二者的契合为“第二个结合”提供了可能性。相互关联的事物之间存在的差异并非无法跨越的鸿沟,而是在发挥各自优势的同时找到互补的内容,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彼此契合是“结合”的前提,“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④。从治理观念看,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执政理念与安邦济世、民惟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相得益彰;从辩证逻辑看,作为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唯物辩证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的思辨智慧有相通兼容之处。

(三) 主体依托:多元主体的团结协作发展“第二个结合”

理论要变成现实需要依靠各个主体的实践活动,“第二个结合”也是如此,其最终成效与主体的实践能力和认知水平密切相关。因此,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同时抓好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形成全员共同参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局面。

中国共产党是“第二个结合”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肩负着信仰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任务。一方面,新时代文化建设需要中国共产党引领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能够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运用于中华五千年文明赓续复兴之中,始终捍卫真理、保持定力、坚守正道,同时革故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6页。

②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

③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28页。

④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新、顺势而变、注重创新，在超越自我中实现重大突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战略选择。另一方面，新时代文化建设需要中国共产党提供有力保障。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尊重与守护人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不断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独立性与先进性建设。在各方文化的纷扰下，文化建设道路并非一帆风顺，独立自主地走好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发展道路、保持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态势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人民群众是“第二个结合”的践行者和主力军，书写着辛勤奋斗的民族历史，创造着丰富多彩的民族财富。其一，“第二个结合”的理论成果是对中国人民长期文化建设的规律性总结。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实践经验是理论创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①。只有以无产阶级思想为指导对“原材料”进行加工制作，才能使之上升为指导实践的行为原则。其二，“第二个结合”要变成现实，离不开人民群众的现实实践，因为“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②。“第二个结合”体现了中华儿女的文明复兴夙愿，凝聚着中国人民的集体智慧，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在一代代中国人民的实干中丰富壮大。其三，人民群众需要教育引导才能形成思想和行动上的自觉，而中国共产党在教育引导和思想革新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中国共产党要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坚决贯彻群众路线，让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领域中充分发挥首创精神和实践伟力。

杰出人物是“第二个结合”的模范者和促进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贡献优秀品质和卓越才能。一方面，先进人物善于立足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将自身的独特优势与中国任务相结合，设计出宏伟蓝图并提出富有进步意义的战略方案。另一方面，先进人物的行为具有模范带头作用。人民群众把先进人物作为学习的对象，以此为标准规范自身的行为。只有把“领导骨干和参加学习的广大群众密切结合”^③起来，才能提升人民群众的思想境界，充分调动各类主体共同参与的积极性。同时，“第二个结合”的任务要求又为领导干部创造了提升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的锻炼机会，领导干部只有坚定立场、强化本领，才能交上人民满意、社会认可的工作答卷。

二、何以释义：“第二个结合”的核心要义

“结合之新”“结合之成”“结合之思”构成“第二个结合”核心要义的三重内在维度，分别对应“第二个结合”中蕴含的创新内容、成果形态和思维方式。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8页。

（一）结合之新：“第二个结合”的新意所在

“第二个结合”既烙印着来自中国历史传统的文化基因，又具备来自时代发展道路的鲜明特征，其创新之处在于理想追求彼此契合、价值观念有机化合以及文明形态相互融合。

“第二个结合”用中华民族的社会追求讲述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开创出独具本国特色的发展路径。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确立得益于“第二个结合”。中国共产党把“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追求转化为初心使命，融入求索救国救民道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发展壮大新时代党和国家的事业中。这是中华文明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解读，也是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与中国本土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另一方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启发于“第二个结合”。“中国特色”立足我国的国情和民情，明辨良莠、吸收精华，形成强大的历史穿透力、文化感染力，表明辩证对待文化“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①的正确态度。这一过程生动呈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向度，是党和国家的事业在新时代蓬勃发展的重要体现。

“第二个结合”用中华文明的连续统一性延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育了新时代文化使命的价值源泉。一方面，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中国精神是“第二个结合”在价值层面的集中体现，反映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这一特性不仅体现为纵向上朝代更迭的线性连续，而且表现为横向上精神内核的一以贯之。中华民族作为“历史的民族”，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不断进行关于历史及其意义的反思。因此，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早已融为一体。另一方面，核心价值观是用以维系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纽带和思想基础，反映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这种文明特性形象表达了中华民族“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观念，构成了国家的核心利益，激励着英雄的中华儿女为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不懈奋斗。从价值观的现实功用要求出发，“第二个结合”不能简单回归到纯粹解释性的学说，而是要在文明演进过程中成为切实指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行动指南。

“第二个结合”用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汇聚多样的文明成果，确立了文明形态和谐共荣的思想主题。和谐是在特定条件下达到的平衡、协调、合作的状态，人类文明只有在和谐相处的前提下才能繁荣发展。一方面，“和而不同”是对原创性文明的尊重。每一种文明都在特定自然环境、历史背景、文化传统中生长出来，饱含民族特色和思想智慧。文明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文明的多样性为人类杰作问世供给了丰厚资源。另一方面，“美美与共”是对文明认同的维护。中华民族“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和格局，既表现为中华文明体量庞大、内容翔实，各领域之间联系广泛、融会贯通，又表现为中华文明善于消弭文明隔阂，

^①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形成与本民族价值理念相适应的新文化,实现中华文明体系的不断充实和发展。

(二) 结合之成:“第二个结合”的成果所得

“第二个结合”不仅在深刻总结历史的基础上揭示客观规律,而且在潜心观照现实的过程中塑造创新性成果。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中华文明的当代形态以及世界文明的进步形态有机统一于“第二个结合”衍生的生命体之中。

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是“第二个结合”参与现代化建设的文明追求。这一成果吸取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以中国式视角梳理现代文化建设的新思路、诠释现代文化建设的新概念、提出现代化文化建设的新要求。其一,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它克服了以前阶级形态的弊端,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终结”的狭隘观点,从历史发展演进的客观规律和长期文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出发,为世界人民创造现代文化形态提供了全新的参考。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现代文明在我国制度层面的重要体现。制度的建构离不开文化价值的浸染,只有与本国文化价值相适应的制度安排,才容易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夯实制度执行的群众基础;反之,隔绝文化价值的制度安排会水土不服,引起社会动荡。“第二个结合”的智慧在于强化了我国的制度优势,让我们既能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背景,又能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投影。

中华文明的当代形态是“第二个结合”捍卫文化主体性的全新选择。“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中华文明特性和日臻完善的现代进步元素点燃了当代文化生命力,延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区间。其一,既有文化内涵创造性转化为新时代文化意蕴,激活古老文明的现代基因。创造性转化不是简单的文化移植,而是与现实社会要求相接轨,与人民时代要求相吻合,实现古今文明友好对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在文化受众日用而不觉的生活价值中才能得以保存、传承和更新。其二,传统文化的建构理路创新性发展为新时代文化的缔造逻辑,因时制宜地实现文化新生再造。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有解决现实问题和回应时代课题的共同旨归,形成重构史观、重塑认同、重释文明的有机统一体。追本溯源地讲,这一形态的形成得益于中国人民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这不仅厚植了中华文化沃土,还同“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划清了界限。

世界文明的进步形态是“第二个结合”解决人类面临共同难题的中国智慧。这一形态扎根人类历史和世界现状,科学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方向,并用中国方式传达人类的共同价值。其一,“世界历史”的演变作为生产方式发展变革的结果,突破了原始自守状态的地区拘囿性和“民族的片面性”^①,促使各个国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页。

建立起以普遍交往为特征的密切联系。这里的“结果”并不是完成状态，而是强调世界相互关联性的发展状态。其二，以“仁”为核心的博爱、胸怀、担当、道义形塑了中华民族崇尚和平的天性，摒弃了恃强凌弱的霸权思维。古代丝绸之路见证我国的“亲仁善邻”的友好往来，海上扬帆远航的船队传达“协和万邦”的声音，“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是我国扶危济困、与人为善的真实写照。“第二个结合”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的眼光揆度时代，主张以共赢思维应对复杂交织的全球挑战，营造公道正义的国际环境。

（三）结合之思：“第二个结合”的思维所悟

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思维方法作为方法论的微观层面，是主体揭示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逻辑映射。因此，从方法论层面探讨“第二个结合”的思维方式，具体表现为辩证思维、历史思维和战略思维。

辩证思维是唯物辩证法在思维中的运用，是用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集中体现。用辩证思维推进“第二个结合”的进程，关键在于处理好理论创新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张力关系。从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统一的角度来看，在现代性文化与前现代性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备某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②价值，其超越性精神可以穿越时代得以保留。同时，现代文化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人的本质力量在特定社会关系中的对象化产物，是历史主体智慧的精华。因此，“第二个结合”既有各国优秀文明成果的共同特征，又具有立足本国文化传统的中国特色。从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辩证统一的角度来看，“第二个结合”要达到文明复兴的目的，需要以遵循文化建设的客观规律为前提，体现了正确合理的事实判断，同时“第二个结合”的过程又是人民不断总结规律、应用规律的过程，体现了理论创新的主体意义。

历史思维是辩证思维和历史眼光相结合的具体体现，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贯通中对社会现实问题进行科学的观察和思考。用历史思维推进“第二个结合”的进程，关键在于把握好逻辑与历史的辩证关系。列宁认为，在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中，“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③。这一论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在理论创新中的方法论指导，同样“第二个结合”也是历史与逻辑互动的结果。一方面，历史存在是逻辑存在的基础。“历史从哪里开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11页。

③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3页。

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①“第二个结合”的课题在不同历史时期下具有不同的重点内容,探讨“第二个结合”实质上是阐述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中经验和教训呈现出的历史逻辑。另一方面,逻辑存在是思维中历史存在的再现。历史的东西包括零碎的、偶然的细节,而逻辑的东西是对历史东西的加工制作,经过严密分析使历史的“偶然性融合在必然性中”^②。因此,正确理解“第二个结合”,不仅需要把握历史过程,还要把握其中的学理逻辑。

战略思维是立足思维整体性、全局性、长期性,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的思维方法,事关社会发展的未来走向与整体谋划。用战略思维推进“第二个结合”的进程,关键在于处理好前瞻性、全局性与系统性的关系。“第二个结合”的前瞻性在于“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去细心观望”^③文化发展的趋势并作出科学的预判,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新的文化生命体。“第二个结合”的全局性在于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思想成果体系把握文明建设的本质属性、特点表征、地位判断和价值意义等多个方位,形成宏大开阔的理论视野。“第二个结合”的系统性在于把握结合过程中的各个要素及其结构和功能的相互关系,提升各要素间的协同效应和内部的有序化程度。总而言之,前瞻性为全局性和系统性提供了方向引导,全局性为前瞻性和系统性提供了战略部署,而系统性则为前瞻性和全局性提供了内在理路。

三、何以实现:“第二个结合”的实践路径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推进“第二个结合”创造丰硕的理论成果,就应该以时代的新需求为导向,坚持举旗定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以及兼济中外。

(一) 举旗定向:坚守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文化建设中的统领地位

“魂脉”是指定向延伸、连贯而成的系统中起统领作用的部分。马克思主义作为“魂脉”,其统领地位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不能模糊、不能混乱,如此才能保证“第二个结合”沿着正确的方向科学推进。

新时代要把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做好,必须不断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根本指导思想中的地位。纵观古今,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丧失意味着国家和民族的指导思想发生紊乱,随之而来的将是政权离散和民族消亡。我国的发展必须吸取这些国家失败的惨痛教训,始终坚信“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24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42页。

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①。其一，强化制度意识，增进制度认同，坚定制度自信，践行制度自觉，形成党统一领导、各部门相互配合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新格局，灵活运用耦合性、协调性、科学化、系统化的工作方法，找准新时代意识形态问题的突破口和着力点，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工作效能，保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的持续化、规范化、常态化。其二，完善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工作机制。“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②，往往理论思维越深刻，对理论的理解也就越透彻，对理论的践行也就越自觉。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应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起来，以史为鉴、知古鉴今，在现实工作和学习中拓宽政治视野，续写“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③。其三，提升新型主流媒体的网络意识形态引领力。伴随人类社会进入智能化时代，网络空间的博弈不只局限于技术升级间的斗争，多元信息冲突对舆论的裹挟更需要引起关注。在积极适应当前网络技术更新迭代的同时，增强兼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优势的互联思维，充分利用好讲故事和讲道理的方式是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关键环节。综上所述，以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引领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④，只有守住“第二个结合”的战略阵地，才能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二）继往开来：挖掘中华文明在宏阔历史纵深中的接榫机制

“根脉”是指汲取营养、丰富壮大的源头活水。作为人类文明长河中绵延数千年之久的“根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淬炼出本民族“治国理政的思想智慧、格物究理的思想方法、修身处世的道德理念”^⑤。只有发挥中华文化的历史和现实的双重价值，才能不断增强“第二个结合”的文化底气。

新时代要厚植中国道路的历史内涵和文化底蕴，必须准确把握中华文明古今会通、源流互质的衔接机制。浩如烟海的中华典籍保留了中国人民最丰富的历史记忆，为后继者打造了跨越时空与古圣先贤对话的空间。其一，充分发挥中华文化基因的连通作用。中华文化基因是在五千年的文明结构中凝练出的文化密码，保证遭受冲击后底色不变，厚植精元后自强不息，损益盈虚后与时俱进。这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塑造了我国的原创性的文明品格。“第二个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7页。

③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6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五九）》（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0页。

⑤ 习近平：《为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求是》2023年第1期。

结合”立足历史纵深的轴线，将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社会主义运动史、近代人民奋斗史、改革开放发展史的文化基因接续起来，证明了“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①。文化基因不仅能跨越山海，超越国界，还能与现代化的文化价值融会贯通，赋予中华文明现代化形态深厚底蕴。其二，科学运用中华文明传承与创新相统一的规律。文明的传承就是勿忘本来，保持历史定力。“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② 文明的创新就是面向未来，开创新时代文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③。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创新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既不能全盘沿袭传统，因循守旧，也不能完全抛弃历史，另起炉灶。综上所述，只有以中华文明接榫会通的自觉兼顾中华文化的独特优势和文化繁荣的时代要求，才能为“第二个结合”找到现实着力点。

（三）与时俱进：拓展中国方案在时代激荡变局中的优势空间

绘制新时代的中国方案需要在融会贯通“根脉”和“魂脉”的基础上，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运筹鲜活的时代气韵和鲜明的民族神韵，“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④，不断开辟“根魂相宜”的新境界。

新时代要造就文明形态的更新机制，推进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进程，必须聚焦世界形势的潮流涌现和时代要求的现实考量。其一，把握“两个大局”中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相互联系的机遇和挑战共同构成“两个大局”中普遍存在的整体样态。挑战就是矛盾叠加阻碍事物发展的障碍，机遇就是矛盾演化过程中暴露的解决空间，同一系统结构中的挑战和机遇会在条件成熟时发生转化。只有洞悉深藏于两者之间的学理机制，才能为防范风险和化解麻烦做好准备。另一方面，“变”与“不变”在“两个大局”中实现辩证统一。对实现民族复兴而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是不断变化的机遇和挑战，要应对状况之“变”，必须坚守初心使命、原则底线之“不变”。“两个大局”是中国方案育先机 and 开新局的现实场域，也是更新中国方案内容的客观依据。其二，以问题导向观点切准时代课题。“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⑤ 一方面，要善于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我们强调增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9页。

③ 习近平：《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④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人民日报》2023年7月2日。

⑤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7页。

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①既要用矛盾分析方法锁定问题出现的范围，又要透视复杂问题中所隐含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要有效解决问题和预见问题。掌握解决问题主动权的关键在于找到科学布局的重要基点，提升解决措施的精准性、系统性和典型性。同时，坚持问题导向不仅要看到现状，更要看到未来，从运动中看到变化，从变化中看到发展，制定解决问题的前瞻性策略。综上所述，只有全面地观察时代风云的广阔图景，才能激扬“第二个结合”更新中国方案的动力。

（四）兼济中外：促进文明主体在惠己达人关系中的友好交流

中国取得今日之成就离不开中国人民坚持独立思考，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在发展没有现成的答案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了“自主”与“外鉴”的关系，使“第二个结合”在推进世界文明进程中作出突出贡献。

新时代要走向世界文明进步辐射，必须以胸怀天下的格局观照事关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议题。其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是立足“自主”基础，“外鉴”一切优秀成果，创造有益于人类文明的理论观点和价值体系的应有之义。“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②时代的变革催促思想的革新，植根中国、融通内外、底色鲜明、引领时代是这一体系构建的“时代宣言”。中华民族虚怀若谷的文化心态造就了中华文明博采众长的强大生命力，同时我们还具备独立自主的思维能力。如果完全遵循国外的思想方法，生搬硬套别人的理论成果，不仅难以形成自主的社会科学体系，而且会以本民族文化毁灭殆尽作为代价。因此，必须要以中国的国情和民情为观照，以世界发展的潮流为导向，实现“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其二，构建独具中国特色的传播体系是在“外鉴”其他国家文明成果的同时“自主”壮大中华文明体系、增强中国话语的说服力和影响力的必然之举。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体现了我国高度的文化自信，这一自信来自历史文脉历经沧桑、亘古弥新，来自精神血脉坚毅顽强、慷慨激昂，来自时代气脉欣欣向荣、富强昌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不是特定词组的简单排列或堆砌，而是要建立具体概念或范畴的有机联系，形成回答现实问题的理论系统。理论的阐释需要道理的支撑，道理的整理又离不开经验的总结。因此，应该全面总结经验，用容易为国际社会理解的语言逻辑阐发凝聚中国观点的价值体系。综上所述，只有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

① 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9年第2期。

②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同”^① 作为文化使命担当，才能充分发挥“第二个结合”向上向善、造福世界的道义性。

Exploring the Triple Dimensions of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Yang Haibo Pei Zhaojie

Abstract: The “Second Combination” represents the CPC’s high consciousness of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the new era. This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has been generated and developed through summarizing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with the times, within 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utual communication and prosperity, and under the unity and cooper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The core essence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focuses on three topics: “the novelty of combination”, “the completion of combination”, and “the thinking of combination”, and provides answers on the novelty, achievements, and insights gained from thinking. To turn this theory into reality, it is necessary to uphold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Marxism in China’s cultural construction, explore the docking mechanism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he vast historical depth, expand the advantageous space of Chinese solutions in the turbulent changes of the times, and promote friendly exchanges among civilized subjects in the relationship of benefiting oneself and others. Only by deeply understanding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can we better promote the paradigm research of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Second Combination”; The New Era; Adapt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责任编辑：鲁法芹]

^① 习近平：《同舟共济克时艰，命运与共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1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视频主旨演讲》，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8 页。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可能性分析*

——以艾思奇《中庸观念的分析》为例

董起帆 董玉娴**

【摘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经验的总结，早在20世纪30年代相关学者就有这一文化自觉。在《中庸观念的分析》中，艾思奇肯定了以“度”解“中”的观念，批评了以“气”解“中”和以“善”解“中”的观念，初步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可能性。通过分析该案例，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可能性主要呈现为三方面内容：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世界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是结合之所以可能的前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基因上的相通与兼容是结合之所以可能的根据；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性地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结合之所以可能的方法。需要注意的是，在结合过程中也要尊重彼此之间的差异，坚持问题导向，以对时代问题的解决为着力点。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庸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①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

*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中庸》文本中的德育观研究”（项目号：2023lzujbkydx018）阶段性成果。

** 董起帆，哲学博士，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董玉娴，兰州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83页。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主要方法,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的历史总结。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命题,我们有必要回顾百年来对该命题发展作出贡献的经典文本与理论。鉴于此,本文以艾思奇《中庸观念的分析》为例,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可能性问题。

艾思奇认为:“可能性就是指将来可以实现出来的意思。而现实性就是指一种可能性已经实现出来的意思。”^②所谓“可能性”,一方面意味着事物尚未成为现实,另一方面意味着事物包含着可能转化为现实的诸要素。本文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可能性进行分析,就是对这一结合过程中可能转化为现实的诸要素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程远未结束。从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层面来看,要真正意义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需要对两者结合的可能性进行分析,掌握从可能转向现实的情形与条件。

一、可能的前提:资本主义文明的世界性传播

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蔓延所引发的物质与文化一体化现象,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③这里的所谓“文学”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可以宽泛地称为“文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张,诸地域、民族之间的联系和依赖不断加强,原本以独立方式存在的民族文化逐渐为资本主义文化所取代,一种具有世界意味的文化模式逐步形成。

对中国而言,近代以来经历了“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④的过程。面对以世界性与普遍主义姿态出现的资本主义文明,中华文明失去其本有优势,如何重估中华文明在现代世界中的价值,以及如何激发中华文明发展的潜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7页。

② 《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页。

④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77页。

能，成为近代以来有识之士所深思的核心问题之一。以艾思奇为例，他对中国传统之中庸思想的解读，体现出协调中国现代文化之世界性与民族性关系，其协调过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利用黑格尔哲学对中庸思想进行再阐释，使其具备现代品格；二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出发，对传统中庸思想做出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激发其在现代世界中的应用价值。

艾思奇认为：“若把中庸当做事物存在的原理之一看，那就用今日的哲学标准来衡量，它仍可以保持其一面的真理性。”^① 这里所谓“今日的哲学标准”指的就是黑格尔哲学中的“尺度”概念，而“仍可以保持其一面的真理性”则意味着破除传统将中庸视为存在之最高原理的理念。艾思奇认为：“在黑格尔，那论理学的质量篇中所说的一切，正符合这中庸教义所根据的事实，质量即在一定的量的限度内活动的质，也即是说事物性质的伸缩活动有不可逾越的极限，不越过极限，则质可以实存，越过极限，则原来的质的规定便被否定而突变为他种的质。”^② 更准确地说，他是用黑格尔所谓“尺度”来重新阐释中庸之“中”的概念。

作为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集大成者，黑格尔的哲学以追求精神之普遍性与世界性为目的。他认为：“尺度固然是外在的方式，是较多或较少，但是，它同时也是自身反思的，它不仅仅是漠不相关的外在的规定性，而且是自在之有的规定性。所以，尺度是有之具体真理；因此，许多民族把尺度当作某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来尊敬。”^③ 黑格尔认为，尺度作为质与量的统一，并不具有严格的属性，是事物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直接性与稳定性特征。直接性意味着可以以直观方式对其进行把握，稳定性意味着超越未知，事物发展的过去和未来可以保持在可控范围之内。也正是其所呈现之直接性与稳定性，致使早期人类文明中都对“尺度”表现出某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态度。黑格尔以古希腊人尊崇“中道”为例，认为：“在希腊人的宗教意识里，尺度的神圣性，特别是社会伦理方面的神圣性，便被想象为同一个司公正复仇之纳美西斯（Nemesis）女神相联系。在这个观念里包含有一个一般的信念，即举凡一切人世间的事物——财富、荣誉、权力，甚至快乐痛苦等——皆有其一定的尺度，超越这尺度就会招致沉沦和毁灭。即在客观世界里也有尺度可寻。在自然界里我们首先看见许多存在，其主要的内容都是尺度构成。”^④ 质与量统一于一定的尺度之中，超越尺度往往意味着未知与难以把握，因此从稳定性角度而言，对尺度的尊崇实质上是寻求稳定的生活。财富、荣誉、权力、快乐和痛苦等，只要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则人就可以以主体身份对可能发生之变动做出合理应对。

① 《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页。

② 《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页。

③ [德] 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57页。

④ [德]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5页。

从资本主义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来看,艾思奇引入“尺度”概念来阐释中庸之“中”,是让中国传统文化取得世界姿态的一种方式,而这一阐释过程必然面临着对原概念内涵的取舍。在中国传统阐释体系中,中庸之“中”主要有三个层面的内涵:首先,学者们普遍认同“中”即“不偏不倚”。“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①其次,宋明学者较多以“极”训“中”。在后世注解中究竟如何理解“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存在诸多分歧,有学者将“不偏不倚”解释为“正”,也有学者将其解释为“性”或“德”,更有学者将其解释为“道”。从相似性层面来看,所谓“正”“性”“道”“德”等内涵,都表示人或物存在的根本法则,这一法则支配人或物的存在与发展,我们可以称其为“至理”或“极”。在与朱熹的辩论中,陆九渊就以“极”训“中”,认为“盖极者,中也”^②。最后,以“上下通”解释“中”。在《说文解字》中,许慎认为:“中,内也,从口丨,上下通也。”^③简而言之,在以“通”解“中”表示中庸即上下通达之道,中庸之学即“体用一如”之学。

总结而言,历代关于中庸内涵的解释主要有三种代表性观点:一是把“中”理解为“折中”(不偏不倚);二是把“中”理解为“极”或“彻底”;三是把“中”理解为“上下通”。艾思奇对中国传统中庸之“中”的批评主要集中于“折中”内涵,而以“尺度”重新阐释“中”是在“极”或“彻底”层面上理解“中”。毛泽东认为:“中庸思想本来有折中主义的成分,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中主义,是孔子主义即儒家思想的基础。”^④这是从折中主义层面对“乡愿之中”的批评。然而,毛泽东同时也赞同具有辩证法意义的“中”概念,认为中庸“在于肯定质的安定性”^⑤。艾思奇也说:“中庸观念是有一定的真理内容的,它的错误不在于了解量变质的道理,而在于从形而上的观点上把这道理绝对化,使它变成死的不变的道德标准。”^⑥在艾思奇和毛泽东对中庸的重新阐发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都反对中庸之“折中”内涵,坚持从质变与量变的辩证发展过程来看中庸理念。

从艾思奇和毛泽东对中庸之道的重新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出,具有世界意味的黑格尔哲学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把“中”阐释为“尺度”,所谓“中道”即事物由量变向质变发展的过程,在尚未触及事物之质的界限之前,都可以称之为“中”的状态。从事物发展变化的层面而言,“中”的原则体现的就是“恰如其分”和“适宜”的原则,而这就是以“极”解“中”。^⑦在这一过程中,我们

① (宋)朱熹:《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② (宋)陆九渊:《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页。

③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64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68页。

⑥ 《艾思奇全书》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85页。

⑦ 周宪文:《论中:论中庸之中》,《东方杂志》1946年第42卷第12号。

可以看出中西文化之间的互动,也能看出资本主义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对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起到一定积极作用。

二、可能的根据:贯通与兼容

据上所述,艾思奇之所以能够对中庸做出新阐释,关键在于对黑格尔哲学的运用,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可能,其根据则在于两者在思想基础上的相通与兼容。所谓“贯通”,指向对两者之间通义的寻求。正如荀子所言:“夫公道通义之可以相兼容者,是胜人之道也。”^①面对现代世界文化发展的世界与民族之争,可能的解决之道就是“求同存异”,寻求彼此之间的通义。庄子云“道通为一”^②,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寻求“一”,就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也需要拓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地域。而所谓“兼容”,则往往意味着取舍与转化。作为生长于不同时代与地域背景之中的文化体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诸多抵牾之处,对此一种合理的态度是以理论融洽和现实问题之解决为原则,进行取舍与转化。

艾思奇把中庸之“中”等同于黑格尔哲学之“尺度”概念,是对两者相通性的寻求。但艾思奇同时也认为,黑格尔所理解之“尺度”概念存在唯心主义陷阱。“质量运动在新唯物论中是有普遍的高级的意义的,矛盾统一律和否定之否定律都不能离开质量变化而孤立存在。事物的矛盾不象黑格尔所说的只是范畴内部的纯理论学的矛盾,而是有质量的存在自身的矛盾。”^③黑格尔把质量运动理解为事物自身否定过程,因此在黑格尔那里,“‘尺度’的发展过程,只在于把质与量的潜在同一性明显地‘实现出来’”^④,亦即事物自身潜在同一性以矛盾方式不断运动,呈现为现实即质变与量变,而在尚未达到质变之临界值之前事物的存在状态即“尺度”。可以说在黑格尔那里,所谓“尺度”一方面意味着事物一种松散的、直接的存在状态,另一方面意味着临界值。这与中庸以“极”训“中”的内涵相似。

然而,通过艾思奇对黑格尔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出,黑格尔所理解的事物本身呈现出观念主义特征,而马克思主义者对黑格尔哲学的扬弃则是在抛弃其观念主义特征的同时,吸收其合理内涵。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黑格尔的“错误在于:这些规律是作为思维规律强加在自然界和历史上面的,而不是从它们推导

①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95页。

② (清)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0页。

③ 《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7~118页。

④ 张世英编著:《黑格尔〈小逻辑〉绎注》,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1页。

出来的”^①。具体到质变与量变规律，恩格斯重新阐释道：“自然界中一切质的差别，或是基于不同的化学成分，或是基于运动（能）的不同的量或不同的形式，或是——差不多总是这样——同时基于这两者。所以，没有物质或运动的增加或减少，即没有所考察的物体的量的变化，是不可能改变这个物体的质的。”^② 区别于黑格尔把质变与量变归因于事物自身潜在的矛盾发展，恩格斯将其归因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质”与“能”。

再具体到艾思奇，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从辩证唯物主义视角出发，对中国传统运用“气”解释事物变化发展尺度的观念做出了批评，这一批评过程即体现出贯通与兼容的品格。艾思奇认为：“气正则得其中而善，气不正则恶；孟子也常讲到‘养浩然之气’。是的，这是他们的说明。但如果严格地一加分析，便知道这说明等于没有说明。这是一种‘同语反复’。”^③ 在艾思奇看来，把“气”作为推动事物变化的动力，其实是一种“同语反复”。以“气”来阐释事物变化发展的观念，在传统中庸阐释体系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例如朱熹认为：“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④ 在朱熹看来，推动事物变化发展的物质性要素就是“气”，“气”呈现为阴阳属性，在阴阳互相冲突过程之中构成了事物的现实性存在。而艾思奇从辩证唯物主义视角出发，以“质”与“能”的观念更新了传统上存在模糊不清的“气”观念，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无独有偶，面对传统以“中”理解为“善”的观念，艾思奇认为：“这里有一点要注意的，即所谓的中也是善的同语反复，不见得真有中那么一个东西的。凡行为之恰到好处，他们便叫做适中，故所谓中者，也就是恰到好处的意思。”^⑤ 以“善”解“中”是把“中”视为确定不变的至高的法则，即“恰到好处”，即“善”。在艾思奇看来，这一解释也犯了同语反复的错误。“中”就是“恰到好处”，就是“善”的解释方式，并没有为“中”增加任何新的内容，而只是在观念之间以互释的方式进行缀连。而对于“善”的标准问题，艾思奇进一步论证道：“在一切历史社会里，善恶的标准只有两种：一是前进者的标准，一是保守者的标准。保守者的标准着眼于所谓固有的美德之固定化，着眼于安分守位；前进者则不满于固有的道德，而企求新的道德，新的善。但新的善不见得会劣于旧的善，不，新的善才是更高的善。”^⑥ 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来看，善恶标准从

① [德]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于光远等译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6页。

② [德]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于光远等译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6页。

③ 《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0页。

④ （宋）朱熹：《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⑤ 《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2页。

⑥ 《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6～77页。

来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客观环境之变化而变化，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善的标准也呈现为新旧交替的状态，而在观念内涵的深刻性上新善往往高于旧善。“善恶的互相转化，并不是什么‘气’的正不正，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引起的善恶标准之变化，生产力的发达之可能性就是善恶推移的本质。这才是转化的真正的说明。”^① 善恶标准之变化也是随着社会生产力之变化而变化。可以看出，区别于传统把“气”作为推动事物发展根本动力的观念，艾思奇秉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从辩证唯物主义视角来看事物的变化发展，同时也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来看善的标准问题。

从艾思奇对以“气”解“中”和以“善”解“中”的批评来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之所以可能的根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在基本概念的内涵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共通性，例如从“极”的层面来理解“中”显示出两者对质变与量变发展过程的真理性认识。正如田鹏颖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管在其阶级性上还是民族性上都看似不可约通，但在两者所关注的理论焦点、所阐述的基本思想上是相通的。”^② 二是面对两者之间的差异性，需要利用新的文化资源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从而实现两者之兼容。“作为一种崇尚理性和智慧的道德伦理型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从而有助于实现与马克思主义新文化的结合。当然，这里并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单方面地包容马克思主义，而是一种相互的包容性。”^③ 完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所具有的共通性与兼容性，正是两者结合的根据。

三、可能的方法：转化与融通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艾思奇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与其所使用的独特方法是不可分割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④ 正如王易所说：“新时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要义，并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① 《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7页。

② 田鹏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学理探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③ 刘建军：《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

④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7页。

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①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在方法上的可能性体现为两方面内容：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利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重释，以激活其潜在的思想因子；二是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致力于回答时代和实践所提出的重大课题。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不是“以马废儒”也不是“以儒代马”^②，“以马废儒”是割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根基，而“以儒代马”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方法上要真正实现将两者结合，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文化的普适性与包容性特征。在《中庸观念的分析》中，艾思奇利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对传统中庸思想进行了重新阐释。他对“中”与“质变与量变”观念之间相通性的探索，就显示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重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无独有偶，哲学家李泽厚在讲到“度”这一概念时，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释之中。他认为：“‘度’并不存在于任何对象（object）中，也不存在于意识（consciousness）中，而首先要出现在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中，即实践——实用中。它本身是人的一种创造（creation），一种制作……从上古以来，中国思想一直强调‘中’‘和’。‘中’‘和’就是‘度’的实现和对象化（客观化）。 ”^③ 李泽厚把“度”等同于“中”与艾思奇把“尺度”等同于“中”具有一致之处。同时，与艾思奇相似，李泽厚也认为区别于黑格尔中观念自身发展角度去理解“尺度”，更应该从生产生活中去理解“中”或“度”。“度”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对事物自身发展规律的把握和运用。

而从艾思奇对以“气”解“中”和以“善”解“中”的批评中，也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远不是一种静止的、教条的与本本式的结合，而是一种创造性的结合。尤其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言，只有将其潜在的思想因子重新激发出来，才能更有说服力，才能更加彰显其理论魅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

① 王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考察与时代要求》，《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3期。

② 戴木才：《“以儒代马论”和“以马废儒论”批判——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③ 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9～10页。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①“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法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关键。在新时代条件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直面时代发展之具体境遇，需要以新的理论姿态应对时代复杂状况。艾思奇从事物运动发展的物质与能量层面重新阐释“中”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我们对中庸新的理解。自宋明理学以来，对中庸之狭隘化理解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折中主义，然而对以“气”解“中”与以“善”解“中”的批评，让“中”的原则逐渐具备表示事物自身存在法则的意味，从而拓宽了“中”的概念内涵。

同时，艾思奇把中庸思想运用于分析中国革命形势，显示出理论创作以回答时代与实践重大问题为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②从艾思奇对中庸观念的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类似指向。艾思奇认为：“事物的质和量的这种相互依赖的性质或质和量的这种统一性，在哲学上叫做度。把握事物的质和量的统一性，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③“在掌握上过了一定的‘度’时，就要犯‘左’的冒险主义错误，反过来说，如果‘不及’一定的‘度’，就有右倾的危险。”^④这里所谓“适度”的原则与中国传统中庸的原则在内涵上具有一致性，艾思奇把对度的把握运用到人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之中，让理论直面人类实践活动，在实践活动之中去把握理论，去创新与转化理论，从而让理论永葆生命。与艾思奇相似，毛泽东在谈及中庸思想时把中庸思想与当时中国的革命现实相关联，将其运用于对革命过程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分析。^⑤

总之，在新时代条件下，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在方法上需要做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彰显的世界性与普适性揭示出来，深入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共通性，同时以观照和回答时代问题为具体着力点，充分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文化动力，从而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四、总结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可能性上可以从可能的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8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0页。

③ 《艾思奇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4页。

④ 《艾思奇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4～615页。

⑤ 参见张培高、杨莉：《论毛泽东对“中庸”的诠释》，《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前提、可能的根据和可能的方法三个层面进行分析。从可能的前提来看，两者相结合的现实背景是资本主义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带来了世界文明与地域文明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作为对资本主义文明展开系统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在批判的同时也吸收了其合理要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之所以可能，其前提在于人类世界的发展已经进入世界历史阶段，前现代时期文明之间各自为营，独立发展的趋势已被完全打破，因此两者的结合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文化发展的必然。从两者结合可能的根据来看，两者在思想文化上的相通性为结合提供了互释的可能，同时对彼此之间差异的尊重与创造性转化也为两者结合提供了新的基础。从方法角度来看，两者之结合要关注三点：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二是要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在对问题的分析与解决中不断探索两者结合的新着力点；三是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姿态，重新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潜在的文化动力，让作为中华民族根和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条件下重新展现其魅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永不枯竭的思想贡献。

Probability Analysis of Combin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ake Ai Siqi's “Analysis on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as an Example

Dong Qifan Dong Yuxian

Abstract: The combination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a summary of the century-old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levant scholars had this cultural awareness as early as the 1930s. In “Analysis on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Ai Siqi preliminarily explored Marx's understanding of “Zhong” through his affirmation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Zhong” by “degree”, his criticism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Zhong” by “Qi”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Zhong” by “goodnes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is case, we believe that the possibility of combin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mainly presents three aspects: The conflict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world and national cultures brought about by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s The premise of the

combination; the cultural genetic connectivity and 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basis for the possibility of the combination; and the guiding status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s of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are method of combin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during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we must also respect each other's differences, adhere to a problem orientation, and focus on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the times.

Keywords: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Doctrine of the Mean

[责任编辑:鲁法芹]

“两个结合”的文化指向、方法依托和现实路径

——基于对毛泽东中西文化观的考察

戴一帆*

【摘要】作为“两个结合”重大论断的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指向文化观念的比较和重塑。回望历史，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作为一种系统性的外来理念传入中国的，这使其不可避免地处于同中国传统的互动之中，以期被理解，进而本土化。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有历史经验可追溯。其中，毛泽东中西文化观的历史演进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早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文化观念和工作方法，由此可归纳出“明确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秉持文化比较的科学方法”“追求文化自信的理想状态”等三方面基本经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中，上述经验获得现实的运用场景，通过文化守正、创新和自信，构建新的文化样态，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深入结合提供思想环境，从而引领社会革新。

【关键词】“两个结合”；毛泽东中西文化观；历史演进；文化比较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①，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建党百年历史节点，在“七一”重要讲话中着重提出的重大理论观点。“两个结合”的内在要求是密切关联的，文化层面的结合为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及方法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进而使理论和实践的深入结合得以可能。同时，植根于实践的理论发展也为文化结合塑造了新的起点。由此可见，文化观念的比较和重塑是“两个结合”论断的重要指向。

* 戴一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3页。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①，文化结合在历史回溯中能汲取相当经验。其中，毛泽东中西文化观的历史演进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早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文化观念和工作方法。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本土文化和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外来文化猛烈碰撞的时代，如何妥当地结合不同文化优势，回应社会变革诉求，探寻复兴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该时代的中心命题。尽管有所波折，但毛泽东中西文化观在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认识论逻辑中不断发展，承载着丰富的文化结合经验，这对当下社会的新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历史考察：毛泽东中西文化观的演进历程

以1919年和1949年为界，毛泽东中西文化观的历史演进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919年以前是毛泽东经其少年和青年历程对中西文化观的初步构建，主要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相互关系；1919—1949年是毛泽东中西文化观在革命实践和深刻反思基础上的发展成熟，聚焦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问题；1949年以后是社会主义文化自主建设和探索时期，毛泽东的文化观念在这一时期趋于主动，但在呈现出新特征的同时也遭受了不小挫折。

（一）1919年以前：毛泽东中西文化观的成型

19世纪末的中国，国力衰微，频遭强权侵略，随之而来的西方文化猛烈冲击着本土传统的根基。不过，生于韶山冲的毛泽东在少年时期并未受到外界时局干扰，接受了完整的传统教育。正如毛泽东晚年回忆所述，“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②。在私塾读书期间，毛泽东熟读《论语》《孟子》等儒家典籍，广泛涉猎《水浒传》《三国演义》《岳飞传》等文学著作，逐渐形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认知和天然情感：“上私塾的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③而“中国传统小说里怎么没有农民做主人公”的困惑则构成少年毛泽东对封建社会的初步反思。

毛泽东在1910年转入新式的东山高等小学堂就读，首次接触到经由严复、康有为等资产阶级维新派翻译的西方理论著作，继而对外方文化有了认知。其中，《新民丛报》中梁启超主笔的文章不仅条分缕析、常富感情^④，突破旧式八股的束缚，更是以透彻视角剖析了西方文化的先进成分，颇具感染力，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至于“觉得改良派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405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页。

③ [美]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④ 参见刘引泉：《中国民主革命时期通史》上卷，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402页。

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①。1912年,毛泽东前往长沙,在省立图书馆研读了包括《物种起源》《国富论》《逻辑》在内的西方自然和社会科学经典。1913—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深受老师杨昌济的教诲,逐步将视野转向西方,并对德国哲学家包尔生所著《伦理学原理》作了一万多字的批注。

文化观首先在不同文化的比较中成型,进而促成文化反思。因此,毛泽东早期中西文化观的主要内容是对传统文化的再审视。毛泽东早在1912年所作《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中便“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②;1917年,在《致黎锦熙信》中更是坦言“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③;1919年,在其主办的《湘江评论》中强调国人迷信的蒙昧状况:“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④对西方文化的先进部分,毛泽东则秉持广泛学习、积极接纳的态度。除阅读西方理论著作外,毛泽东热衷于参与扛起科学和民主大旗的《新青年》杂志所抛出的大讨论。据其同学周世钊回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毛泽东“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⑤。但青年毛泽东绝非盲从,全然相信西方道路便是中国未来。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五年间,毛泽东仍保留研读国学经典的习惯,对传统古籍多有涉猎,并在老师杨昌济的指引下深感“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⑥。在1918年赴法留学潮中,毛泽东也因此决定留在国内,以便明了国情,厘清问题的根本,免得“莫名其妙”^⑦。

“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⑧这是毛泽东早期文化观念的缩影。1917年毛泽东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体育之研究》便为典型。该文就体育教学的土洋之争,在沟通中西体育概念的基础上,一方面强调中国人自古以来融于血脉的“尚武”传统,批驳对西式体操“徒有形式而无精意”^⑨的片面认知和全盘照搬,认为此种机械推广只可能伤及学生身体;另一方面借西方“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⑩的思想改造传统“静养耻动”的观念,进而促成中西文化良好的互动与结合,而不至于顾此失

① 《毛泽东同志八十五诞辰纪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5页。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19页。

⑤ 郭德宏:《中共历史探微》,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42页。

⑥ 《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页。

⑦ 《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页。

⑧ 《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

⑨ 《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73页。

⑩ 《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66页。

彼，脱离实际。可见，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自成型以来便是讲究辩证关系的，认识到对中西文化的考量和取舍均应以中国实际为出发点——这与其人生经历和知识积累直接相关。不过，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实践，这一阶段毛泽东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总体聚焦于哲学领域，主要在理论上关注西方文化对传统文化可能的增进，希望以改造社会伦理的方式由上至下地变革社会。

（二）1919—1949 年：毛泽东中西文化观的发展

“直到一九一八年，我二十四岁，才知道马克思。”^① 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自西方传入中国，成为思想界理解社会病症、判断发展路径的重要抓手。因此，如何准确理解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西文化交互的关键性内容。毛泽东中西文化观在这一阶段的演进和成熟，主要以反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为中心。

片面认知和盲目崇拜易滋长教条主义。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后，因国内局势动荡，中国共产党选择在莫斯科近郊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若干对中国革命前景具有深远影响的文件及草案。尽管中共六大正确阐明了时下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省察了革命受挫的原因及教训，但共产国际的过度干预在相当程度上夺去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内革命事业中的话语权和自主权，致使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内出现共产国际的代理人，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部分党员挥舞“本本”、发号施令的工具。其中，王明的影响最为恶劣。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王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取得实际领导权，并在向忠发被捕后代理总书记，在党内掀起教条主义风，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直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革命事业遭受巨大损失。1935年1月，中央在遵义召开会议，首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身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的问题，正式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由此避免了教条主义对党的侵蚀和破坏。

为深刻明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肃清教条主义在党内余留的负面影响，毛泽东在1942—1945年发动整风运动，着重整顿党内的不良风气。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②，阐明贫乏肤浅的理解和脱离实际的空谈只能引致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毛泽东则指出任何刻板的形式重复只会挫伤革命热情，甚至“非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3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延安时期党的重要领导人著作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51页。

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①。不同于“中体西用”不伤及传统的“自大、空虚”^②，实践成为中西文化结合的方式和准绳。

实践性是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近成熟的重要标志，其中更深层的内涵在于厘清了文化的社会性质和历史由来。“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③，这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作出的重要论断，即文化是一定社会形态的产物，若要彻底改造文化，必先彻底改造社会，同时文化可起先行引领作用。因此，“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④，这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认为中华民族新的文化样态应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即应“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⑤，但要谨慎甄别，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⑥；应尊重自己的历史，以科学态度对待传统文化，而不应冥顽不化或全盘否定；应服务于广大群众的现实需要，而非少数集团的利益诉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中西文化观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土化问题，强调中西文化在革命进程中的互鉴融合。可见，文化比较的目的并非评价优劣，而在于寻求两相结合的可能性，以真正服务于社会的改造。不过，由于革命形势紧迫，局势瞬息万变，文化工作未处于主要位置，呈现的形式更多是遭遇挫折后略显被动的反思和纠偏。

（三）1949年以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的自主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事业转入建设阶段，社会主义文化也迈入自主探索的新阶段。起先，毛泽东的中西文化观呈现出不同以往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进一步发扬了辩证、实践的文化比较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多元的文化样态，充实了社会主义文化的结构。但自1966年后，由于“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⑦，加之“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⑧和源自外部的巨大压力，扩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0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1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1～1552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3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3页。

⑦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页。

⑧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

大化的阶级斗争被直接视作对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捍卫，从而掀起“文化大革命”，酿成严重后果。

辩证地看待中西文化，批判地加以运用，是毛泽东中西文化观的中心立场。“要把中国的好东西都学到。要重视中国的东西，否则很多研究就没有对象了。”^①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着力研究中国古籍，广泛阅读了大量史学文献，约四千万字的《二十四史》，“他是通读了的，有些部分不只读过一遍”^②。就《资治通鉴》一书，毛泽东也指出批判性阅读以深谙历史经验的必要，不应拘泥于其封建统治阶级的行文立场，同时也“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③。毛泽东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阐明文化比较的基本方针在于“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同时也要警惕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倾向，“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④

中西文化的比较分析、改造利用，落脚点必须是时下的社会建设，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1956年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文化比较的正确方法不应是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因为“‘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⑤。只有以基本国情为前提，汲取中外文化的先进成分，才能形成“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而不至于“丧失民族信心”。^⑥而本土文化或西方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发展，社会各界要积极讨论、辩论，因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⑦，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在斗争中才能实现发展。这是毛泽东于1956年推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理论基础，也是“双百”方针得以繁荣文化讨论、促成文化多元样态的基本原因。

二、方法依托：毛泽东中西文化观演进的基本经验

毛泽东中西文化观在其历史演进中呈现出的基本经验，实质上揭示了文化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应发挥的作用，阐明了文化革新的动因、方法和旨归，可凝练为“明确文化自觉的重要意义”“秉持文化比较的科学方法”“追求文化自信的理想状态”三方面内容，由此形成先进文化对历史规律的根本遵循及社会发展的正确引领。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⑧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0～751页。

② 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98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5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5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6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7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09页。

⑧ 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2页。

（一）明确文化自觉的重要意义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①因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症结、现实出路及发展取向，应以文化的全面考量为判断的基本前提，将其中深层的民族特性及思想脉络视作影响发展的重要因素，由此使文化趋近自觉自知状态，形成社会变革及其延续所需的长期动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现代化发展的路径和方向。正是如此，洋务派、维新派因局限于器物和制度的直接搬用而失败，而毛泽东则能立足本土传统，以文化交融结合的方式，找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道路。

首先，文化应自觉于自身历史局限，这是文化改造的动因，也是思想进而是社会得以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动力。正如毛泽东早年“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一般，闭塞腐旧的封建传统构成近代中国发展潜在的思想桎梏，致使改革的有益尝试终归限于“中学为体”的改良框架内，难以真正揭示落后根源，实现长足发展。因此，必须彻底破除所谓“体用”之分，在历史大势与规律中对既有文化加以深刻审视，以便充分认清内在于其中的制约因素，明晰改造文化、变革思想的必要与必然。

其次，文化应自觉于自身特有脉络和底蕴，这是文化改造的基点，是不丢本的关键，构成社会现代化的路径依托。“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②，任何文化的成型均有其历史渊源和发展意蕴，内含丰富的经由实践充分检验的人民智慧，并在极大程度上塑造了民族特有的思维模式和认知架构。因此，必须要熟谙历史，明晰传统文化的生成理路，将其中先进的积极成分与上述局限相区分。这正是毛泽东中西文化观在其演进中突出的特征，毛泽东对中国古典文献贯穿一生的研读，使其文化观念具备深厚的民族底色，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曲折探索中影响深远。

最后，文化应自觉于自身引领作用，这是文化改造的旨归。“文化引领时代风气之先。”^③文化在特定阶段的具体样态是社会各类主流思想的集中呈现，反映精神面貌及特质，从而得以汇聚群体认同、引导时代风气。正因如此，文化必须自觉与历史潮流相适应，与发展规律相契合，否则便易使思想和现实断裂，任何改变的有益尝试都将因脱离实际而步履维艰。但归根到底，文化的引领作用源自基于自觉认知的文化的自我革新与解放。换言之，只有在对文化的精华糟粕加以全面准确判断的前提下，思想才得以获取有效变革的条件并实现解放，起到正确引领社会发展和时代风气的作用。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76页。

（二）秉持文化比较的科学方法

文化自觉不仅是回望追溯式的自我审视，也是基于不同文化差异的比较反思。因此，文化自觉不仅揭示了文化改造的历史必然，也阐明了文化比较这一改造文化的基本方式。而文化比较并非直观的简单对照，其有效性在于确立科学的立场、原则和标准。

其一，必须站稳基本的中国立场。任何形式的文化比较均有其立场，这在根本上决定了文化比较的性质。至于中西文化的比较，则必须站稳中国立场，立足中国实情，解决中国问题，这是中西文化得以有效互动、有机结合的基本要求。

中西文化比较要以中国实情为基础。这是对比较环境的明晰，也是对比较主体的厘清。文化比较不是凭空展开的，有其现实境遇和历史特性。文化比较也并非天然存在，是以人为主体的形成比较，而人有其特定的文化底蕴、思维模式和理论视野。因此，不能也无法脱离这些现实条件谈文化异同及社会发展，否则便易本末倒置，“丧失民族信心”^①。而对国情的全面认知在于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统一，即在研读历史、把握传统文化全貌的同时，应深入基层，明晰人民群众基本诉求，抓住社会主要矛盾。

中西文化比较要以理论的中国化、现代化为主要路径。不同文化的有效沟通，只有在同一现实语境中才得以可能。换言之，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经典理论只有通过现代化、中国化的方式，才得以处于同一实践境遇、探讨同一社会问题、面向同一历史阶段，进而形成互动的基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政策在文化比较层面呈现的新经验。

中西文化比较要以中国问题的解决为目的。尽管有主被动之分，文化比较的动力多是源自社会突破自身困境的迫切需要。这便要求文化比较必须着眼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自下而上地进行，不应有过多偏离实践的思维实验。

其二，贯彻辩证的比较原则。中西文化的比较、取舍需建立在辩证甄别文化内容的基础之上，这是文化比较的重要原则。只有清晰认知各类文化的积极成分和历史局限，才能彻底摒弃教条主义的盲从或保守主义的顽固，以免陷入简单的文化优劣纷争。

“西洋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都好。”^②早在其中西文化观成型阶段，毛泽东便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有过透彻剖析和深刻批判，“以道德律为出于神之命令，而后能实行而不唾弃，此奴隶之心理也。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③，突出其中极端利己的消极倾向。在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主建设时期，毛泽东也着重强调对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6页。

^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30页。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①的抵制。西方文化的先进成分多见于科技发展水平和企业管理模式，对附着其上的剥削制度和享乐作风，应始终保持高度警惕。

当然，对西方文化一概照搬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可以持有一概排斥的态度。后者的实质为保守主义者复古守旧的消极尝试，是对本土文化的一概照搬。尽管中国历史源远流长，蕴含丰富的发展经验和治理智慧，但总体而言，“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②。因而必须对其中内容加以辩证分析和综合判断，筛去落后的压迫因素，遴选出具有人民性的、反封建的有益成分，再投入现实运用。

其三，坚守实践的检验标准。文化比较的最终结果并非在于区分优劣，形成某一文化对另一文化的否定，而在于以相结合的方式改造文化本身，进而引领社会现实的变革。因此，实践是检验文化结合成功的有效标准。

实践问题是文化比较的重要起因。如上所述，不同文化间的结合一般生发于社会发展受挫之际，寄托着破解时代所处困境的社会期望：无论是革命时期的救亡图存，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探索发展。因而，文化比较只有在面向真正的实际问题时，才得以获取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实践过程是文化结合的现实展开。“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③，这种改变是依托实践进行，亦即理论的“中国化”在于“化中国”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教训。^④只有通过不断实践，才能将文化比较、结合的各个方面完整展现出来，并以社会发展成效和人民认可程度为衡量指标，真正将文化结合从理性设想落实至革命实践。而实践过程中必然暴露出的文化比较结合的若干问题和局限，以及通过实践形成的新的社会环境和思想氛围，均为文化的自我审视及进一步改造提供了新的要求和空间。因此，实践的检验标准将文化从唯心的认识论中彻底解放出来，呈现出由感性认识至理性认识再至革命实践的循序渐进的发展规律，契合辩证唯物论的认识逻辑。

（三）追求文化自信的理想状态

文化的自觉认知及科学改造最终落脚于文化自信的建立，这是不同文化的交融结合得以长期延续的关键，也是社会发展得以顺利推进的保障。文化自信是对既有文化能够有效应对发展中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的信心，彰显文化内在的生命力。文化自信一方面源自对传统智慧的确认，另一方面在于主动汲取其他文化的

① 沙健孙：《毛泽东思想通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92页。

② 王立胜：《晚年毛泽东的艰苦探索》，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2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6页。

④ 参见顾海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百年辉煌与思想精粹》，《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3期。

积极成分，摒弃自身局限，并加以适时创新的文化弹性。因此，文化自信实质上是一种动态的理想状况，在历史变迁中不断对文化作出调整，使之趋于理想，进而引领社会发展。

在特定阶段的文化比较及结合中，文化自信具体表现为不同文化的地位平衡及文化比较的方式平稳。不同文化在比较过程中应处于平衡的相应位置，以免陷入偏激无效的比较状态。其中关键在于摒弃“体”“用”之分的旧观念，以基本原理的“学”来看待理解中西文化实质。由此，中外便趋于一致。^①而平衡的文化地位决定了文化比较的平稳进行，即以有机结合而非猛烈批判为主要的比较方式。文化批判固然是必要的，不同文化往往因历史和制度因素内含结构性的差异和冲突，批判能够充分暴露深层矛盾，减少试错风险。但文化地位的悬殊却往往会使正常的批判趋于偏激，从而形成错误判断，导致频繁攻击而非有效结合成为文化互动的主旋律。由此，文化比较仅限于区分高低优劣，并以互相攻击的方式增强所谓的“文化自信”，这显然有悖于中西文化比较的现实初衷，也是毛泽东中西文化观在其末期出现波折的主要原因。

三、现实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守正创新

文化的有效结合势必形成新的文化样态。在此意义上，“两个结合”在文化工作方面的要求及目标，应是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②，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时，在时下互联互通的世界交往中，不同文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相互激荡，不断渗入日常生活，这使得文化的革新及发展显得愈发重要和紧迫。在此，上述经由历史梳理总结出的基本经验获得应用场景。通过文化的守正、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得以自觉于中华文化的历史根脉，以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以自信面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守正

文化守正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和依托，实质是对“为什么人”这一核心问题的回应。^③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文化作为历史性产物，凝聚有社会共识和集体智慧，从而构成民族认同的基础，根植于个体的意识和行为中，因此必须守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另一方面，需明确文化作为社会上层建筑，归根结底是各阶级经济关系的反映，因此必须守住马克思主义的“本”，致力于构建以人民为中心、反映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文化。

^①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6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9页。

^③ 参见徐伟新等：《中国新常态》，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9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① 经由数千年积累沉淀的传统文化精粹映射出中国发展的历史脉络和中华民族特有的思想智慧及思维范式，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脉和起点。因此，必须秉持辩证的科学态度，结合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以是否益于人民生活、社会生产、民族复兴为评判标准，将以民为本、仁义博爱、和合大同等传统文化的积极成分与落后的封建糟粕区分开来，并加以传承赓续，不能因中西文化比较中可能凸显的传统文化局限而形成否定性的整体判断或出于单纯排外的目的主张复古。唯有如此，新时代的文化才得以站稳中国立场、凝聚民族认同。正所谓，“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②。

“守正就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③ 马克思主义决定了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必要指导。不同于用作少数人统治工具的资产阶级文化观，马克思主义将文化置于大众生活，将文化发展指向人类解放，从而引领时代思潮和社会发展。纵观百年党史，共产党人无不是先在思想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改造，继而在实践中主动运用、不断总结，最终实现社会变革。正是在此意义上，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并以坚定的先进信念“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④ 当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守也应贯彻辩证原则，不能“刻舟求剑”^⑤，需要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守住基本原理的“本”，而非教科书的“本本”。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

“文化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⑥ 作为特定时代精神的集中反映，文化必须通过创新与时代同步，获得新生命力。文化创新，就其具体方式而言，在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中，创造性转化在逻辑上应先于创新性发展，因为正如前文所述，不同类别的文化只有转化至同一语境中才得以比较互动。而创新性发展则以文化基于实践的有机结合为主要表现形式，并为文化转化提供了新的起点。

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西方外来文化对现实中国而言，均存有不同程度的时空距离，因而三者转化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现实语境的具体路径也各有侧重。中国传统文化需注重场景的转化。尽管传统文化融于民族血脉之中，但因间隔遥远且主要面向旧的社会问题，其在社会环境更迭加速的大背

①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问题》，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0年版，第266页。

②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页。

③ 《习近平重要讲话单行本》（2020年合订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81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882页。

⑤ 《习近平重要讲话单行本》（2020年合订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81页。

⑥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39页。

景下易产生距离感，甚至是抵触情绪。因此，传统文化必须对原有场景加以改造，使其以国人能接受的新形式阐释社会出现的新问题，彰显自身的智慧和活力。马克思主义理论应注重话语的转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在理论和实践中均得以检验，但其中的话语体系大抵是西式的，从而引致了片面的理解和盲目的崇拜。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在于理论内容的中国化，还在于理论话语的中国化。应结合实际，以国人能够准确理解的方式完整表述出来，以防上了“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①。西方外来文化则要注重立场的转化。要充分认识到西方先进文化的实质是少数统治阶级的剥削工具。因此在引入相关文化之前，必须将立场转化至无产阶级、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加以审视、考量、运用，免得受其蛊惑。

文化的创新性发展表现为文化与实际相结合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有机结合。经由转化后的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方外来文化必须要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应用到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中去，以此检验文化是否适用、理论是否有效，其中标准在于能否增进人民的基本利益、促进社会主义的长期建设。而正如感性认识至理性认识的飞跃一般，不同文化相结合的设想在社会实践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检验，从而在新时代呈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样态。置于“两个结合”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能的结合为与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供了路径参考，而此种结合也在实践进程中得到了验证，成为可行的结合。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只有守正创新，才得以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正是在此基础上交汇融通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方外来文化，并对其中民族的独特基因加以培育、对科学的理论基础加以检验、对与时俱进的先进特质加以呈现，由此具备文化自信的基本要素。

首先，文化自信源于其民族性。立稳国情、根植历史、赓续传统是文化内含民族特有基因的必要条件，也是形成民族广泛共鸣和认同的重要前提。只有与其他文化相区分，并切实融入日常生活，培育出独具特色的认知范式和践行方法，文化才有可能论及自信。其次，文化自信在于其科学性。就内容而言，文化的科学性体现为对事物发展一般规律的准确剖析、对文化作为社会变革的引领力量的着重确认以及对文化在实践进程中自我检验、自我完善的发展逻辑的深刻揭示，由此形成对文化的体系化认知。就其方法而言，文化的科学性是辩证而不机械、全面而不片面、平和而不偏激的理性态度。科学性要求文化必然自信，进而付诸实践，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维度，以推进时代发展。正是在此意义上，习近平总

^① 郑谦、张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76）》，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74～275页。

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①。最后,文化自信在于其先进性。一方面,社会主义文化以人民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是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狭隘观念的超越,指明了文化演进的必然方向;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认知与实践循序渐进的发展中始终与时代保持同频,不断赋予自身以新的意蕴,永葆先进,成为文化自信得以持久的活力保障。

越是文化自信,就越能够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越能够在同外来文化的互动交流中得到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不仅是多元文化有效互动、有机结合的积极成果,更为文化之间、文化与实践更趋深入全面和谐的交往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和新的起点。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文化自信得以成为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持久力量。

The Cultural Orientation, Methodolog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Path of the “Two Combinations”

—Based on an Examination of Mao Zedong’s Views o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Dai Yifan

Abstract: As a basic element of the major assertion of “Two Combination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points to the comparison and reshaping of cultural concepts. Looking back at history, Marxism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China as a systematic foreign concept, which made it inevitably in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ng with Chinese traditions with a view to being understood and then localized. In this sense,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m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an be traced back to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mong them,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Mao Zedong’s Views o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centrally reflects the cultural concepts and working methods form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in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2 页。

their early revolutionary practices, which can be summarized as “clarifying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and “upholding the scientific method of cultural comparison”, “pursuing the ideal state of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n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e above experiences have gained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by upholding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breaking new ground, new cultural patterns have been constructed to provide an ideological environment for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concrete realities, and thus lead to social innovation.

Keywords: “Two Combinations”; Mao Zedong’s Views o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Historical Evolution; Cultural Comparison

[责任编辑: 闫惠惠]



中国共产党文化 理论研究

留法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初步探索^{*}

罗芳芳^{**}

【摘要】留法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探索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留法勤工俭学期间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早期探索，不仅可以让当下青年了解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艰辛与不易，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也能让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自觉担负起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庄严历史责任，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留法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早期探索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解读，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根本立场和方法；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中国问题，探索思考解决中国问题的科学方法；已意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共通之处，初步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阐释马克思主义学说；初步厘清了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为研究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提供了基本思路。

【关键词】勤工俭学；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①

^{*} 本文系成都工业学院 2022 年度课题“高校理工科学生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2SZ009）、成都工业学院 2021—2022 年度教改课题“‘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实践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11201）阶段性成果。

^{**} 罗芳芳，成都工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6 页。

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救国救民之真理后，迫切希望进一步了解、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并急切想了解其他国家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学说运用于解决实际困境的，以及思考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于是他们中的部分成员选择了出国求学，如蔡和森、赵世炎、张申府等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就选择了去法国勤工俭学，与国内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共同探讨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学说，探索怎样将马克思主义学说运用于中国，开启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早期探索。这在一定意义上对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起着重要的推进作用。

以往学界对勤工俭学期间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较多地关注留法勤工俭学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及其原因、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方面，在留法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早期探索方面的成果较少。“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①因此，了解留法勤工俭学期间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早期探索，不仅可以让当下青年了解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艰辛与不易，进而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也能让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自觉担负起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的庄严历史责任，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

一、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根本立场和方法，重视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基础是要较为系统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留法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主要由两部分群体构成，一部分是出国前就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如蔡和森、张申府、赵世炎等；另一部分则是出国后经过思考与甄别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如邓小平、李维汉、聂荣臻、李富春、陈毅等。这两部分群体虽然选择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时间有些许差别，但他们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他们自选择马克思主义信仰后都“视马克思的著作为可贵可重”，也意识到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了解并不够，迫切渴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急切想看关于马克思、列宁、十月革命等的著作，因为“凡是相信某种人的学说，对于其著作，无有不珍视之理”。^②如蔡和森之所以会选择去法国留学，主要是他认为“法国肯定有许多我们在国内看不到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6页。

^② 南开大学历史系、天津历史博物馆编：《五四前后周恩来同志诗文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57页。

的报刊,肯定有许多介绍马克思、俄国、列宁的文章”^①。所以,蔡和森到法国后首先就打听法国哪些报纸是介绍马克思学说的,并立即专注于看这些报刊,如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道报》。为了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不仅抓紧时间学习法文,并且还猛看猛译了很多介绍马克思、列宁、俄国十月革命等的文章,以供其他进步知识分子和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学习。如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萧三所说:“一九二一年在法国蒙达时地方一个公学的教室里,桌椅摆成四方形。这里集合了几十个留法勤工俭学生。在教室里的柜子上、墙壁上贴着蔡和森同志硬译的《共产党宣言》等。”^②同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李维汉也说“集中阅读了和森以‘霸蛮’精神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若干关于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③。经过宣传、学习和工厂劳动实践,越来越多的进步知识分子确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信仰。刘伯坚就曾说:“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大多数是无产阶级的少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中,阶级觉悟逐渐提高,对资本主义有了深刻的认识后,有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信仰。他们担负着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的使命。”^④

随着越来越多的进步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蔡和森、赵世炎等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立即着手建立了旅欧少年共产党,不久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称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青年团的旅欧支部。青年团更是把加强党团员的内部训练问题即“以进行共产主义研究会为最要之事”^⑤,进而将旅欧青年团的“责任及今后应有之活动——大体规定为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换言之即是列宁所谓‘学’,‘学共产主义’”^⑥。因此,他们不仅在青年团内部成立了“共产主义研究会”,以供团员在组织内部进行共同研究和学习交流,而且制定了详细的学习计划。如聂荣臻所说:“每周都事先布置好学习内容,给大家指定一些书籍看。一到星期六,吃了晚饭就开会,分地区、分支部召开讨论会,区委的同志也分头参加,联系实际,畅谈学习体会。”^⑦除了共同研究这种学习方法外,还有“分门研究”的方法,即“以主义为纲,以书报为目,分别阅读,互相交换”,如聂荣臻和李富春等几位同志就进入了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办的夜校。在那里,他们同法国工人和法国共产党员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基础理论课程。^⑧李维汉则“和几个迁来的会友在附近一个胶鞋厂做

① 林家品:《蔡和森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4页。

②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3册,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418页。

③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页。

④ 陈永久:《刘伯坚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92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7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

⑦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33页。

⑧ 参见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32~33页。

工，在工余学习”，阅读了很多蔡和森翻译的著作。阅读完后他还同蔡和森进行了多次长谈，长谈内容“涉及范围很广，包括欧洲革命斗争形势、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区别、共产国际的性质与任务、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决裂等等内容”。通过阅读和谈话，李维汉深知“只有走十月革命才能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①

在宣传、学习、交流以及与其他思潮斗争的过程中，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更为系统、全面和深刻的认识与理解，明确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时代性，此外，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根本立场和方法，即注重“实际”，强调因时制宜，因为“共产主义不是一个老公式”^②。如赵世炎认为，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无政府主义者，只知高唱自由，忽视了现代社会生活所决定的群众意识”，而“我们共产主义者的行动，就是要随时随地能把问题与事实打落到实际上面”。^③ 蔡和森指出：“马克思的革命说完全立于客观的必然论之上，革命既是必然的。”^④ 张申府强调“不论主张什么东西，都要实地试试看”，鲜明指出“共产党的精华在其切实主义 Realisem”。^⑤ 周恩来更是将一种理论与方法能否经得起实际的试验、能否合乎科学精神作为迷信与信仰最根本的区别，经过对比与分析，他认为“马克思正因为立论准乎‘实际’，研究出来的改革办法必须‘实验’，所以才主张实行革命的共产主义；信此主义的人，所以才能勇于实行”^⑥，进而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前提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早期留法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除了珍惜在法国系统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机会外，还尤为重视将在法国所学、所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总体而言，他们主要是通过与国内志同道合的朋友书信往来或在国内进步期刊如《新青年》《先驱》《晨报》等上面刊发文章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的。如1921年3月，赵世炎在《给少年学会朋友们的来信》中就明确说自己担起收集留法青年撰写的稿件并给国内《少年》等期刊寄稿子的事：“约定于1921年1月以前汇齐大宗的稿子，寄到国内来。”^⑧ 同时，他还建议《少年》开辟“勤工俭学研究号”专栏，供留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页。

②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3册，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353页。

③ 《赵世炎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9页。

④ 《蔡和森文集》（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1页。

⑤ 《张申府文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7、36页。

⑥ 南开大学历史系、天津历史博物馆编：《五四前后周恩来同志诗文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55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0～41页。

⑧ 《赵世炎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4页。

法青年知识分子撰写的稿件用。蔡和森也经常与国内的毛泽东、陈独秀等通信，共同探讨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及中国出路等问题，如1920年5月至9月间，蔡和森就连续给毛泽东写了三封信，书信的主要内容就是探讨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改造中国出路问题。1921年2月，蔡和森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更是与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陈独秀系统探讨了他关于马克思学说、中国无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看法，并写道“感国内言论沉寂，有主义有系统的出版物几未之见”，表达了自己“以我读书阅报之所得，做一种有系统有主张极鲜明强固的文化运动。意欲择定论机关之同趣者发表之”的强烈愿望。这篇文章在1921年8月又被刊发在《新青年》上。张申府1922年写给陈独秀的信也刊发在了同年7月1日的《新青年》上，在信中他不仅分享了自己阅读列宁相关著作后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解，还对未来中国应该如何走有了初步的思考。

二、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中国问题，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已认识到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改造中国，但是怎样将共产主义运用到中国又是他们面临的一个难题。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已认识到“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先，我们必得要研究的是共产主义革命原则是怎样？中国社会现状与需要又是怎样？得了结论之后，再从结论里面去找实现方法”^①。如前所述，留法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已明确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阶级性和时代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根本的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就是与实际相结合。基于这一根本立场，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便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阐释和解决中国问题，寻求救国救民的科学方法。

一方面，他们认为“按照实际情形去说，中国革命正轨，也只有共产主义一条路”^②，只有共产主义“能够解决世界的乱象”^③，因此主张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即不是通过修正的、改良的方法而是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救国救民，因为“革命的标准在客观而不在主观……凡社会上发生了种种问题，而现社会现制度不能解决他，那末革命是一定不能免的了。你看中国今日所发生的问题，那一种能在现社会现制度之下解决？所以中国的社会革命，一定不能免的”^④。在经济制度方面，他们认为“依着现在中国的时势，一切缓和修正的办法都无所施，至于抑止，则中国民族根性与科学革命产业振兴本已格不相容，还不能和现

①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3册，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页。

②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3册，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337页。

③ 南开大学历史系、天津历史博物馆编：《五四前后周恩来同志诗文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5页。

④ 《蔡和森文集》（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页。

代生产力变化的趋势抗”^①。因此，“不能宜人云亦云，误认中国尚须守着那机械式的变化，尽量接收那流毒西方未已的资本主义”^②，更不能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发展中国实业。因为这样会“总是压迫贫民阶级使之成为纯粹的无产阶级，困苦颠连，以致历劫难复”，同时国际帝国主义是绝不会允许国际资本帮助中国发展实业的，所以“永远要与资本主义为敌”。^③故在经济制度方面主张“实行共产革命外，实无法可解”，同时强调共产主义“尤其是在中国，实负有变更经济制度的伟大使命。也只有他，方说得起变更，因为他是应着生产力发达的需要而加以顺势的变更，并非加以抑止，加以修正，加以和缓的”。^④在政治制度方面，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认为“党的组织是很重要的”，建议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阶级革命，革命成功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思考俄国三次革命的主力都是劳动阶级但为什么偏到十月革命才成功以及对比俄国十月革命为什么成功、德国正月革命为什么失败的原因后，均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一有坚强的共产党，一无坚强的共产党”^⑤。尤其指出，在俄国十月革命中共产党“在其中做了忠实的指导，唯一的指导”^⑥的作用尤为重要，因为“若无作率导的团体，运动怎能成功？寻常战争，不能无先锋；阶级战争又怎能缺了先锋？劳动阶级的这种先锋便是共产党。有了这个机关，乃有了指路的，有了这个机关，本阶级较进步的分子乃可领着全体群众，鼓舞而进”^⑦。结合中国的社会情况，他们还指出中国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大中产阶级、小中产阶级同时存在的国家，尤其是广大的无产阶级深受压迫与剥削已到了不能生活的田地，因此只有通过阶级革命、阶级战争的方式才能根本解决，“阶级战争是阶级社会必然的结果；阶级专政又是阶级战争必然的结果”^⑧，得出中国“一定要经俄国现在所用的方法，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一个唯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的结论，高呼“试问政权不在手，怎样去改造社会？怎样去组织共产主义的生产和消费？”^⑨

另一方面，他们强调中国革命要成功，根据中国的实际问题和物质条件务必要团结各进步阶级，“新旧军阀既都不足恃，所可待以救中国的，只有全中国的

①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3册，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318～319页。

② 南开大学历史系、天津历史博物馆编：《五四前后周恩来同志诗文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6页。

③ 南开大学历史系、天津历史博物馆编：《五四前后周恩来同志诗文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7页。

④ 南开大学历史系、天津历史博物馆编：《五四前后周恩来同志诗文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51页。

⑤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3册，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151页。

⑥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3册，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179页。

⑦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3册，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150页。

⑧ 《蔡和森文集》（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3页。

⑨ 《蔡和森文集》（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6页。

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①，要“合力打倒军阀，合力图谋独立”，因为“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一方面要夺取政权，一方面是不离弃群众的”^②。虽然“中国完全是个无产阶级的国，（大中产阶级为数极少，全无产阶级最多，半无产阶级——即中等之家——次之）”^③，但是中国的无产阶级“除少数交通便利都市，方开始团结训练之外，其余大部份受着产业不发达的影响，尚在杂居散处的状态中，实力是很薄弱的”^④，如果中国有产阶级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势力“里应外合，四面夹攻，一举手就压碎了”^⑤。在这样的形势下，为了保证革命能取得胜利，周恩来认为，首先“我们须看清我们的敌人和我们国民革命的势力究竟何在，且谁又是我们真实的友人”^⑥，他指出“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的列强”^⑦，还包括列强扶持的新旧军阀。那么，我们的友人即可团结的势力又有哪些呢？周恩来认为，国民革命的势力也就是可团结的势力至少包含了五派革命势力：海外华侨、工人阶级队伍、中国的知识界（尤其是青年学生最能无所忌惮地反对列强、反对军阀）、新兴的工商业家、庞大的农民阶级。他强调，这五派“是中国国民运动中最值得注意的革命势力。若能合此五派的革命分子于一个革命的政党统率之下，则国民革命的成功必不至太为辽远”^⑧。李慰农也将中国可团结的势力分为工人、农人、兵匪和学生四大类，他认为工人“是共产革命的先锋军”，因此“负有共产革命使命的人必得亲身插入里面做组织宣传指导的工作”^⑨；兵匪“觉悟过来，就是无产阶级的好朋友了”^⑩，所以要重视对兵匪的宣传组织运动；学生——“未来的共产社会革命，一大部份要仗他们做指导者”^⑪。不管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将中国国民革命可团结的力量做何种划分，但他们均强调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学生尤其是青年学生在共产主义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如关于农民阶级的表述，他们都知晓“中国是农业国家，毕竟农人占最大多数”，所以都强调组织团结农民“也是中国共产革命前的重要工作，万万不能忽视的”，^⑫因为“创造世界，基本上是靠贫苦人的奋斗，其他阶

①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3册，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361页。

②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3册，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341页。

③ 《蔡和森文集》（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3页。

④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3册，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337页。

⑤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3册，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337～338页。

⑥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3册，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322页。

⑦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3册，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322页。

⑧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3册，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324页。

⑨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3册，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338页。

⑩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3册，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340页。

⑪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3册，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340页。

⑫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3册，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338、339页。

级出身的分子要靠和贫苦人在一起奋斗，才能改造自己”^①。工人阶级、青年学生在中国国民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也是如此。因此，强调中国共产党在当时主要是做好以下工作：组织工人和农人，教育青年学生，增高工农人的社会地位，指示民众革命的方向。^②

三、初步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阐释马克思主义学说，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早期留法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由于接受过传统教育，因此他们对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比较了解的，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深深刻在他们骨子里的。在去法国勤工俭学之前，他们已经意识到去法国后是很难读到中文书的，因此他们有的在出国前就在留法的预备学校里专门开设了相关课程，也有的是去法国之前就带了较多的中文书籍。蔡和森就属于前者，他在其担任老师的留法预备学校就开设了中文及普通知识课。陈毅则属于后者，据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金满城回忆，他和陈毅在留法预备学校常常看的书就包括《资治通鉴》，之后去法国途经上海停留期间他和陈毅还干了一件“傻事”——他们“把预计已无甚用处了的钱，买了两大箱子中国线装书”，主要有《史记》《汉书》《庄子》《老子》等经典著作，因为陈毅认为“中文是我们的命脉”，^③但到了法国，中文书不容易买到。

蔡和森是早期留法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中较早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共通之处的先锋分子。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熊静在回忆赴法勤工俭学前前后后这段经历时就曾说到，在保定布里村留法预备学校学习时，学校既有教法文和机械常识的老师，也有教国文的老师，国文老师就是蔡和森。熊静回忆：在国文课堂上，蔡和森不仅“讲过关于墨子的问题，很赞扬墨子的为人和主张，并要我们学习墨子，教我们一举一动都要有礼貌，要多帮助别人，以助人为乐，不要自私自利，强者不要欺负弱者，而要彼此和睦相安；那些互相攻讦侵扰，都是不义之举，必须坚决反对”^④。同时，蔡和森在课堂上还明确指出墨子“主张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就是为全人类服务”，认为墨子主张的“去天下之大害，兴天下之大利”在近代中外唯有俄国的列宁效仿得最好，但是“墨子离我们太远，列宁就在当今，所以我就愿意效法列宁”^⑤。此外，蔡和森在课堂内外还经常对

①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3册，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414页。

② 参见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3册，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356页。

③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3册，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426页。

④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3册，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473页。

⑤ 林家品：《蔡和森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年版，第225页。

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们说,“我们应当努力学习法文,但我们是中国人,不能把中文忘记了……将来到法国去了,就很难有机会学习国文了”^①,鼓励大家抓紧机会多了解中文及普通知识。到了法国后,蔡和森也是立即着手将法文版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翻译成通俗易懂的中文,供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华工和国内志同道合的战友阅读,这更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结合的具体尝试。

张申府在论证不管何种思想、何种主义都离不开实际且更要经得起实际的试验时,也曾运用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同等哲理。如他用孔子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来强调学、思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借此来论证行即实践的重要性。他认为,“今以为不但学、思相依,学、思、行也相待,三者缺一,余不立”,直呼“一个主张,一个方法,不行,怎能知其可行不可行”,强调“凡是思想、学说、主张、方法,都要起于事实,更要归于事实。不论什么思想、学说、主张、方法,未试未行之前,不论作者自己觉着怎样周到,怎样美备,怎样圆满,都是靠不住的”。^② 为了引起大家的共鸣,他更直接引用中华文化中的传统典故“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经一蹶者,长一智”来直接论证实践的重要性。周恩来在写文反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失败的原因时意识到团结的重要性,即“于是无论何种主张,其团结力均不能始终一致,而所产生之团体乃更因之受莫大影响”。在强调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群体团结的重要性时,更直接引用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来佐证,即如周恩来所说持续不团结、观点主张不一致,“其注意点亦复不有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之势矣”。^③ 如上所述,早期留法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正是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学说,才能让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才能让留法勤工俭学先进分子更易于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而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从而为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寻求正确的解决途径,也才能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焕发生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奠定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说:“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④

①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3册,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473页。

② 《张申府文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

③ 南开大学历史系、天津历史博物馆编:《五四前后周恩来同志诗文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9页。

④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7页。

四、初步厘清了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为研究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提供了基本思路

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俄国的成功实践，列宁主义在俄国、欧洲等地得到广泛宣传 and 传播，留法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也迅速关注到了这一“新主义”，并开始思考讨论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到底还适不适合俄国和中国以及共产主义者对待马列主义的正确态度是什么。

张申府“把列宁主义看成一种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同的东西”^①，基于此观点，他还强调，“马克思主义不尽实行于俄国，因俄国革命，列宁的主张有为马克思所未见到的。推之，将来中国革命也非所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可能完全达到”^②。针对张申府的这一观点，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傅钟、任卓宣、李慰农等迅速做出了回应，并阐明了他们的观点。傅钟在给尹宽（曾用名硕夫）的信中明确指出，他“觉得申府那番演说，似乎有点背叛共产主义的可疑形迹”^③。在这些信中，傅钟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列宁只是马克思主义之奥义底阐明者，马克思主义底实行者”，同时他在读了列宁名著之后认为列宁主义最根本的根据来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④强调列宁主义只是列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实际相结合提出来的，即“列宁只是本马克思的重要主张，参照俄国情形而运用革命手段”，并没有逃出“马克思所指出无产阶级在专政期间”的十项标准。^⑤同时还指出，马克思虽然将“这个革命公式”归纳了出来，但是结果还是要由我们自己“设法求出”，认为列宁在俄国革命的主张主要在于“以图求出这公式之最终结果罢了”，更强调“列宁这样能就实际情形，善随机应变的方法，乃正合了马克思要我们应当注重实际的主张了”。^⑥任卓宣在给傅钟的回信中也明确认为，“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范围内的，它的中心点在解说阐发和应用马克思主义，不是离马克思主义而独立的”^⑦。总体而言，关于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留法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认为列宁主义是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内的，是列宁根据俄国实际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探索的将共产主义由“科学”方面移到“行动”方面的生动实践。

以上表述均说明，留法勤工俭学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一方面都认为选择马克思主义学说走共产主义这一条路才能真正改造中国，另一方面也认识到马克思和

①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3册，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191页。

②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3册，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188页。

③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3册，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190页。

④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3册，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188页。

⑤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3册，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189页。

⑥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3册，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189页。

⑦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3册，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191页。

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不是“永久不变的真理”，即“共产主义不是一个老公式，人即拿这个公式去迫令事实符合”。^①因此，共产主义者对马列主义学说不能“机械式”地运用，一定要从各个国家的国情出发。对于中国而言，就要将“中国社会现状和需要”作为基本立足点，在此基础上去探索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实现的方法。另一方面，从他们思考并讨论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来看，也给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思考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关系时提供了可借鉴的基本思路。

留法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探索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的历史贡献，所呈现出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正确的态度，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在进入新时代的今天，我们可以结合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关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精神，不断加深对实践的认知、对理论的认知，持续推进理论创新，从行动上真正践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②，进而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

The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Our Times by the Early Communist Intellectuals in France

Luo Fangfang

Abstract: The exploration of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our times by the early communist intellectuals in Fran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rocess of it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Understanding the early explor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by communist intellectuals during their study and work in France can

^①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3册，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353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8页。

not only help the contemporary youth understand the hardships and difficulties of Chinese Communists in choosing Marxism and firm their belief in Marxism, but also enable contemporary Chinese Communists to consciously shoulder the solemn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of promoting Marxism in China and write a new chapter of Marxism in China. The early exploration of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our times by the communist intellectuals in France is mainly reflected in four aspects: the study and interpretation of Marxist theory was attached importance, and the fundamental standpoint and method of Marxism to observe and solve problems was initially mastered; Marxist theory was used to explain China's problems, and scientific methods was used to solve China's problems; the common of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arxist theory was realized, and the former was used to explain Marxist theor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ninism and Marxism was initially clarified, and a basic idea was provided for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ism in China and in the New Era and Marxism.

Keywords: Work-Study Program; Communist Intellectuals; Adapt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Our Times

[责任编辑: 闫惠惠]

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 理论贡献及当代启示^{*}

周永松^{**}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栉风沐雨的伟大斗争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对我国现代化道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积累了宝贵的思想财富。从实践维度看，毛泽东从明确主体地位、强调共同富裕、重视协调发展、追求和谐共生和坚持和平道路五个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迅速实现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从理论维度看，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贡献可以归纳为“一个保证”“两个步骤”“三个全面”“四重内涵”四个层次。新征程上，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迈上新台阶，要做到不忘本来、面向未来，始终坚持一切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创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理论，善于总结历史探索的经验和智慧。

【关键词】毛泽东；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探索；理论贡献；当代启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①该论断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维度表征了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突破的最新成果。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不仅提出了诸多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的战略构想，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历史经验研究”（项目编号：15JD71008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

^{**} 周永松，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2页。

富，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从大历史观的角度梳理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探索和理论贡献，对深刻理解我国现代化演进的历史逻辑、在新征程上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① 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自觉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矢志不渝地推进现代化进程，最终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此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五大特征进行了先驱性的探索。

（一）明确主体地位：对“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探索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归根结底都是实现人的现代化。“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人民是现代化最重要和最活跃的因素，在推动现代化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现代化的实践者，更是最大受益者。毛泽东在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首位，肯定了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强调要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一，重视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也应当是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济发展落后、人民生活困苦是社会的现实状况。因此，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之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就明确提出：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这就决定了苏维埃所做的一切工作要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和实现人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了改善人民的基本生活状况，毛泽东提出要把人民生活同革命斗争紧密联系起来，以革命的成果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激发群众更高涨的革命热情。实际上，也正是由于苏维埃政府采取了改善人民生活状况的举措，苏区人民为了捍卫自身利益，通过实际行动坚决支持红军。到1932年夏，扩红运动成效显著，根据地“主力红军发展到约10万人”^②。第二，制定保障人民利益的制度法规。制度是现代化的保障。早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就通过了依法治国的法令，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了苏维埃共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2页。

^②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62页。

和国的性质，利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重点解决根据地劳动人民的生产资料和发展经济问题，通过《中华苏维埃劳动法》保障劳动人民的合法权益。1933年10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又根据实际情况修改完善了维护劳动者利益的相关法令，包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重新颁布劳动法的决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违反劳动法令惩罚条例》等，从法律层面切实保障了劳动者的基本权利，激发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同时，还有针对税收出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切田赋、丁粮、苛捐、杂税、厘金等，实行统一的累进税。无论是劳动法还是税收法，其根本出发点都是维护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由此可见，党在第一次局部执政时就已经对依法治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第三，推动实现基层民主。重视基层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与优势。在短暂的执政尝试中，苏区共开展了三次基层选举，探索了民主选举的新形式，有力推动了基层民主的发展。具体来说，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颁布了选举法，详细规定了选民的资格以及选举的程序、办法和规定等，使苏区人民群众真正拥有并行使了选举权。在政府的广泛动员、精心组织下，苏区选举选民参与率最高达到90%以上。同时，男女平等在选举中也有所体现，一些地区的妇女也开始积极参加地方选举。

（二）强调共同富裕：对“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探索

在实行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1953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其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首次提出要“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①。毛泽东强调，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推进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着力消除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让全体人民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第一，在经济政策方面，毛泽东认识到社会主义初期面临生产力水平不高的问题，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策的目标之一。因此，他强调要以农业集体化为基础，积极发展农业和轻工业，重点支持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逐步改善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他一方面计划通过改造农业“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②，另一方面希望改造工商业，使“资产阶级不见了，都成了工人阶级”^③。第二，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毛泽东关注到地区贫富差异的问题，强调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意区域间的均衡发展，尤其是要帮助欠发达地区，使其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不断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差距。第三，在推进人民公社方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62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7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0页。

面,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毛泽东倡导和推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将农村集体经济和国家经济紧密结合起来,借此加强农村的经济建设。虽然在此过程中走了一些弯路,遭遇了诸多挫折,但这一运动的初衷和根本出发点是为了实现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第四,在消除社会阶级差别方面,毛泽东认为共同富裕不仅仅是解决物质贫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消除社会阶级上的差别,从而实现社会的高度平等。毛泽东将共同富裕看作通向高级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并指出“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①,其中包括了农民、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概言之,毛泽东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是一个兼具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目标,旨在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尽管在实践时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这一目标在推进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困难和挑战,但共同富裕的理念仍然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

(三) 重视协调发展: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的探索

“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②毛泽东在讲话中虽未明确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概念,但为了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毛泽东在实践中秉承了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 and 政治建设一体推进的理念。

第一,辩证地看待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在阅读大量历史书籍和研读马恩经典后,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同时也对“文化是—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能够反作用于—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有了更深入的把握。因此,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能够科学辩证地看待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1949年9月30日,他在《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宣言中指出,要“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③。1957年3月,毛泽东又在宣传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④。这些都充分说明毛泽东在注重经济发展和政治昌盛的同时,也高度重视文化繁荣。第二,提出发展文化和教育事业的一系列基本方针。毛泽东始终坚持给予文艺和教育事业更多自由发展空间,在文艺事业和学术问题上,有针对性地采取“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两个基本方针成为当时我国科学和文艺事业发展的基本指导方针。在处理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关系时,毛泽东还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⑤的方针,要求人们采取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外来文化,这就在指导思想上为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原则遵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页。

② 张浩:《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红旗文稿》2022年第24期。

③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8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5页。

⑤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58页。

循。此外，毛泽东还非常重视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水平。他利用有限的资源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据统计，当时仅在苏区就建立了“列宁小学 3052 所”，“补习学校 6462 所，学生 94517 人”。^① 这在提高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第三，阐明了无产阶级文化的价值目标。文化为谁服务的问题是建设精神文明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对此，毛泽东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②，“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③。考虑到我国是以农民阶级为主体，且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后文盲依然在农村地区广泛存在的现状，他当机立断，领导全国开展识字运动，兴办各类识字学校，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概言之，该时期毛泽东在文化教育事业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也为后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四）追求和谐共生：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探索

毛泽东的生态观初步形成于中国的革命战争时期，又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初步认识到森林、土地和水资源等自然资源的重要性。特别是在长征途中，他对中国广袤山川的自然环境有了更加深刻的体验，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子孙后代的重要性。因此，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多次强调要尊重自然和保护环境。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当属他于 1955 年 12 月 21 日起草的《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意见》中，他特别指出，“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实行绿化”^④，强调发展农村经济必须照顾好自然环境，避免资源过度开发和污染，使农村百姓能够与自然和谐共生。并且，在解决中国的土地环境问题，他也鼓励在农村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强调保护水土资源，建设农田水利设施和推广梯田，防止过度开垦和过度放牧，保持土地的生态平衡，防治水土流失和沙漠化等等。1956 年 3 月，他在《中共中央致五省（自治区）青年造林大会的贺电》中又发出了“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号召。1958 年 8 月，他再次指出，“要使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部绿化起来”^⑤。正是因为毛泽东大力倡导搞生产的同时要注意厉行节约资源，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注重环境保护，在建造大型水利设施时要兼顾园林绿化，才为子孙后代留下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但这里也需要指出，在具体实践的过程中不免出现了一些偏离本意的情况。

① 张玉龙、何友良：《中央苏区政权形态与苏区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25～226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48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54 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09 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林业局编：《毛泽东论林业》（新编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1 页。

例如,为了解决农业农村发展建设问题,他提出了“人定胜天”“向自然界开战”“向自然界斗争”等口号。虽然其主要意图是动员百姓克服穷山恶水的自然条件,但由于过度追求经济发展,间接导致了生态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严重的问题。总体来看,毛泽东在实践生态环境保护思想的过程中经历了曲折,但为后来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也为当代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提供了有益借鉴。

(五) 坚持和平道路:对“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的探索

在领导中国走向世界的道路上,毛泽东始终站在维护世界和平的战略高度,立足本国国情谋求同他国的合作,矢志不渝地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构建和谐世界新秩序作出了突出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在与其他国家领导人和外国友人会晤及谈话交流时,多次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决反对霸权主义。1953年12月,周恩来在同印度代表团谈判时,独创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来逐渐演变成许多国家之间交往默认的准则。毛泽东认为各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平等是交往的前提,国际交往绝不能搞大国主义,因此在许多会见外国宾客的公开场合多次谈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长期的方针,并表明中方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同各国友好建交。例如,1954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英国工党代表团的谈话》中呼吁:“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①针对国际上散布的“中国新帝国主义论”“黄祸论”等抹黑言论,他强调:“我们不侵犯别人一寸土、一根草。我们是爱好和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②“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③到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基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深度把握,按照综合国力划分出了“三个世界”,主要是以美苏为首的第一世界,以其他发达国家为代表的第二世界和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第三世界。这一科学合理的划分既为壮大世界和平发展力量提供了依据,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描绘出的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和谐画面奠定了基础。

二、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的理论贡献

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首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明确了这一命题的本质要求,初步构建了这一命题的理论框架,系统阐释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式方法,成功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伟业。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1页。

毛泽东在推进我国现代化的历史征程中形成了诸多原创性的理论成果，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

（一）一个保证：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政治保证

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保证和本质要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深入广大革命根据地，广泛宣传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陕甘宁边区期间，毛泽东考虑到人民群众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现状，创造性地发明了投豆法、画圈法、烧洞法和喊选法等民主选举方法，充分保障了人民群众的选举权。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采用“三三制”的统一战线原则，极大地团结和巩固了一切抗日力量，为抗战早日取得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尽快建立民主制度，保障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得以贯彻落实，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随后，毛泽东又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对民主制度进行探索和完善。第一，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无产阶级民主的本质。毛泽东认为，民主必须是广泛和真实的，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应当实行民主政治。并且，由于只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才真正具有广泛性和真实性，所以必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唯有从国家制度层面确立了民主制度，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才能够得到根本保障。第二，强调为人民谋幸福是无产阶级民主的目标。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是衡量群众幸福指数的重要指标。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民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必须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对人民负责的原则，致力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第三，阐述民主监督是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答案。毛泽东对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进行了长期的摸索，取得了诸多开创性的成果。毛泽东认为，民主不应该被看作治理社会的方法，而应该作为一种有效的政治制度。只有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监督权，使民主监督制度化、规范化和体系化，才能真正有效地约束权力，从而使中国共产党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此后，我国社会基本政治制度不断得到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不断得到加强，为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坚实政治基础。

（二）两个步骤：中国要分“两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面临着“一穷二白”的基本国情。毛泽东深刻认识到，要改变这种落后的面貌，就必须不遗余力地推进国家工业化。经过长期的酝酿和思考，毛泽东提出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但由于缺乏实践经验，“两步走”战略在实施的过程中经历了多次调整。前期，为了在短时间内快速增强综合国力，迅速完成工业化的物质积累，毛泽东效仿苏联“15年内赶上并超过美国”的战略，也提出了“超英赶美”的战略：第一步，“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实现

初步工业化”；第二步，“再用几十年的时间接近或赶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①到1957年，毛泽东又详细制定出实现现代化的10—15年与40—50年的“两步走”发展战略。具体内容是：首先通过10—15年时间的建设，奠定现代化的工农业基础，再经过8—10个五年计划实现对美国国民经济的反超。为早日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将重心放在了钢铁产量上，希望通过提高重工业品的产量实现“超英赶美”目标，这一战略在当时被称为“以钢为纲”。显然，这种依靠单一指标、希望在短时间内赶超世界大国的战略构想与中国的社会现实严重脱节，最终导致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遭受巨大挫折。“大跃进”后期，在吸取该教训之后，毛泽东对“超英赶美”的战略进行了深入反思，并深刻认识到实现现代化强国这一目标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于是，他在重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综合考量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和经济落后的基本状况后，适时对现代化战略的步骤做出了调整。1962年1月，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指出，我国要超越西方发达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②。次年，毛泽东就对“两步走”战略进行了更加科学的规划。他首先对“两步走”战略的第二步做出调整，指出第二步的目标是“再用十五年，使我国工业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③。从“超越”到“接近”的转变，表明毛泽东已经较为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到1963年9月，根据我国的发展情况，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对“两步走”战略进行了优化，指出：“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④这一战略构想很快就正式确立为我国现代化发展战略。从多次转变中可以看出，“两步走”战略调整优化的过程也是毛泽东不断深化对中国国情和现代化规律认识的过程。最终，这一战略对我国建设现代化起到了极为有力的推动作用。

（三）三个全面：中国是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现代化

毛泽东曾大量阅读马恩经典著作，熟知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是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现代化。1945年，他在《论联合政府》中强调，要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文化。从这一论述可以看出，毛泽东所构想的现代化蓝图是政治、经济、文化三者整体推进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注重在搞建设的过程中实现三者的协调发展，因为经济、政治

①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29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47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组编：《〈毛泽东文集〉与毛泽东思想》，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6页。

和文化是评价现代化发展水平的三个基本维度，三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首先，在经济建设方面，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是增强综合国力的根本途径。因此，毛泽东以经济建设为重点，不断壮大社会经济基础，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积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其次，在政治建设方面，1954年9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宪法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为后续我国各项基本政治制度和民主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奠定了根本基础。当时，我国政治现代化取得显著成就，毛泽东对民主政治的构想可以概括为“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①。最后，在文化建设方面，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要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摒弃糟粕文化，在吸收外国文化有益成分的同时提防文化入侵。此外，毛泽东还强调，社会主义文化要彰显出自身的先进性、独特性和民族性，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要求人们辩证地对待传统文化和吸收外来文化。这都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当时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步伐。

（四）四重内涵：明确“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未来发展方向

从历史发展来看，毛泽东对我国现代化的内涵、目标和阶段的规律性认识呈现出不断加深的过程，经历了从实现工业化的“一化”到全面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的“四化”发展阶段。

首先是实现“一化”方面。早在革命时期，由于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敌人，大量优秀的指战员在战斗中壮烈牺牲。那时毛泽东就已经深刻认识到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也是评价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因此，毛泽东多次在公开讲话中强调要实现工业化的目标。1944年5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讲话时首次提出工业化的设想。次年4月，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用若干年的时间“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②。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报告中强调，“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③。直到1957年2月，毛泽东首次系统阐述了“中国工业化道路”具体的实践方案和路径，号召“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④。其次是实现“二化”方面。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提出“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⑤，这成为提出“二化”的萌芽。不久之后，毛泽东又对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91页。

其做出深入阐释,指出“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①。这表明毛泽东充分考虑到我国是农业国的基本国情,不能单纯追求工业的发展,应当使工业和农业协调推进。再次是实现“三化”方面。1957年,毛泽东两次提出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②,这表明毛泽东对现代化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最后是实现“四化”方面。随着中苏关系逐渐恶化,1959年底,毛泽东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③这说明毛泽东更为深入地认识到了国防现代化对维护国家安全、世界和平以及争取稳定发展环境的重要性。后来经过周恩来的补充和完善,到1964年12月21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的报告中正式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④写入文件。至此,“四个现代化”的经典表述正式形成。之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四个现代化”稳步推进。直至今日,“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依然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启示意义。

三、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当代的经验启示

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初步探索,为我国彻底摆脱落后挨打的命运,主动融入世界现代化体系,顺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论指引和实践支撑。没有前期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实践中不断积累宝贵的经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寻找经验启示,有益于在新征程上继续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 着眼基本国情: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要一切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

苏联成功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革命实践,并以工业化的方式带动了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使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决定通过模仿苏联模式迅速扭转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从而尽快跻身世界发达国家行列。然而,经过几年的实践,我国在模仿苏联的过程中暴露出了许多问题。事实证明,只有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才能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新征程上,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④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9页。

第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①，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发展理念，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政府要倾听人民群众的建议和呼声，在政策制定、资源配置和发展目标方面，要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社会治理的民主性，推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第二，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入新时代以后，“中国制造”已经逐渐向“中国智造”转变，科技创新成为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一招。政府要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加强合作，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推动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同时，要建立配套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鼓励知识产权的创造，激励全社会创新创业。第三，追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新征程上，要更加注重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从单一追求经济增长转向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优化产业结构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第四，深化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今天中国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重要动力。新征程上，要继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进一步解决阻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增强市场的活力和竞争力。同时，也要不断扩大对外开放。2023年1月17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必须对外开放，中国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因此，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经济合作，加强国际交流，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第五，深入推进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目前，我国的城乡发展差距依然较大，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助于促进城乡之间协调发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一体化。具体来说，是要注重发展乡村产业和现代农业，鼓励农村发展新型农业经营模式，引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农村经济的竞争力和适应性，推动农村经济的转型升级，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此过程中，也要重点关注乡村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增强农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充分保护文化遗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二）坚持党的领导：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

毛泽东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是推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首先，中国共产党是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在毛泽东看来，现代化是一项长期艰巨而又极为复杂的宏大事业，要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有序推进，必须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② 其次，阐明党的领导应该是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2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页。

全面领导。“党是领导一切的”^①，毛泽东强调，党要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方面都加强领导。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性质和方向。再次，提出要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指出，“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②。打铁还需自身硬。毛泽东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要求全党同志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加强党领导的针对性和科学性，不断适应新时期的社会变化，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最后，明确加强党的领导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③从依靠农民群众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实践来看，人民群众才是党执政的根基所在。进入新时代，党的领导面临新形势和新挑战，要加强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确保现代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④。这是我们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宝贵经验，也是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大优势。现阶段，党员干部队伍中依然存在个别对党认识不足、理想信念不坚定的贪污腐败分子。整治腐败问题，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关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思想，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开展党的自我革命，不断肃清党内的不正之风，严惩贪污腐败分子；另一方面也要在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基础上开拓创新。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形成了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同时又将“两个务必”升华为“三个务必”，创造性地指出自我革命是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这是继毛泽东提出“人民监督”之后我们党在实践中探索出的新答案。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新征程上，党要始终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举旗定向的领航作用，使党员干部将从严治党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凝聚社会各方现代化建设的力量，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三）注重理论创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要不断推进现代化理论创新

毛泽东对我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过程，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新的思想火花在碰撞中不断产生，现代化理论的内涵不断被丰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变得更加清晰和明朗。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人民的实践先导和行动指南，以其鲜明的科学性和实践品格，为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华民族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武器。经过一百余年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三次伟大飞跃并形成重大理论成果。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思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④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70页。

想被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成了划时代的重要思想产物。其中，过渡时期理论、社会主要矛盾学说、“四个现代化”的提法与“两步走”战略等，都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集全党和全体人民智慧形成的伟大思想结晶。后来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二次飞跃，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注入了不竭的思想动力。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我国现代化建设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在汲取历代领导人智慧结晶的基础上，对我国现代化道路做出了前瞻性的预见和全局性的谋划，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现代化建设的新任务和新要求，还形成了许多新的观点和重要论断，推动了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略布局的关系，认识到前者是后者的理论支撑”^①。当前，我国已经成功开辟了一条走社会主义的、摆脱外部依赖的、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康庄大道。新征程上，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要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充分吸收前人的思想智慧。既要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为根本出发点，不断提高理论自觉、坚定理论自信、增强理论底气，又要持续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增强党和人民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境界。

（四）总结经验智慧：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要及时总结历史经验和智慧

毛泽东在领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之所以能够规避很多问题，少走许多弯路，是因为他能够及时将实践经验总结升华为规律性的认识，并以此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例如，在现代化的目标上，毛泽东对工业化的认识经历了从“一化”到“四化”的发展。起初，毛泽东仅着眼于实现国家工业化，但随着历史的不断推进，社会矛盾愈来愈严重地显露出来。此时，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总结经验并吸取苏联的教训，将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扩展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基础。在现代化的战略上，毛泽东一度提出了“三年超英，十年超美”战略，这一做法导致了当时国民经济发展严重失衡。但在吸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之后，毛泽东重新对中国具体国情进行了考量并调整了战略规划，提出了“两步走”战略。

稽古振今，开创未来。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善于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智慧，从而为当代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一是要以史为鉴。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要对近代以来现代化探索和改革实

^① 习近平：《全面学习把握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奋力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人民之声》2022年第11期。

践进行学理性的分析，探究取得成果和遭遇挫折的根本原因，为当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顺利推进提供历史借鉴。二是要坚持稳中求进。从历史上看，我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也曾面临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问题。中国现代化建设要避免急功近利和盲目冒进，坚持稳中求进的发展思路。只有积极稳健和可持续发展，才是实现经济长期稳步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的“最优解”。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真正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三是要居安思危。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许多科技创新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巨大的优越性。与此同时，也依然存在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教育资源不均衡和收入差距较大等现实问题。因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重视社会各领域出现的风险挑战，特别是要平衡和处理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问题。

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辟作出了卓越贡献，不仅在思想上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也在实践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新征程上，我们要充分汲取毛泽东思想的经验智慧，理清中国式现代化生发的历史逻辑，领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理论逻辑，践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逻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Mao Zedong's Practical Exploration and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Its Contemporary Revelation

Zhou Yongsong

Abstract: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a majo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chievement in the great struggle in the wind and rain by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under the Party's leadership.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Comrade Mao Zedong carried out painstaking exploration of th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 China, accumulating valuable ideological wealth for the successful opening up of the path to Chinese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ractical dimension, Mao Zedong's pioneering exploration in five aspects, namely, clarifying the dominant role, emphasizing common prosperity,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ursuing harmonious coexistence and adhering to the path of peace, has laid an important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the rapid modernization of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eriod.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Mao's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o Chinese modernization can be summarized as "one guarantee", "two steps", "three comprehensives" and "four connotations", which are four levels. On the new journey, to continue to promote Chinese modernization to a new level, we must not forget the past and look to the future, always adhere to the specific conditions of our country, unswervingly adhere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onstantly innovate the theory of the path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be good at summarizing the experience and wisdom of historical exploration.

Keywords: Mao Zedo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Practical Exploration;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Contemporary Revelation

[责任编辑: 李谷悦]

毛泽东传统文化观的多维审视^{*}

张 慧 张雅琪^{**}

【摘 要】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同时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他创造性地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文化条件。其传统文化观深刻地回答了什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如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的基本观点和根本方法，内涵丰富，意义重大。通过回顾、梳理、继承毛泽东关于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对毛泽东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定位、科学态度以及发展路径进行论述，为今后更好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发展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于毛泽东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关注度，尤其是在“文化热”“国学热”逐渐升温的大背景下。毛泽东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而且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提出并践行了正确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和根本方法。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和浸润的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过程中，立足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创造性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并将其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因此，回顾、梳理和继承毛泽东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对于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 本文系沈阳师范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课题“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路径研究”（项目编号：ZTSYB2023011）阶段性成果。

^{**} 张慧，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张雅琪，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础理论和历史进程研究。

一、深刻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定位

要回答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首先就要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定位。毛泽东在带领党和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的进程中，十分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定位问题，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封建时代政治与经济的产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立足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基础，受到封建时代下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和制约。毛泽东指出：“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① 他深刻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由封建经济和封建政治所决定的，是封建时代的产物。

首先，封建地主阶级所有制的经济体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的经济根源。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的：“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也正是由于中国几千年来始终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这样的自然经济社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不仅培养了中国人循规蹈矩、乐天知命的性格和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美德，更造就了中国人政治观念的独特性。在毛泽东看来，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情况下，我们的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但那些剥削农民地租的地主和贵族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自己的享用，绝不是用来交换的。这就直接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始终以农业立国，农业始终被放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首位，并逐渐形成了以小农经济、自给自足为基本特征的农业经济，以“民惟邦本”“民贵君轻”等民本思想为主流的封建统治观念，这些都深刻影响着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因此，封建地主阶级所有制的经济体制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的经济根源。

其次，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的制度根源。文化是一种人类现象，而人类只有形成一定的社会结构，方能创造并发展文化。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结构的特点是血缘宗法制度。在血缘宗法制度的演变发展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处不带有这一制度的痕迹。毛泽东指出：“中华民族的发展（这里说的主要地是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页。

千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而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有了大约四千年之久。”^①中国由于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对血缘宗法制度产生了重大冲击,但宗法制的某些基本特征,如皇位的嫡长子世袭制、贵族名位世袭制、父权家长制,以及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等紧密联系和相互渗透等等,仍继续影响着中国社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总之,血缘宗法关系或宗法思想意识存在于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诸多领域,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影响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包含着宝贵的文化遗产,蕴含着民族精神和革命信念,展现了中华民族所共同遵循的生存智慧。毛泽东强调,“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②。在这里,毛泽东高度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底蕴,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是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着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财富。毛泽东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③文化遗产作为文化资源的载体,只有通过其展现的文化元素与文化精神才能达到以文化人的目的。如果文化遗产未能得到保护,或者放在藏馆里的文化遗产未能被人们了解与感知,就无法发挥其原有的文化价值。对于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毛泽东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④在这里,他明确强调中国共产党人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并在充分尊重和理解、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使传统的文化思想、价值观念与现实社会的具体发展要求相结合,逐渐形成具有独特魅力和风格的中华文化。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民族精神和革命信念,是中华儿女砥砺前行的精神支撑。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传承和发展的进程中,中华民族精神与革命信念获得了传承和弘扬,它不仅为中国人民提供了思维方式和价值引领,更鼓舞和激励了中国人民不断奋勇前进。毛泽东指出:“无数党员、无数人民和很多党外革命家,当时在各个战线上轰轰烈烈地进行革命斗争,他们的奋斗牺牲、不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3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精神和功绩，在民族的历史上永垂不朽。”^① 这要求我们不仅要重视对中华文化基本精神的世代延续和弘扬，更要在文化经典与文艺作品的创造中实现民族精神和革命信念的弘扬。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② 毛泽东通过剖析文艺工作和革命事业的关系，提出了革命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并成为革命文艺发展的标杆。在此过程中所涌现出的许多优秀文艺作品以艺术的表现形式与手法，形象地塑造和反映了革命英雄的英勇事迹，其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和革命信念始终是中华儿女砥砺前行的精神支撑。

（三）中华传统文化兼具积极价值和消极弊端

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于中国人民的历史实践，应当根据时代发展需要，给予中华传统文化以科学的历史定位。正如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③ 站在时代高度，重新审视中华传统文化，应当明确其所兼具的积极价值和消极弊端。

首先，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积极价值。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表现出了对国学的强烈认可与求知欲，充分肯定了国学的广博精深。在毛泽东看来，新的思想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任何新文化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是对原有文化的批判继承和创造发展。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④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代代传承，有利于提高民族的文化自信，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借鉴中国古代的战略战术和战争成功的经验，根据我国的现实特点，将其运用于革命战争，成功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最终胜利。毛泽东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④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解放日报》1943年5月27日。

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① 革命战争年代，革命文化作为革命的有力武器，能够真正地教育、团结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用革命精神和信念提高战士和群众的革命热情，使其积极投身于革命运动中。正是文化战线的配合，为革命取得胜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撑。

其次，毛泽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消极弊端进行了揭露与批判。毛泽东在其早期文稿中曾指出：“吾国古学之弊，在于混杂而无章，分类则以经、史、子、集，政教合一，玄著不分，此所以累数千年而无进也。”^② 毛泽东深刻揭示了国学的弊端，并用“伪而不真”“虚而不实”概括了中国传统思想与封建主义道德根深蒂固的缺陷。随着毛泽东本人在革命实践中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理解的深入，他为消除传统文化的弊端也做了一些努力。从1938年开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主要是“批判地吸收”，即以批判为前提、为主体的吸收。在领导农民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对红军队伍中存在的小生产者的传统文化观也进行了改造。他认为“三纲”“三从四德”是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障碍，从深层次揭示了传统文化的缺陷，并号召人民与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作斗争，推翻压在身上的绳索，并预言一切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都将随着农民运动的高涨而动摇。总之，毛泽东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消极弊端进行了揭露与批判，为全面客观地评价传统文化的价值，以辩证、历史的态度看待传统文化奠定了基础。

二、科学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扬弃方法

毛泽东自幼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见解和浓厚的情感，并在长期的革命实践过程中科学回答了如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问题，逐渐形成了“取其精华，剔除糟粕”“批判改造，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正确态度。

（一）取其精华，剔除糟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底蕴极其丰富，但这些文化主要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形成发展，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封建性和历史的局限性。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③ “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然而我们中国有些人却崇拜旧的过时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不仅不适用而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页。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2～8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且有害。这样的东西必须抛弃。”^① 因此，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必须坚持“取其精华，剔除糟粕”，这不仅是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更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首先，“取其精华，剔除糟粕”是正确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主张尊重民族历史，坚守民族文化。毛泽东强调：“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② 中国共产党人尊重自己民族的历史，热爱本民族传统文化，但并不意味着全盘接受、拿来主义，而是要正确地加以分析、有所区别，只能吸收对社会发展起积极作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也是正确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

其次，“取其精华，剔除糟粕”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忠实继承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其相结合。毛泽东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③ 这里“封建性的糟粕”指的是对人民有害的封建文化、迷信文化、糟粕文化和反动文化等；“民主性的精华”指的是对社会发展有益的文化，如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等；“民族新文化”指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即在我国革命和建设时期形成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毛泽东的阐述表明要正确认识和对待自己的历史文化，必须正确区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能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

（二）批判改造，推陈出新

在近代中国，无论是对本民族文化的全盘否定，还是固守传统文化的保守主义，它们都未曾真正找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之路。毛泽东指出：“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④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批判改造、推陈出新的积极倡导者，提出了“辩证的否

①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

定观”这一对待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指出“批判改造，推陈出新”是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要条件。

首先，“批判改造，推陈出新”是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方法。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对于传统文化，我们要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那么，对于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性精华，是否可以照搬照抄？对于其封建性的糟粕，又如何进行批判改造？毛泽东本人通过对孔子思想的总结，为“批判地利用”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性的精华”，使其“推陈出新”，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一方面，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②由此可见，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对孔子的看法总的来说是肯定的。另一方面，毛泽东对孔子的许多思想仍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他认为，孔子思想中缺乏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但也不能简单地对其全盘否定。因此，只有将“批判改造，推陈出新”作为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方法，才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转化。

其次，“批判改造，推陈出新”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要条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是因为中华民族本身具有文化内在力和强大的传承力。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势必要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相结合，要吸收与改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使之成为改变中国面貌的“伟大认识工具”。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③因此，马克思主义尽管属于西方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大差异，但两者都有很强的包容性，它们能够相互渗透、相互包容。如毛泽东本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推进过程。毛泽东由深受重实际、重实践的湖湘学风的熏染到自觉创立实践论，运用哲学思维来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不仅体现和代表了两者之间思维方式上的沟通，更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底蕴和价值赋予了新的生命力与活力，进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如何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是新中国文化建设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为此，毛泽东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方针。他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①“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②在这里，毛泽东强调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并不是简单的照搬照抄，而是在文化对比与交流中吸收营养，以逐渐完善自身。

首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指导方针。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就以批判的眼光广泛阅读古典书籍，并做出大量批注与心得。在后面的学习中，他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阐明了对待传统文化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基本态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发展始终伴随着时代发展的烙印，凝聚着广大中华儿女的精神信念，是广大中华儿女结合自身实际、认识水平和时代条件进行创造的精神财富，这就要求我们深入挖掘和发展符合时代要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毛泽东认为，发掘和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目的在于不断获取养分并为我所用。他指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③因此，我们不仅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坚持文化发展的继承性，充分肯定本民族文化遗产的历史地位和存在价值，更要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并为我所用。这才是正确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艺方针。

其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正确对待外来文化的科学态度。中国要在短时间内改变自身落后面貌，就应该充分吸收外来优秀文明成果作为自身文化的养料。正如毛泽东指出：“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④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是一种极其错误的观点。在过去，中国依靠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是吃过大亏的。毛泽东进而指出：“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⑤因此，面对外来文化，只有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科学态度，才能解决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养料问题，开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道路。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0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三、鲜明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现实路径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立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实践，不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鲜明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实现路径。

（一）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在当代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离不开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最基本的历史经验，是绝不能动摇的根本。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仅是针对二者的结合问题，也是针对国内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所证实的真理。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①

首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内在的契合性，二者有着相结合的基础和必然性要求，但是在具体的结合过程中，二者应以谁为主导、秉持何种态度，以及如何实现二者的平衡和契合都是我们应该考量的问题。毛泽东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吸收了中国历史上优秀的思想文化，对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在理论内容上进行了改造。具体表现为毛泽东坚持在推动两者结合的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以中国的实际国情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主要依据，有针对性地扬弃中华传统文化，从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② 因此，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契合性，就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方面需要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另一方面将其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使之真正地运用于社会实践中，用于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

其次，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精神根基，推动其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并用于教育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不仅是对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思想的中国化表述，深刻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毛泽东注重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命题解读马克思主义，深入浅出地说明问题。他创造性地用“实事求是”来阐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将“民惟邦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升华为“群众路线”思想，用“知行观”生动阐述了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无论是其方法、路线还是方针政策都应以实践为标准进行检验。另外，在这一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十分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建党智慧，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例如，抱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教化、重修养的求是精神，形成了浓厚学习氛围和注重学风建设的特点；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求“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为重，社稷次之”的民本思想，形成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抱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诚意”“修身”以及注重道德伦理修养的“士大夫”情怀，形成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这些都是毛泽东坚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精神根基，并结合中国具体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深刻体现。

（二）以革命优良传统为优质基因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优良传统是毛泽东带领党和人民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渐孕育而成的，凝聚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智慧和精神风貌，蕴含了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历史文化内涵，其中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服务人民的宗旨意识、忠诚于党的优秀品质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并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完成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

首先，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完成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更新。革命文化作为毛泽东带领党和人民在革命建设时期创造的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先进文化，发挥着重要的历史推动作用。白求恩曾盛赞与他一起工作的中国同志：“对他们来说，共产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空谈或信仰。”^①革命时期所留下的革命优良传统和作风，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信念，也完成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更新。毛泽东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科学生动地阐释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和原理，并结合中国具体国情与革命实践发展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如，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深受英雄史观的影响，为了探索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他广泛钻研古书，研究了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起义的成败原因，并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深刻分析，确定了中国

^① 《纪念白求恩》，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页。

革命的对象和任务，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古代的策略思想。1938年，毛泽东先后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著作，多处引用《孙子兵法》中的话语，分析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双方的基本特点，阐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战略战术原则，论述持久战的总方针和人民战争的思想，充分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军事思想。这些革命理想信念都深刻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更新。

其次，服务人民的宗旨意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是指党对人民群众地位的重视，对人民群众需要的满足。自古以来，我国就有“民贵君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民本思想。毛泽东在带领党和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并加强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从传统的“民本”思想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深刻体现了毛泽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28年的经验，他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①在《为人民服务》中，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②这些论述不仅深刻展现着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服务人民的宗旨意识，更体现了对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发展。1942年，为了解决革命文艺发展道路上遇到的问题，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剖析了文艺工作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关系，回答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问题等，提出了革命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丰富，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由此可见，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服务人民的宗旨意识，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民本思想”的发展。

最后，忠诚于党的优秀品质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无不深刻体现着中华儿女对民族与国家命运的关切。革命时期，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强劲的敌对势力和艰苦环境的考验始终顽强斗争，以敢于牺牲的精神品质体现了为党奉献、对党忠诚的优秀品质，并实现了对中国古代爱国主义思想的升华与发展。毛泽东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

这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责任”^①，“愈是危急的时候，愈是危险的时候，愈是困难的时候，共产党员应当愈加表现他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坚定、勇敢、艰苦的工作精神”，不仅自己要成为“一个最勇敢坚决艰苦的战斗员，而且以自己的热忱毅力和信心来推动和影响他周围的群众”。^②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历经生死考验，自觉地担负起民族独立的重任，不仅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百折不屈、英勇牺牲的精神品质，更是对古代爱国主义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所形成的诸如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富有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的革命精神，深刻体现了忠诚于党的优秀品质传承，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

（三）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现实基础和时代内涵

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发展，并不断从中获取营养，就必须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现实基础和时代内涵。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坚持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剔除糟粕，积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扬弃”。

首先，要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必须以解决现实问题为落脚点。毛泽东认为，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并不是一味地肯定其中的合理成分，一成不变地加以继承，而是以解决现实问题为落脚点，充分结合新的现实基础，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更是明确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③对待中华传统文化不能机械地照搬照抄，而是要加以创新与发展。在这里，毛泽东并没有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没有将其全盘西化，而是强调要正确地加以辨析，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建设理论。在改造群众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毛泽东明确指出：“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④因此，我们必须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为落脚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才能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其次，要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必须结合时代特征，满足时代要求。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入手来分析中国国情，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和未来，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27页。

② 《社论：共产党员在保卫武汉中的责任》，《新华日报》1938年8月7日。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3页。

的关键。毛泽东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① 这一论述深刻体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最先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建设理论。其中，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解放和民族富强提供了历史经验。这里的“实事求是”就是强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之中，要立足于我国发展水平和阶段的不同来进行具体的文化建设，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同时，保证其同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以及发展水平相适应。对此，毛泽东也曾指出：“须注意使我们的思想完全适合于我们所处的环境，然后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样样见效，并迅速见效。”^② 因此，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需要结合时代特征，满足时代需求，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成果不断进行检验和修正。只有这样，才能既做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的利用”，又使马克思主义更加中国化、民族化。

总之，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家，既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又创造性地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毛泽东的传统文化观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文化资源。站在新的历史节点，认真回顾、梳理、继承毛泽东关于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深刻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定位，阐述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提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路径，对我们今后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赓续中华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A Multidimensional Examination of Mao Zedong's Views on Traditional Culture

Zhang Hui Zhang Yaqi

Abstract: Mao Zedong, as the great pioneer in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was a faithful inheritor and promoter of Chinese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He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33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15 ~ 1016 页。

creatively pushed forward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providing favorabl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ditions for us to deeply study and implement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s, and to build a modern civilization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new era. His views on traditional culture profoundly answered wha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how to trea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how to realize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erms of basic viewpoints and fundamental methods, which are rich in content and of great significance. By reviewing, sorting out, and inheriting Mao Zedong's thoughts and wisdom on traditional culture, we discuss his historical positioning, scientific attitude,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provides soli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Mao Zedong's thoughts and for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future.

Keywords: Chinese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Path

[责任编辑: 李谷悦]

红色日记中的自我革命思想及其对传统修身文化的继承与超越^{*}

——以《人民日报》的“日记摘抄”为例

张会芸 王富羽^{**}

【摘 要】红色日记作为重要的红色文化资源被反复提及，但其蕴含的自我革命思想在研究层面仍处于相对遮蔽的状态。本文首先对红色日记的概念加以界定，进而以《人民日报》登载的“日记摘抄”系列为分析对象，探寻红色日记中的自我革命思想，厘清写作者们在日记中展现出的超越“小我”成就“大我”、革除“旧我”成就“新我”的自我革命目标，提炼他们以“改造世界观”为抓手改造人生观的自我革命方法。红色日记中的自我革命思想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是对传统修身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及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红色日记；《人民日报》；雷锋；自我革命

日记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献类型与书写方式，是指个体每天对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言所行及所思所想的记录。红色是一种极具中国传统意蕴的色彩标识，赋有吉祥、喜庆的传统文化意义。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后更将红色作为自己旗帜的颜色，象征着中国共产党人执着坚定的理想信念，也象征着其在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中淬炼出的不畏牺牲、勇往直前的精神品性。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一批红色日记涌现出来，尤其是 20 世纪 60 年代《雷锋日记》的面世，更使红色日记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目前学界对红色日记的研究尚显薄弱，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多停留在应用层面，对红色日记“是什么”、红色日记“有什么”及蕴含在红色日记中的“自我革命”思想未能展开深入讨论。本文聚焦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传统‘正治’方略及其现代转化研究”（项目编号：20CKS057）阶段性成果。

^{**} 张会芸，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政治文化；王富羽，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红色日记，旨在明确红色日记的概念边界，定位红色日记的典型作品，挖掘其中内蕴的自我革命思想，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对传统修身文化的继承与超越，以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革命文化的相关性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切入视角。

一、红色日记：一个尚待明确的概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分别提及红色传统、红色江山、红色血脉、红色记忆、红色资源、红色文献及红色家书等以“红色”为定语的概念，并指出“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①。在此指导下，红色文化学的建构逐渐驶入正轨。当前国内学界对“红色”属性的把握大体立足于三个方面：其一，时间边界；其二，主体边界；其三，内容特质。就时间边界而言，多数学者认为“红色”属性萌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明确起点，此后随着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发展而不断生长完善。就主体边界而言，多数观点将作为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人及作为追随一方的人民群众（如革命先锋、建设先锋、改革先锋）都视为红色文化的缔造者，尤以前者为核心主体。除生成时间与生发主体的考量之外，不同事、物被界定为“红色”的关键还在于其在内容特质上彰显出不改的初心及永恒的使命，即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以共产主义为目标、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换言之，“红色”是一个生成时间、生发主体及内容特质三位一体综合考量的概念。

“红色”与“日记”结合而成的“红色日记”一词在报刊中多有提及，然而其概念本身尚不够明晰，其中的关键之处就在于何以识别日记的“红色”属性。当前学界论及“红色日记”多立足于日记的写作时间及写作主体两者来定位，大致指向1921年以来以中国共产党人作为核心主体所撰写的日记，但这一理解仍有待斟酌。事实上，日记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自宋代开始成为独立的文体类别，至最近二百年已呈蔚为大观之势。^②日记的首要功能在于“记事”，因而另有日录、日札、日谱、游记、琐记、纪闻等不同别称；同时，日记作为一种私人书写始终存在关键的第二重功能——“画心”，即写作者在日记中审视剖析自我内在世界，甚而自我斗争与自我纠偏。^③目前依据写作时间及写作主体而被归为红色日记一系列的作品，如写于1926—1935年的《聂耳日记》、1933—1936年的《军中日记》以及《雨花英烈日记》系列，其大篇幅承担的还是日记的“记事”功能。具体而言，《聂耳日记》的绝大多数文字是在描绘日常看报、读书、作

^① 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 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求是》2021年第19期。

^② 参见廖太燕：《私史微观：中国现代作家日记的多元透视》，凤凰出版社2022年版，第1～2页。

^③ 参见张剑：《晚清日记中的世情、人物与文学》，凤凰出版社2022年版，第8～12页。

曲、交友及其他生活琐事;^①童小鹏的《军中日记》记下的则多是行军时的天气、路线及日程,甚至其中多天日记以“休息”“仍休息”寥寥数字呈现;^②《雨花英烈日记》系列也多写下的是读书、交友及工作的生活琐碎。细品之下,这部分“记事”型日记的“红色”属性并不明朗。与之对应,不少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及其他革命先锋人士力图将日记作为自我反思及自我锻造的依仗。如恽代英指出,“吾得日记之益大矣,近来私德方面甚为退化……今特购国民日记记之,誓不中辍,吾以是观吾品性也”^③;叶圣陶曾言,“且我过失孔多,已而察之,志之日记;已而不察,人或告之,亦志之日记,庶以求不贰过也”^④;《雨花英烈日记》系列中的吕惠生日记、晋夫日记也有数篇自我叩问的记述。相对于“记事”型文字,这些“画心”型文字虽体量较小,却直观地体现了先辈们以共产主义为目标、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自我激励、奋发向前的“红色”属性。

就此,本文认为定位“红色日记”同样需要以写作时间、写作主体及内容特质三位一体去综合考量,尤其要把准日记内容的“红色”属性。与这一理解相对应,1963年以来《人民日报》的“日记摘抄”系列则可视作红色日记的典范。1963年2月7日,《人民日报》刊发“雷锋日记摘抄”,此后陆续登载过数十篇“日记摘抄”(参见表1)。这些“日记摘抄”在内容特质上与以往的日记大有不同,它剔除了日记原本关于日常琐碎的单纯记录,而侧重于拣选纯粹的“画心”型文字或者“记事-画心”型文字,日记的“记事”功能全面退居次位。具体而言,“日记摘抄”中的文字大段记录了作者本人或因日间言行、或因读书思考、或因他者对比等而产生的内心波动,其中有自己无法摆脱自利、懒惰及畏难思想的惶恐,也有自己能够做出无我及利他行为的欣喜,更有时刻自我规训的如履薄冰。准确来讲,《人民日报》刊发的“日记摘抄”已经进行了一轮筛选,“去粗取精”后的文字直白地显现为客体化的自身,记录着写作者以崇高的信仰为标杆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心路历程,或曰以革命信仰改造主观世界的心灵轨迹,呈现出高度共性的“自我革命”特质,在内容上真正贴合“红色”二字,属于“红色日记”的典型代表。事实上,1971年,甘肃人民出版社汇编整理《人民日报》登载的部分日记摘抄后出书,就命名为《红色日记》^⑤。而此前以“雷锋日记摘抄”为代表的一系列“日记摘抄”早已被冠以“红色日记”的称谓。本文就将《人民日报》刊发的系列“日记摘抄”作为红色日记的代表,深入挖掘这些红色日记所内蕴的“自我革命”思想。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日记摘抄中,“雷锋日记摘抄”有着特殊的标杆地位,它曾

① 参见聂耳:《聂耳日记》,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版。

② 参见童小鹏:《军中日记——我的长征亲历记》,解放军出版社2017年版。

③ 中央档案馆等编:《恽代英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53页。

④ 《叶圣陶集》第19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⑤ 参见《红色日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在轰轰烈烈的全国学雷锋运动中被广泛传播，激发出一代人书写同类日记的热情，是自我革命型红色日记的先锋与范本。

表 1 1963 年以来《人民日报》“日记摘抄”刊登情况

日记作者	《人民日报》刊登标题	出版日期	版面
雷锋	雷锋日记摘抄	1963. 02. 07	第 5 版
王杰	一心为革命——济南部队装甲兵某部工兵一连班长、烈士王杰日记摘抄	1965. 10. 31	第 6 版
	一心为革命——济南部队装甲兵某部工兵一连班长、烈士王杰日记摘抄	1965. 11. 01	第 5 版
	一心为革命——济南部队装甲兵某部工兵一连班长、烈士王杰日记摘抄	1965. 11. 02	第 6 版
	一心为革命——济南部队装甲兵某部工兵一连班长、烈士王杰日记摘抄（续编）	1965. 11. 11	第 5 版
张春玉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铁道兵某部副班长张春玉同志日记摘抄	1966. 06. 08	第 2 版
刘英俊	毛泽东思想给我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刘英俊同志日记摘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1966. 07. 20	第 2 版
杨怀远	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亮最红的灯塔——工农兵国庆观礼代表畅谈同毛主席的幸福会见·幸福的日子终身难忘——国庆观礼日记摘抄	1966. 10. 06	第 2 版
抢救伤员医疗领导小组	在抢救英雄的日子里——抢救 32111 钻井队英雄伤员医疗领导小组日记摘抄	1966. 10. 19	第 3 版
尉凤英	彻底革命 不断革命 永远革命——尉凤英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和日记摘抄	1966. 10. 24	第 2 版
32111 钻井队	32111 钻井队英雄日记摘抄	1966. 10. 25	第 3 版
蔡永祥	破私立公 一心革命——蔡永祥同志学习心得笔记日记摘抄	1966. 11. 18	第 3 版
余亚周	毛泽东思想哺育着海外英雄儿女——归国华侨青年余亚周日记摘抄	1966. 12. 10	第 3 版
杨小恒	要乐于挑重担子——水利工地民工日记摘抄	1966. 12. 13	第 6 版

续表

日记作者	《人民日报》刊登标题	出版日期	版面
刘学保	心中唯有红太阳 一切献给毛主席——刘学保同志日记摘抄	1968. 04. 28	第3版
金训华	金训华同志日记摘抄	1969. 12. 04	第3版
沈秀芹	“努力，努力，再努力，一定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沈秀芹同志日记摘抄	1970. 06. 15	第4版
李全洲	把毛泽东思想当作第一生命，把读毛主席的书当作第一需要——“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好党员”李全洲书信、日记摘抄	1970. 07. 10	第4版
盛习友	为人民操心最情愿 为人民斗争最幸福 为人民吃苦最愉快 为人民献身最光荣——盛习友同志学习体会和日记摘抄	1971. 07. 05	第3版
吕士才	吕士才同志的日记、书信摘抄	1980. 03. 05	第3版
安珂	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足迹——安珂日记摘抄	1983. 03. 30	第4版
张海迪	生活的旋律——张海迪日记摘抄	1983. 05. 15	第3版
郝达扬	升腾的焰火——党支部书记郝达扬日记摘抄	1991. 05. 09	第3版
孔繁森	孔繁森同志日记摘抄	1995. 04. 28	第3版
吴天祥	吴天祥日记摘抄	1996. 05. 31	第3版
郑培民	郑培民日记摘抄	2002. 10. 15	第2版

二、红色日记中的自我革命思想：以《人民日报》的“日记摘抄”为例

在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何锻造革命的接班人？这其实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20世纪60年代所面对的重要课题。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对立消失，外在政治经济环境失去了作为心灵污染源头的原有意义。从根本上来讲，所有不纯洁的情况只能来自个人的灵魂。此前可以通过阶级标识来辨别的不洁性，现在已经缩回到自我灵魂的深处。因此，这一时期《人民日报》登载的“日记摘抄”系列恰恰放大了早期共产党人日记如恽代英日记的“画心”功能，“自我”或“自己”往往前缀或后缀动词，形成“自我革命”“自我批评”“自我反思”“自我斗争”“对照自己”“对照检查自己”“勉励自己”“鞭策自己”“严格要求自己”“自觉改造自己”“警告自己”“贡献自己”“献

出自己”等类似表达,更有“要向‘我’字开火”^①、“不断地向‘我’字作斗争”^②、“‘拼刺刀’就拼‘我’字”^③等直白的论述,呈现出特殊而深刻的“自我革命”思想。

(一) 自我革命的修养目标

1. 超越“小我”成就“大我”:与集体同在

日常生活中,人们始终面临个体与集体、“小我”与“大我”的矛盾与平衡问题。普通人往往以“小我”为先,追求个人利益,满足自我私欲。然而,《人民日报》登载的“日记摘抄”中,以雷锋为代表的系列作者在日记中贯穿的“自我批评”“自我改造”“自我革命”所指向的“自我”正是自私自利的“小我”。他们极度渴望消除个人欲望,将集体利益真正地置于个人利益之前,成就大公无私、集体至上的“大我”。

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是《雷锋日记》^④中反复陈述的主题。例如,1959年雷锋在日记中曾两次以花与春天比喻个人与集体,他写道:“一朵鲜花扮不出美丽的春天。”^⑤“一花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⑥1960年雷锋在一篇日记中提到“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能永远不干涸”^⑦。1962年3月9日雷锋写道:“好比一条条小渠,如果不汇入江河,永远也不能汹涌澎湃,一泻千里。”^⑧这两处运用了水和江河大海的比喻。1962年6月28日的日记中,雷锋对个人和集体的关系还曾以身体作喻,写道:“我认为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正象细胞和人的整个身体的关系一样。”^⑨不同于花与春天、水与江海的自然比喻以及细胞与人身体的身体比喻,雷锋日记中关于集体与个人关系最著名的比喻是螺丝钉与机器,后升华为“螺丝钉精神”。雷锋在日记中说:

一个人的作用,对于革命事业来说,就如一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机器由于有许许多多的螺丝钉的联接和固定,才成了一个坚实的整体,才能够运转自如,发挥它巨大的工作能力。螺丝钉虽小,其作用是不可估计的。我

① 《彻底革命 不断革命 永远革命——尉凤英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和日记摘抄》,《人民日报》1966年10月24日。

② 《32111 钻井队英雄日记摘抄》,《人民日报》1966年10月25日。

③ 《把毛泽东思想当作第一生命,把读毛主席的书当作第一需要——“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好党员”李全洲书信、日记摘抄》,《人民日报》1970年7月10日。

④ 《雷锋日记》存在多个版本,文字上删减增补略有不同。本文的文字引用参考《人民日报》1963年登载的“雷锋日记摘抄”及解放军文艺社于1963年4月出版的最早版本,具体可参见雷锋:《雷锋日记》,解放军文艺社1963年版。

⑤ 雷锋:《雷锋日记》,解放军文艺社1963年版,第1页。

⑥ 雷锋:《雷锋日记》,解放军文艺社1963年版,第2页。

⑦ 雷锋:《雷锋日记》,解放军文艺社1963年版,第14页。

⑧ 雷锋:《雷锋日记》,解放军文艺社1963年版,第73页。

⑨ 雷锋:《雷锋日记》,解放军文艺社1963年版,第83页。

愿永远做一个螺丝钉。螺丝钉要经常保养和清洗，才不会生锈。人的思想也是这样，要经常检查，才不会出毛病。^①

将革命事业比作机器，将人比作零件，这并不是雷锋的首创，雷锋也并非把这种理念写进日记的唯一一人。早在十月革命前，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就构建出一种以“革命理性”的方式生活并献身于伟大解放事业的理想新人。此后列宁也曾多次将布尔什维克党比作工厂，将党员比作机器的零件。至20世纪20年代，苏联理论家将理想新人描绘为“机器人格”已颇成气候，这种人格摆脱了个体心理层面的混乱干扰，理性且严谨地遵循着历史规定的方向前行。^②而在雷锋日记摘抄之前，以螺丝钉喻人也已相对普遍。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把革命文艺比作整个革命事业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③；《人民日报》首提“螺丝钉”则是在1947年9月25日的第4版，军区政治部几位不计名誉地位、默默工作的战士在一篇新闻采访中被比作“螺丝钉”。^④

以机器与零件对个体与集体关系的比喻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在自然比喻和身体比喻中，每一个“我”并非不可或缺，缺少了一朵花、一滴水、一个细胞，春天依旧是春天，江海依旧是江海，身体也依旧运转。但在机器和零件的比喻中，缺少了螺丝钉般的“我”，机器便无法正常工作。在为集体付出的过程中，个体主观感受到自我存在的关键意义，这是一种现代自我意识的觉醒。但是，此时觉醒的现代自我不是狭隘的“小我”，是必须融入集体、以自我价值推动集体前进的“大我”。“我”必须作为“大我”的一部分存在并工作，否则就是无存在意义的废料。机器化的个体与集体关系比喻反映出雷锋自我意识的觉醒，更反映出其“大我”意识的觉醒。事实上，不只雷锋如此，在以雷锋为代表的系列红色日记作者看来，只有所做的工作是为了让集体大我更好地发展，个体才能切实获得生命的本真。因此，个人必须时刻按照集体大我的要求进行自我检查与自我打磨，才能突破“小我”，抛弃个人主义，真正做到“永不生锈”，更好地在集体中发挥作用，成就融化在集体中的“大我”。

2. 革除“旧我”成就“新我”：与历史同向

《人民日报》所刊发的系列“日记摘抄”中，写作者自我革命的目标不仅仅在于超越“小我”成就“大我”。这些日记当中始终有新旧社会的反差，对应地也存在“新我”与“旧我”的强烈对比。换言之，红色日记的作者们在自我革命目标上为“大我”对“小我”的取代附上了一层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新面目：“小我”即“旧我”，“大我”即“新我”。他们努力使自我与历史发展的进程保持一致，不仅要嵌入集体大我，更要嵌入历史洪流，真切地拥抱一种基于历史的

① 雷锋：《雷锋日记》，解放军文艺社1963年版，第77页。

② Jochen Hellbeck, *Revolution on My Mind: Writing A Diary under Stali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5.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0页。

④ 参见毓明：《访问“螺丝钉”》，《人民日报》1947年9月25日。

“自我”概念。在他们看来，只有服务于历史发展规律的“自我”才构成社会主义的主体性，生命才能获得其本真性。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社会处在一个动荡战乱的时期，阶级矛盾尖锐，封建思想、资本主义思想等充斥其中。雷锋及其他“日记摘抄”的作者们或出生于旧社会，或受到旧社会思想遗留的影响。例如，雷锋在日记中数次提到“我出身在一个很贫穷的农民家庭”^①“我还是一个孤苦伶仃的穷孩子”^②以及他在旧社会受到的苦难和折磨，同时也表明，“现在，我是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国家的主人。将来，我永远是党的忠实儿女，人民的勤务员”^③。字里行间流露出明显的历史流动感，“我”不是静止的“我”，而是更新后的“我”，是“旧我”向“新我”的转变，是“新我”对“旧我”的替代。

王杰日记摘抄^④中这种与历史发展相向而行、以“新我”代替“旧我”的历史流动感表现得更加强烈。王杰按照阶级分析的教导重新认识自己的家庭，他同时意识到自己身上残留有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影响。在新社会，他力图通过“自我革命”努力更新原生家庭塑造出的“旧我”，成就与社会主义社会融为一体的“新我”。1964年12月27日，王杰在日记中写道：

自己出身于中农的家庭。中农，一方面是劳动者，自食其力，拥护革命；另一方面是小生产者，私有观念强，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这样的家庭出身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从小就幻想‘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认为加入了组织就可以在社会上找个好工作，有前途。这种思想在党的教育下，经过三年的部队生活，虽然逐步得到消除，但是我身上的这个阶级烙印仍然存在，在遇到实际问题时往往不能正确处理。所以我深深地体会到，思想改造对我来说是十分必要的。^⑤

在这篇日记中，王杰认为自己曾经有过为自己谋好工作、求好前途、幻想自己“出人头地”的种种想法，这都是高度以“小我”为中心的，这些想法同时也是与自己家庭出身关联很大的“旧我”的体现。自私倾向是与财产私有制高度相关的，是“资本主义”遗留。王杰在1965年2月的日记中提到他和同志们闲聊时无意中说过“我也是一个超期服役的老战士了”^⑥，当晚他深刻反思一闪念间脱口而出的这句抱怨，认为自己把超期服役当作包袱是一种个人主义旧思想的体现。此外，王杰还认为自己参加集体看电影占个好座位、洗澡找个好地方这

① 雷锋：《雷锋日记》，解放军文艺社1963年版，第23页。

② 雷锋：《雷锋日记》，解放军文艺社1963年版，第84页。

③ 雷锋：《雷锋日记》，解放军文艺社1963年版，第72页。

④ 与《雷锋日记》一样，本文所有关于《王杰日记》的文字引用《人民日报》1965年登载的日记摘抄，并参考解放军报编辑部编：《王杰日记》，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⑤ 《一心为革命——济南部队装甲兵某部工兵一连班长、烈士王杰日记摘抄（续编）》，《人民日报》1965年11月11日。

⑥ 《故事会》第21辑，上海文化出版社1966年版，第35页。

些小事都是个人主义旧思想的表现。他在1964年10月18日的日记中曾总结过这些思想的根源,即“个人的生活看起来点点滴滴,但是反映的思想,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①。换言之,思想改造指向的不仅是“小我”,还是与历史发展进程“反动”的“旧我”。对比而言,雷锋在日记中往往将自己偶然出现的自私与狭隘归为“小我”而非“旧我”思想的体现,王杰在日记中则将自己关于军衔级别、结婚、探家或复员的偶然念头与“旧我”相关联。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两人的阶级出身有关。

无论如何,在《人民日报》的系列“日记摘抄”中,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小我”也被归于“旧思想”之列。写作者们倾尽全力去克服这些“旧思想”,力图“以彻底革命的精神,同自己旧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一刀两断”^②,努力重塑出一个与历史同向同行的“新我”。正如1966年6月8日《人民日报》登载的张春玉日记摘抄中所记下的,他们致力于让自己短暂的人生化作永恒历史中的一段,“这一辈子,愿作一把泥土、一块石子、一根枕木,铺在通往共产主义的大道上,让革命的列车从我身上通过,全速前进”^③。

(二) 自我革命的修养方法

如何在日常工作及平凡劳动中超越“小我”成就“大我”,革除“旧我”成就“新我”,时刻做到以他人、以集体为重,与历史、与未来同向,是以雷锋为代表的红色日记作者们思考与行动的重点。他们深受集体大我及历史使命的激励,时刻反思着自己背负的“原罪”,时不时还流露出未达目标的焦虑与急迫,因为“头脑这个阵地,无产阶级思想不去占领,资产阶级思想必去占领”^④,因为“思想上的敌人……今天在这里把它打倒了,明天又会在那里冒出来”^⑤,还因为思想上的敌人是“无形的”“潜移默化的”“不知不觉地产生,但不能不知不觉地跑掉”^⑥。由此,掌握自我革命的方式方法成为红色日记记述的重点内容,而共性的方法主要包括政治理论学习、榜样对标学习以及慎独自省三种。

首先,坚持政治理论学习。《人民日报》登载的系列“日记摘抄”始终强调并坚持政治理论学习。事实上,包括雷锋日记在内,“日记摘抄”系列的作者们在行文时反复提及“改造世界观”和“改造主观世界”,反映出毛泽东主席“改

① 解放军报编辑部编:《王杰日记》,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页。

② 《彻底革命 不断革命 永远革命——尉凤英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和日记摘抄》,《人民日报》1966年10月24日。

③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铁道兵某部副班长张春玉同志日记摘抄》,《人民日报》1966年6月8日。

④ 《金训华同志日记摘抄》,《人民日报》1969年12月4日。

⑤ 《彻底革命 不断革命 永远革命——尉凤英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和日记摘抄》,《人民日报》1966年10月24日。

⑥ 《心中唯有红太阳 一切献给毛主席——刘学保同志日记摘抄》,《人民日报》1968年4月28日。

造主观世界”的理论对他们的影响。他们笃信世界观决定人生观，只有通晓历史发展的规律，明白世界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个体才能够站在历史大潮的潮头，做推动历史前进的“新我”。也只有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世界，个体才能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我”观。相比于改造人生观，改造世界观是最为根本的，而政治理论学习恰恰是改造世界观、重塑世界观以实现自我革命的首要方法。

改造世界观与改造人生观的命题本为一体，人生观同样体现着世界观改造的成效。基于此，在通过政治理论学习改造世界观的同时，红色日记的作者们也从相应的学习材料尤其是毛主席的著作中汲取道德践履的文字用于自我锤炼与自我激励，在字里行间呈现出从改造世界观到改造人生观的话语转换。以雷锋日记为例，雷锋日记中反复强调学习毛泽东主席的著作，其中有19篇日记曾直接摘引毛主席著作原文，但这19篇日记对毛主席著作原文的摘抄都不是纯粹的理论文字，而是砥砺人心奋进的革命修养型语句。如，1960年12月28日，雷锋在日记中摘引《毛泽东选集》第3卷中《〈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的“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①；1961年2月16日，雷锋在日记中引用《反对自由主义》中的“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②；1961年12月31日则摘引《关于重庆谈判》中的原话：“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③另外，雷锋及其他日记写作者提及次数最多的毛主席著述当属《纪念白求恩》和《为人民服务》，这两个篇幅不长的文章都有着高度的道德实践指向。对此，贺照田分析指出，雷锋把毛主席的著作当成修养书来读，认为他对“能有效激发、调动他的向上心与身心饱满度，更有助于他精神人格、行为修养成长的文字”^④更敏感。然而，这并不是雷锋日记的独有特征，一系列“日记摘抄”的作者们都有此倾向。对此，有学者分析指出，改造主观世界的理论与实践可理解为道德的政治化，个体是否成长为与集体同在的“大我”、与历史同向的“新我”已不仅是道德评价，更是政治立场的集中体现。

其次，强化榜样人物学习。因世界观与人生观一体交融，在实现“大我”与“新我”的自我革命目标时，个体往往寻求自我革命目标的人格化载体——榜样，并贯彻对榜样的对标与模仿。事实上，“榜样”的存在更易将改造世界观的抽象论述化为生动具体的“形象嵌入”。雷锋、王杰及其他红色日记作者在日

① 雷锋：《雷锋日记》，解放军文艺社1963年版，第23～24页。

② 雷锋：《雷锋日记》，解放军文艺社1963年版，第27页。

③ 雷锋：《雷锋日记》，解放军文艺社1963年版，第61页。

④ 贺照田：《如何让历史文献更充分向我们敞开……——从雷锋一则日记的读解说起》，《开放时代》2021年第6期。

记中都反复提到英雄模范的姓名,并详细地写出要向他们学习的具体内容,甚至规划自己的学习步骤。以雷锋为例,长征战士张思德、劳动模范张秀云、革命战士聂耳、战斗英雄董存瑞与杨根思、共产党员郑春满、救火英雄向秀丽、党的好儿子龙均爵以及国际友人白求恩等都在其日记中出现过,并化身为雷锋对标学习的楷模。雷锋在1960年3月10日、1962年1月14日、1962年4月15日三次提及革命战士黄继光,1961年6月15日、1962年1月14日两次提及革命战士邱少云,要求自己学习他们自觉遵纪、奋勇杀敌的精神。在雷锋事迹及王杰事迹被广泛宣传后,他们也化身为后续的红色日记作者们对标学习的榜样人物。

在此过程中,“虚拟榜样”的塑造也承担着同样的自我革命引导使命。例如,雷锋在评剧《血泪仇》和《洪湖赤卫队》《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在前进的道路上》等影视作品的观后感中,总能敏感地捕捉到主人公的政治立场、人生价值及道德原则,并反复提醒自己要向他们看齐、向他们学习。总体而言,以雷锋为代表的红色日记作者们在榜样学习过程中直接指向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及相关的革命道德品质,以榜样反观自身,“对照自己”“对照检查自己”,以此改造自己的“小我”思想、“旧我”思想,加强自我革命。

最后,践行慎独与自省。在日记写作中,“我”一天的言行举止甚至意识活动都成为被省察与被反思的对象。一系列红色日记的文字构筑的就是一个持续存在的内心虚拟法庭,诉讼者与被诉讼者都是“我”本人。由此,在白日生活中一念萌动的私心私欲及行为举止会在夜深人静时被重新审视。尉凤英1965年9月的一篇日记就如此写道:“人的思想不经常‘擦洗’也要生锈,会逐渐腐朽变质……每天晚上要回忆回忆这一天作了些什么工作,有什么成绩,有哪些缺点;成绩如何发扬,缺点如何克服。发现有‘锈’,就得擦洗,防止‘生锈’。”^①更进一步而言,人的思想如若要做到“永不生锈”,未曾萌动私心也需时常自我警戒,系列“日记摘抄”中还经常出现自我对自我的提前预警及预防式训诫,“积淀、潜伏在无意识深处的宿疾也成为反省、省察之对象”^②。那么,依托于日记书写的自我省察及自我审判的过程就逐步发展成为涤荡心灵甚至隔绝心灵污染的苦行之旅。对此,莫里斯·迈斯纳指出,“必不可少的苦行主义生活模式的目的不在其自身,它只是一种手段,目的在于使中国人能够改造自己、改造自然,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曾经揭示的存在于未来共产主义乌托邦中的‘真正人的生活’”^③。

① 《彻底革命 不断革命 永远革命——尉凤英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和日记摘抄》,《人民日报》1966年10月24日。

② 陈立胜:《从“修身”到“工夫”:儒家“内圣学”的开显与转折》,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21年版,第110页。

③ [美]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张宁、陈铭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3页。

三、红色日记中的自我革命思想对传统修身文化的继承与超越

尽管一系列红色日记中有着对传统封建社会直白的阶级批判，但红色日记中的自我革命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异是浅层的，相通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可以说，雷锋、王杰等人在其日记中所展现出的自我革命思想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并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特殊语境而进行现代转化的产物，具有潜在的传统文化底蕴。本部分旨在点明红色日记中的自我革命思想与传统修身文化之间深层的隐性联系，并分析其对传统修身文化的继承与超越。

首先，红色日记中的“自我”理解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我”理解有关键的相通之处。本文关注的《人民日报》“日记摘抄”系列存在一个典型特征，即日记的核心功能从“记事”转向“画心”，主要功能在于以笔写心来改造主观世界。在此基础上，何为真正的“自我”成为核心的关键问题。

在日记的作者们看来，自我是分裂的，需要超越“小我”来成就“大我”，亦需要革除“旧我”来成就“新我”。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我”定位是构成此种思维方式重要的文化底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我”的理解同样是分裂的。真正的“自我”存在于横向为差序格局、纵向为等级排序的人际关系网络中，是由伦理角色而非个体本身决定的。在以小农立基的传统中国社会中，人必须要在土地上扎根繁衍、安土重迁。在此基础上，个体被嵌入以血缘为主导的社会网络或者社会等级之中，由基于伦常关系的“角色”来定位。个体是父子关系中的父或者子，是兄弟关系中的兄或者弟，是悠远的祖先血脉传承轴线上的一个节点，他不是独立的个人，而是一种社会性存在。针对此点，安乐哲在《儒家角色伦理学》中表明，中国古人的自我是关系当中的纽结，而源于这种角色伦理，儒家形成了独特的“互系性”思维模式；^① 陈云则指出儒家宗法集体主义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它以“家—国—天下”为集体意向追求和行动逻辑，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② 在儒家宗法集体主义影响下，人的本质被认为是社会本位的，相应地，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道德规范的标准系统也必然是社会本位的。在此基础上，个人首先考虑的不再是自己的权利，而是自己作为伦理角色需承担的种种义务；不是“我”能够在社会中享受什么，而是“我”能够为家做什么。传统理想人格是“义务型”文化的人格折射。然而，关系化的个体身上同时存在或隐藏着一个始终不可消除的分裂的自我，即以欲望和利益为中心的“私我”。任何个体都必须通过超越“小我”成就“大我”，

^① 参见[美] 安乐哲：《儒家角色伦理学——一套特色伦理学词汇》，[美] 孟巍隆译，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0页。

^② 参见陈云：《儒家宗法集体主义研究的现状、问题与展望》，《云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才能获得生命本真的意义。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称“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他认为,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存在和发展,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属性。这种认识比起他叛而伐之的西方文化传统,反而与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本质属性的认识存在更大程度的相通之处。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高度的相通性使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落地生根。当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二者都共同要求社会成员通过积极的个人修养改造主观世界,主动以社会属性去引导人的自然属性。事实上,在中国,社会性的“自我”才是本真之我的理解,存在古今延续性。对此,阎云翔、杨雯琦改造费孝通的“自我主义”概念,指出长期以来中国人对自我的理解都可以归为“社会自我主义”。在传统中国,真正的自我即社会属性的“大我”,是以血缘为轴心的家族;而在毛泽东时代,家族则为社会主义国家所取代。^②

其次,红色日记中贯穿的“自我革命”思想也可视作传统修身文化的现代延续。基于对“自我”的社会属性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了以“正己”“克己”为关键的修身文化,修身正己的标准是由社会群体本位的价值系统及社会角色本位的规范系统所规定的,修身就是要扮演好为人子、为人父、为人君、为人臣以及与人交等社会角色。同时,个人作为社会 and 集体得以存在的基础,也必须依靠持续不断的自我修养培养内在的德性,进而向外推展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例如,“仁”作为儒家的核心概念,要求君子达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③,即将自己养成的仁德作用于人际关系当中,感知他人所“欲”与“不欲”,在实践中做到“爱他人”,进而扩展到“爱社会”,真正适应人的社会属性与社会本位的价值评判标准。此外,儒家倡导“礼节”,即通过礼乐教化来引导和节制人欲。对此,《史记·礼书》有言:“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二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④礼因节制欲望而生,以礼节欲,才能实现个人修养的提升,成为节制有度、具有强社会属性的君子。总体而言,高要求的社会性“自我”就意味着主体自我需要持续性、终身性的自我调适、自我修养以压制自我自然性的欲望。对此,《论语·学而》讲的“吾日三省吾身”甚至发展为传统“日省”式的修身方式,以“日省”为核心的传统修身日记也成为儒家传统中别具一格的修身方法。^⑤雷锋、王杰等人的日记并非单纯地记录日常琐碎,而是焦灼地改造自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页。

② 参见阎云翔、杨雯琦:《社会自我主义:中国式亲密关系——中国北方农村的代际亲密关系与下行式家庭主义》,《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7期。

③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4页。

④ 楼宇烈主撰:《荀子新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375页。

⑤ 参见王汎森:《日谱与明末清初思想家——以颜李学派为主的讨论》,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8页。

我，日复一日在文字中对标完美的榜样人格，反思心中闪现的自私，提醒自己不断自我革命以时时纠正偏差。这些日记可算作传统修身理论在革命与建设时期的重要延续。

最后，红色日记中提到的理论联系实际、向榜样学习的修养理念等同样有着一脉传承的传统文化渊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是道德性的“知”，作为知识的道德必须落实到实践中才会成为真正的“知”。在此意义上，传统的道德之“知”必须经历一种接近于“理论联系实际”的自我转化，它不能停留于理智层面，以一种纯粹的认知性获得而存在，而需要通过切实的自我体验融入充沛的情感和坚强的意志，经由一种情动达到杜维明所谓的“体知”。在儒家看来，如不进行反躬修己的学思工夫，道德主体所拥有的“知”，最多不过是始燃之火、始达之泉，终必在日常生活中消亡殆尽。一系列红色日记中的政治理论学习主要指向马列经典文本尤其是毛泽东著作的学习，但在摘记及引用中多数落脚于道德性的“知”。红色日记还始终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在日常生活中将所学的理论用于指导实践，这些都可看作传统文化以体知为核心的修养理论的延续与变形。同样，榜样学习的方式方法也有其传统文化基源。中国传统社会倡导“以德治国”，即用道德教化的方法引导社会成员自觉遵守主流的价值规范体系，其中树立道德典范就成为核心方式之一。统治阶级将符合主流道德标准的典范人物推广、宣传，引导百姓有意识甚至无意识地学习，从而使统治阶级的政治秩序与道德价值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巩固。事实上，道德性的修养目标与人格化的榜样呈现本就是一体化的，而官方的选树典型与个体的榜样学习又相互呼应，红色日记中榜样学习的修养方式及其背后选树典型的官方行为都呈现出对传统文化基因的现代传承。

需要指出的是，红色日记中的自我革命思想对传统修身文化还存在一种“现代性”的超越。红色日记中的“自我”理解与传统的“自我”理解通而不同。对比《雷锋日记》中的“螺丝钉与机器”比喻，《礼记·哀公问》有云：“身也者，亲之枝也，敢不敬与？不能敬其身，是伤其亲；伤其亲，是伤其本；伤其本，枝从而亡。”^① 后者是农业社会中对个体与家族关系的一种“植物”式比喻。相对于家族集体而言，个体明显是次要的。螺丝钉的比喻则呈现出明显的现代化特色，其中现代“自我”意识的觉醒恰恰体现在雷锋笔下的那句“螺丝钉虽小，其作用是不可估计的”^②。这正如查尔斯·泰勒在《现代性的隐忧》中所言，基于个人自主性的现代文化源自一种历史性的深刻转变，人们由此获得了一种崭新的“自我理解”，即内在自我被发现并开始被赋予独特的价值。^③ 除此之外，红色日记中所体现的自我革命思想比之传统修身文化而言，其践行主体已经

① 胡平生、张萌译注：《礼记》（下），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962页。

② 雷锋：《雷锋日记》，解放军文艺社1963年版，第77页。

③ 参见〔加拿大〕查尔斯·泰勒：《现代性的隐忧：需要被挽救的本真理想》，程炼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7页。

不仅仅局限在作为劳心者的士大夫阶层。尽管《礼记·大学》有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①，但老子有愚民论，《论语·泰伯》也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②的说法。更多时候，传统修身文化有着明确的阶层指向，士大夫阶层与民始终是不平等的。相对而言，红色日记的作者们正是新中国成立后文化扫盲运动的受益群体，他们是普通的士兵、工人、农民，修身文化自此才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全民覆盖。

The Self-Revolution Thought in Red Diaries and Its Inheritance and Transcendence of Traditional Self-Cultivation Culture —Take *People's Daily's* “Diary Excerpts” as an Example

Zhang Huiyun Wang Fuyu

Abstract: As a significant cultural resource, Red Diaries have been frequently mentioned; however, their connotation and self-revolutionary thoughts remain relatively obscure in terms of research. This paper firstly provides a clear definition of red diaries and takes “diary excerpts” from *People's Daily* as Research object, subsequently explores the self-revolutionary thoughts embedded within these writings. The objective is to elucidate the writers' self-revolutionary goals in their diaries, which extend beyond personal growth (“small I”) towards achieving collective progress (“big I”), eliminating outdated ideologies (“old I”) to embrace new perspectives (“new I”). Furthermore, this study seeks to refine the methods employed by these writers for self-transformation by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transforming one's worldview as a starting point. Ultimately, it is argued that the self-revolutionary thoughts found within red diaries possess profound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notations while simultaneously representing creative transformations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s within traditional practices of self-cultivation.

Keywords: Red Diary; *People's Daily*; Lei Feng; Self-Revolution

[责任编辑：靳贺]

① 胡平生、张萌译注：《礼记》（下），中华书局 2017 年版，第 1163 页。

②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80 页。

作为政治记忆与修辞的“延安”： 改革开放初期的“延安”话语与党的建设*

吴 昱**

【摘要】在改革开放初期，“延安”作为一个作风优良、艰苦奋斗和伟大胜利的象征与符号，在领导人的谈话和讲话中屡屡被提及。在改革开放的同时，面对重新确立思想路线、树立艰苦奋斗作风和从严治党等巨大挑战，“延安”作为一种成功的革命经验与集体记忆，为解决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组织挑战，打下了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

【关键词】改革开放；延安话语；政治记忆；修辞话语

在已有的改革开放研究中，较为集中的是改革的争议、措施及具体进程的历史性描述。而在改革开放初期，如何运用中国共产党成功的革命经验作为意识形态的依据，为粉碎“四人帮”、反对“两个凡是”错误思想之后的改革开放进程树立思想和作风旗帜，并为市场经济建设与党风党纪的逐步完善提供意识形态的支撑，则是值得继续深究的话题。1979年4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与广东省领导谈话时将新生的“出口加工区”^①与陕甘宁特区相提并论，这是邓小平在赋予改革意义与暗喻政治价值之间的重要发明，也从“文化大革命”后执政群体的集体记忆中唤醒了对热火朝天、目标专一的延安时代的记忆，更开启了改革开放后重塑党风、党性秩序与干部队伍建设的意识形态进程。探究“延安”话语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修辞倡导与意识形态功能，既是追溯改革开放以来党建过程的历史记忆与历史资源，也是为新时代继续完善与发展党的建设探索形而上且行之有效的思想方法与行动路径。

* 本文系暨南大学第三批“宁静致远”工程“启明星计划”项目（项目编号：19JNQM2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

** 吴昱，历史学博士，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暨南大学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院专职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编（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36页。

1968年5月3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了《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的社论,首次向全国、全世界提出了“延安精神”这一科学概念,已有研究对延安精神进行了准确扼要的概括。^①从改革开放初期中央领导人频繁引用“延安”作为思想资源与修辞话语一事,不难看出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过程中,既要开拓新路,又要坚守初心,而“延安”作为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从弱到强的革命胜利的象征,无疑是最具有说服力和支撑力的。刘亚猛在研究意识形态表达和政治修辞之间的关系时指出:“说服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交换(transaction)。”同时,“修辞者并不总是通过取悦、调适、顺应、认同来影响并说动受众,以完成上面提到的修辞的根本任务。他往往还通过对受众施加各种有形无形的压力来促使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态度或观点”。^②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5年2月13日至16日在延安等地考察时强调:“我们党是一个具有长期奋斗历史和优良革命传统的党,也是一个紧跟时代步伐、善于与时俱进的党。党的建设必须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结合时代条件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全面从严治党要继续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要把抓理想信念贯穿始终,提高辩证思维、系统思维能力,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为党和人民事业艰苦奋斗、不懈奋斗。”^③将“延安”话语从“实事求是”“艰苦奋斗”“从严治党”角度进行深入分析,对于认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的执政党自身建设问题,有着深刻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作为“实事求是”思想资源的“延安”话语

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④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时,第一次详细阐述了“实事求是”的内涵。1941年年底,毛泽东为中央党校定下“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校训,并在1943年为中央党校新落成的大礼堂题词“实事求是”。由此,“实事求是”成为中央党校乃至党的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但在粉碎“四人帮”后,“两个凡是”的思想路线一度

① “延安精神”被概括为“是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为灵魂的革命精神”“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精髓的求实精神”“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本质的奉献精神”“是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标志的创业精神”。参见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128~1130页。

② 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12~113页。

③ 《“我是延安人,回来看一看,向大家拜年”》,《中国青年报》2015年2月17日。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

甚嚣尘上，给百废待兴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带来严重的思想阻碍。^① 1977年4月10日，尚未复出工作的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②。什么是“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1977年7月21日，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发表讲话，其中便援引延安经验与延安作风，倡导“实事求是”的作风作为，重新倡导正确的思想方法与作风道路。他在讲话中指出，“从延安整风以后，无论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团结一致”，这种良好局面的出现正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建立的这个党，既能够充分发扬民主，充分发挥下面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又能够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高度的集中”。^③ 在粉碎“四人帮”后面临重整国家建设秩序、统一思想路线时，“怎样才能达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呢？就是要好好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建设这个领域里的思想。这里面内容很多。比如高度民主与高度集中相结合。比如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比如‘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比如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法。比如充分发扬民主，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比如群众路线，信任群众。比如，在延安中央党校，毛泽东同志亲笔题的四个大字，叫‘实事求是’……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④。有研究认为，邓小平的信件及讲话“是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⑤。

刚刚复出工作，邓小平便将作风问题作为首先和重点抓的工作，而“延安”这一历史记忆和政治话语成为他向全党发出号召的重要政治资源。1977年8月3日下午，邓小平在与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商议为他起草在中共十一大的讲话稿时指出：“我在这个会上想讲一讲，不要太长。重点是讲民主集中制与作风……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制度。讲作风，实际上是对延安作风的阐述。根据延安作风，形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⑥ 在同年8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中，邓小平向全党发出倡议：“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老实

①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社论说：“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编（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8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⑤ 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70页。

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① 重塑延安时期“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工作作风,努力突破“两个凡是”在思想和实践上造成的现实障碍,是邓小平重提“延安”记忆的重要原因。

党的十一大以后,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干部在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相继在《人民日报》发表重要文章,对邓小平提出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观点遥相呼应。聂荣臻在《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中指出:“要搞好革命,搞好建设,就要有一个好的党风,好的军风,好的民风,好的学风。归根到底,是要搞好党的作风。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说,要搞好党的作风,最重要的是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② 张鼎丞则发表《整风在延安中央党校》一文,指出延安整风的目的在于“树立和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为核心”。他尤其强调,“党校在整风运动中十分注意把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真正贯彻到思想教育、思想改造工作中去”,“从具体情况出发,用辩证的、全面的、历史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进行具体分析的做法,是正确地贯彻党的整风方针的核心问题”。^③ 陈云更是以《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为题,鲜明指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思想路线问题。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如果我们离开了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那么,我们就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成为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者,那么,我们的革命工作就要陷于失败。所以,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④。老革命家们的延安记忆与延安经验,为在党内呼吁和重塑正确的思想路线开辟了思辨和追寻的道路。

与此同时,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胡耀邦则根据党的十一大报告中“要认真组织力量研究党史”^⑤的要求,在1977年9月22日听取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党建教研室负责人汇报时明确指出,党史“就是着重讨论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一些问题”^⑥。1978年1月18日,吴江将研究“三次路线斗争”文件(打印稿)报送胡耀邦,文件中强调:“我们应当用毛主席一向提倡的延安整风精神和科学态度,摆脱个人利害得失的种种考虑,敢于触及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种种思想禁区 and 一切被实践证明为谬误和片面的东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如实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编(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6~67页。

② 聂荣臻:《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人民日报》1977年9月5日。

③ 张鼎丞:《整风在延安中央党校》,《人民日报》1977年9月20日。

④ 陈云:《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纪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一周年》,《人民日报》1977年9月28日。

⑤ 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人民日报》1977年8月23日。

⑥ 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年版,第20~21页。

地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经验教训（包括个人的经验教训在内）。^①这份文件在修改后，于同年4月发给中央党校复校后第一批800名学员进行讨论，在激烈的争论中开始以实践为标准、事实为依据对党史进行思考，为之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首先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次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发全文。5月12日《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全文转载该文，而两天之内全国35家省、市以上的大报有25家转载了这篇文章^②，由此引发一场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③在大讨论的重要时刻，邓小平在明确表达支持的同时，多次在修辞话语中使用“延安”资源，加大对这一立场的支撑力度。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发表谈话，认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④。在这一解放思想背景下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前提下对许多具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谈论和反思，以至于邓小平在同年12月1日晚与李先念、许世友、李德生、杨易辰、王恩茂、任仲夷、万里、陈丕显、段君毅、胡立教等人谈话时发出感慨：“这次会很好，实际上从五七年以来，就没有这个局面了，可惜，可惜。这正是延安作风，毛主席的作风，这是真正的党的好作风。”第二天，他把同样的话又向胡耀邦和于光远说了一遍。^⑤由此可见，“延安”资源与“延安”记忆不仅是推动恢复党内实事求是作风的重要话语依据，也是恢复党内生活正常生态、重构正常党内关系的重要凭据。

二、作为“艰苦奋斗”思想资源的“延安”话语

恢复良好的党内风气，首先要从重塑党内干部个人坚定不移的党性追求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做起。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推动党内民主生活正常化的要求日渐迫切，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摆上中央工作的日程。1979年1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① 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年版，第25页。

② 参见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年版，第84页。

③ 有关这一争论的具体过程，参见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四章至第九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年版。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页。

⑤ 参见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3～234页。

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并拟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后，于3月19日向全社会公布，并要求全党开展学习讨论和提出修改意见。^①在这一文件制定后，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又针对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问题专门制定《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专门就这一问题重新强调恢复艰苦奋斗作风的重要性。邓小平在讲话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必须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他回忆起革命的过程中经历过不少困难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的时候也是很苦的啊！”但为什么最后能够渡过这些困难的时期？“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另外，“那个时候整个风气也不同，我们的干部比较接近群众，所以能够很快渡过困难”。^②所以邓小平强调，“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③。

防腐拒变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在建设发展过程中直面和认真回应的课题。始终保持高昂的革命精神、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和生活作风，是应对改革开放新挑战的重要思想武器。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强调：“艰苦创业，首先要我们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带头。我们不是反对特殊化吗？这是一场严肃的斗争。特殊化不只是部分高级干部，各级都有，各个部门都有。总之，我们一些干部成了老爷就是了。”所以他举延安为例，要求“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努力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努力学习周恩来等同志的榜样，在艰苦创业方面起模范作用”。^④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再次重申：“我们不是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上述的革命精神参加革命到现在吗？从延安到新中国，除了靠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外，不是靠这些宝贵的革命精神吸引了全国人民和国外友好人士吗？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否则，我们自己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还怎么能教育青年，还怎么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⑤

在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面对外来思潮的冲击与生活方式的逐步改变，昔日艰苦奋斗的作风还需不需要坚持，邓小平给出了非常明确的回答。1981年1月4日，他会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史蒂文斯和美国总统出口委员会副主席陈香梅时说：“中国是很穷，但有一个长处，就是中国本身的生存能力比较强，还

① 参见张士义：《打铁必须自身硬：改革开放四十年党建史》，天地出版社2018年版，第76～7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9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0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页。

有就是穷日子过惯了。最典型的是我们的延安时期，吃饭穿衣都困难。包括那时我们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我们都能够生存。”^①同年9月9日，他在会见日本公明党第十次访华代表团时指出：“‘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年轻一代人的思想混乱，其中一点就是盲目崇拜西方。其实，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的精神面貌、道德风尚是很好的，人民有理想、有奔头，着眼于更远的目标，照顾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照顾左邻右舍。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精神文明，我们在延安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大家过得非常愉快，什么困难也压不倒我们，我们把它叫做‘延安精神’。”^②同年11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财政部部长唐纳德·里根时再次强调：“搞中国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新提法就是建立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解释所谓“高度文明”，“就是人民要有理想，个人利益要服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要守纪律，要有道德，要坚持我们历来的艰苦奋斗的传统。否则我们的事业是不会有希望的”。所以他又一次提到了延安精神的重要：“‘文化大革命’前是很好的。那时，我们是延安传统、延安精神。我们在延安时，什么都困难，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棉花，穿衣服都发生困难，连盐、火柴都没有。就是按照毛主席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方针，自己拿锄头开荒，种粮食，结果所有的困难都克服了，过得很好。那种精神现在中国仍然需要。”^③1982年8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邓昌黎、陈树柏等时依然在反复强调：“没有理想、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行，精神面貌可以直接影响物质。延安时候我们有什么？物质条件很差，就靠精神文明。靠有理想，靠坚强的信念，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在某种情况下，这种精神有决定意义。”^④

对于艰苦奋斗的作风精神，不仅要在党内大力提倡和恢复，更要做好相关的宣传工作，把这样的要求和实践向党内外进行传播。1979年3月27日，邓小平就准备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稿问题与胡耀邦、胡乔木等谈话，他指出：“为什么不多宣传党的好的传统？如守纪律、艰苦奋斗等。为什么我们的电影不搞这些题材，加以艺术概括……国内现在最大的政治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心一意奔向四个现代化。搞四个现代化，我们会遇到许多困难，要使群众做好准备。”^⑤

不只邓小平频繁地引用“延安”作为论述坚持革命精神和革命作风的重要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编（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84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编（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94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编（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26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00页。

性,同一时期的其他中央领导人也强调,即使在条件逐步改善的建设新时期,艰苦奋斗的作风依然不能丢,要充分利用改革开放逐渐改善的条件,认真学习、增强本领。如1982年12月31日,胡耀邦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对出席人员说:“你们学习的条件要比老一辈好。三四十年以前,我们许多同志就没有条件上学,也没有条件自学,至少自学条件很差。比如说在延安,那时哪有现在这么多书啊?连工具书也少得很,教员也很少。现在学习的条件比那时优越得多。”^①而1996年1月24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发表讲话,整段援引邓小平1980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从延安到新中国,除了靠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外,不是靠这些宝贵的革命精神吸引了全国人民和国外友好人士吗?”^②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征程中始终重视对艰苦奋斗精神的传承,而这一精神动力也促使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循序渐进推动从严治党的作风倡导、深入监督和制度建设。

三、作为“从严治党”思想资源的“延安”话语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指导是推动改革开放进程的重要力量。但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始终关注与强调的问题,是人才队伍建设背后的思想路线与思想作风问题:“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人才断层,使迅速选拔一大群年轻有为的干部担任改革开放的急先锋成为工作中最迫切的问题;但原有的老干部及“文化大革命”时期提拔的干部,除非是明确定性为“三种人”^③而不被任用,否则也不能轻易免职或调离岗位。于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时常会发生争议与争执,其动因也往往根源于此:除了基本的利益冲突外,对“社会主义”本身及其实现方式的理解成为双方时常争执的领域,同时引发的对执政党自身历史、性质、任务以及作风的理解差异,是改革开放建设发展中反复争论的思想内容。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延安”记忆的一系列思想资源进入干部选拔和干部队伍培养的视野之中。

早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第二次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时,邓小平就已经把选人用人作为恢复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的重要前提。而用何种标准对选拔的人才进行筛选,邓小平使用了“延安整风”记忆及作为思想资源和衡量标准。这一

① 《胡耀邦文选》,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69页。

②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04页。

③ 1982年7月3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次提出:“在提拔中青年干部时,必须对‘三种人’保持警惕,决不能提拔造反派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对这些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必须坚决撤下来。”1982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开始清理“三种人”。

时期的工作用意主要指向两方面：一是要消除“派性”，杜绝“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打砸抢”违法行为；二是要打破“山头”，凝聚力量重整经济社会秩序，推动生产力的恢复发展。1975年1月25日，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指出，“长征到了陕北，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全军提出要克服山头主义倾向。经过延安整风，反对宗派主义，全党达到了新的团结。这是我们打胜抗日战争、打胜解放战争的根本保证”^①。而同年7月4日，在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的讲话中，邓小平又再次强调：“大家读了好多书，要好好地读延安整风时的文件……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同志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报告。那时是整顿三风：一是整顿学风，反对主观主义；二是整顿党风，反对宗派主义；三是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这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提出来的。在这一系列党的原则中，反对宗派主义，也就是反对派性，增强党性，是很重要的一条。‘三要三不要’中讲团结，反对分裂，与延安整风时反对宗派主义是一个精神。党员要按照党的章程办事，遵守党的纪律，不能搞宗派主义，树山头、垒山头，或者站到这个山头、那个山头。如果这样，党就分裂了，就没有战斗力了。延安整风就是解决这些问题，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把全党团结起来。没有那次整风，打败日本侵略者，打败蒋介石，是不可能的。”^②

针对军队是当时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邓小平特别反复重申“延安经验”的启示与意义：“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号召反对宗派主义，解决全党和各个地区特别是军队里的山头主义。经过整风，从一九四一年算起，差不多三四年时间就解决了。整风后，不管是军队干部，还是地方干部，拧成一股劲，力量多大呀！所以把仗打胜了。”^③从其讲话中不难发现，宗派主义、山头主义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党的组织体制被破坏所产生的严重作风问题，而援引延安整风的经验及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的系列讲话作为依据，恰恰是树立重整秩序的合理性与权威性。

邓小平始终把选人用人、恢复党内优良作风与强调“延安”实事求是的思想资源紧密联系在一起。1977年7月17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7月21日，他在全会上发言时强调，“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他的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延安整风时期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正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中建立了完整的建党学说，并且用这个学说来教育我们全党、全军和人民，使我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页。

们建立了这么一个好的党，所以才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①。重新唤醒干部们的“延安记忆”与大力提倡“延安作风”，是邓小平推动“文化大革命”后重整社会秩序和调整人事布局的重要思路，也是在之后推动党的建设正常化、体系化、法制化的重要思想基础。

全会结束后第二天，邓小平对反映天津市揭批“四人帮”情况的报告做出的批示就与干部队伍有关：“我听到不少反映，天津的问题不小，揭批‘四人帮’基本未动，问题是在市委主要负责人身上，我建议议一下。”而同年7月26日在审阅要求党中央“把总后机关领导调整好”的信时，他也做出了“后勤问题复杂，不解决不行了”的表态。^②伴随着工作的展开，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与揭批“四人帮”、统一思想认识的矛盾也越发明显，针对北京市公安局政治保卫二处部分干警的来信、北京大学部分教师的来信中提出的问题，邓小平认为问题已经存在于北京市委层面，决定“商同市委重新配备干部”^③。

在进行人事调整的同时，选拔和培养年轻干部刻不容缓。1979年6月26日，邓小平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四川代表团讨论会上指出：“现在要培养接班人，要在我们这些人还在的时候，就是这些受过苦难、经过革命战争、有经验的人还在的时候，找年轻的、合格的、不搞派性的人，尽早培养……现在就要研究，要从调查研究着手，必须坚决解决。这是个根本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④而同年7月21日，邓小平在上海同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彭冲、严佑民、王一平、钟民、赵行志、夏征农等谈话时再次强调，“大问题是接班问题，任何地方、任何部门都有这个问题。现在就要有意识地选一些比较年轻的人，这是党的战略任务、根本任务。从现在着手，三年内的任务是选好几、二、三把手。选四五十岁的、身体好的、能坚持八小时工作的。现在老同志要注意，要任人唯贤，选真正好的，不能论资排辈。这个基本建设非常重要，不要拖延。讲解放思想，这是最大的解放思想。如果说，三中全会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这次就是解决组织路线问题”^⑤。

但无论是人事调整还是培养选拔新人，邓小平都将思想问题放在第一位：“现在的问题是，在一部分干部中，一种是崇拜西方世界，反对‘四个坚持’；一种是利用毛主席旗帜，坚持‘两个凡是’。这个问题是大量的，不搞清楚，是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3～164、165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编（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5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37页。

非就搞不清楚。思想路线不解决，政治路线是搞不清楚的，必然是摇摇晃晃的。”^① 1979年7月28日，在青岛听取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汇报工作时，邓小平又强调：“要从上到下有意识地选一些比较年轻的人、真正坚持我们现在政治路线的人、正派的人、党性强的人。”^② 次日，他在青岛接见出席海军常委扩大会议全体人员时具体解释了什么叫“正派”和“党性强”：“我们现在对于人们的思想状况、政治状况比较清楚，能够看出来哪些人是拥护党的路线的，哪些人是不搞派性、讲党性的。党性也包括联系群众、艰苦朴素、实事求是等等。选干部，标准有好多条，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③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1979年9月5日至10月7日，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把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培养选拔中青年领导干部、改革干部制度作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④。

打击派性、树立党性，是当时选人用人中最为核心的问题。记者胡国华在调查中发现，对批极左不满的干部中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一种是林彪、‘四人帮’帮派体系中的人，极左路线的直接受惠者和忠实拥护者。他们对批极左抱有敌意，肆意夸大批极左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非主流和非本质现象，上纲上线，淆乱人心，极力阻挠人民群众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极左路线的进一步声讨和清算。这种人数量很少但能量很大，是兴风作浪，唯恐天下不乱的中坚分子。”^⑤ 所以，1982年1月13日陈云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各地选拔中青年干部情况的材料上批示：“提拔中青年干部必须注意德。有才缺德的人，一个也不能提拔。”^⑥ 在9月23日同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王震谈话时又强调：“选干部，首先要看德，有才缺德的人不能用。德好，才差一些不要紧，放到领导岗位上锻炼几年，才干是可以练出来的。”^⑦ 他特别注意不能提拔“三种人”“五种人”，即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以及那些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路线的人和有各种严重违法乱纪行为的人。^⑧ 所以，选对用好青年干部，不仅要在考察、提拔的过程中严格把关，同时在持续的培养过程中也要重视唤醒革命记忆、继承革命传统、沿袭良好作风。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编（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0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编（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1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编（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3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53页。

⑤ 胡国华：《中国纪事》，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98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98～499页。

⑧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99页。

1982年4月24日,胡耀邦同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谈话时就指出:“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搞得好的是红军时期、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①要通过制度建设与思想教育双管齐下,重新唤起党员对初心信仰、党风党纪的记忆与追求,进而树立严明的纪律意识和严谨的作风作为,继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先锋作用。

1983年11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时便指出,“延安时期我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建党思想非常好,但是没有形成一套制度。这样的问题还很多。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开始总结经验,注意制度改革,废除终身制,注意革命的连续性和后继有人等问题”^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逐渐进入制度化、体系化的过程中,党的建设系统化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任务。2005年1月14日,胡锦涛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指出:“抗日战争时期,针对当时的形势、任务及党员队伍状况,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党的建设这一‘伟大的工程’,强调为了中国革命胜利,必须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③2012年1月9日,胡锦涛在中共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再次强调:“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保持纯洁性。早在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提出,要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就要有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④通过自我批评、组织教育、法规完善等手段,中国共产党不断朝着坚守初心与增强执政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政党奋勇前进。

四、结语

哈布瓦赫在研究集体记忆的问题时指出:“只要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历史事实渗透进入了这种记忆(笔者注:即集体记忆),就会被转译成一种教义、一种观念,或一种符号,并获得一种意义,成为社会观念系统中的一个要素。”^⑤而康纳顿在研究“群体记忆”问题时发现:“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有关过去的知识。我们在一个与过去的事件和事物有因果联系的脉络中体验现在的世界……可以说,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大多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了解;我们有关过去的形象,通常服务于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性。”^⑥换言之,对过往

① 《胡耀邦文选》,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06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编(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83页。

③ 《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65页。

④ 《胡锦涛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77页。

⑤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2页。

⑥ [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革命形象和成功经验的强调，根本目的依然在于为当下的社会主义建设打牢合理和正确的基础。

改革开放是一项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具有开拓性的事业：一方面需要整肃“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各种歪风邪气，另一方面又需要重扬和树立党的优良传统与优良作风，而且在百废待兴的改革开放初期，既不能无所作为，亦不可另起炉灶。所以党和国家领导人以高度的政治智慧，通过适当地运用“延安”这一政治记忆与修辞语言，为重新倡导实事求是的作风、艰苦奋斗的品格和从严治党的体制建设，提供了具有高度说服力和广泛接受度的集体记忆。通过对“延安”斗争经历和奋斗经验的重新强调，也为后来正确认识毛泽东的历史贡献、树立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指导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① 2020年1月8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苦功夫，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在深化认识中提高认识，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②。由此可见，不仅在改革开放初期，而且在努力追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关注革命目标和奋斗目的的初心与动力来源，不断从历史记忆和历史资源中觅得力量，不断前行。

“Yan'an” as Political Memory and Rhetoric: “Yan'an” Discourse and Party Building in the Early Reform and Opening Period

Wu Yu

Abstract: In the earl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Yan'an” was repeatedly mentioned in the leaders’ talks and speeches as a symbol and mark of good demeanour, hard work and great victory. In the face of the enormous challenges of re-establishing the

^① 习近平：《党史国史这门课必须修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6月27日。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00～301页。

ideological line, establishing the style of hard work and strict governance of the Party under the task of pioneering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Yan'an, as a successful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 and collective memory, has laid a solid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solving the ideological and organizational challenges at the begin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Keywords: Reform and Opening Up; Yan'an Discourse; Political Memory; Rhetorical Discourse

[责任编辑:靳贺]

李大钊“第三新文明”思想的生成 及其历史贡献

王 伟 邵明众*

【摘 要】在中华文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过程中，李大钊立足“中国向何处去”的现实需要和“救世界之危机”的使命担当，率先提出“第三新文明”思想，打破了此前“向西方学习”的思维范式和路径依赖；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追寻的社会主义实践为“第三新文明”提供了现实蓝图，跨越“卡夫丁峡谷”、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中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必然；在探索“第三新文明”的过程中，李大钊高扬文化自信立场，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将其同中国具体国情和民族文化相结合，确立了社会主义新文明的发展方向，探索了建设社会主义新文明的具体途径，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李大钊；“第三新文明”；社会主义；历史贡献

中华民族在五千余年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传承不息、灿若星河的中华文明。近代以来，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性文明逐步兴起，开始冲击宰制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其他古老文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①如何在应对挑战中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转型，创造属于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不仅成为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所面临的时代主题，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懈追求的奋斗目标。回顾百余年党史，李大钊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探索和诠释颇具奠基之义。在探寻中华文明前进道路的过程中，李大钊立足“中国向何处去”的现实思考，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固

* 王伟，历史学博士，中共湖北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湖北红安干部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邵明众，广东省团校（广东青年政治学院）团史馆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77页。

有的精神理念、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充分吸纳其他文明形态的优秀成果，以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开放超越的理论视野和“救世界之危机”的使命担当，率先提出了“第三新文明”思想。李大钊提出的“第三新文明”思想，帮助中华民族跳出与冲破了资本主义文明发展范式的思想窠臼和桎梏，确定了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新理想。在此基础上，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汲取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同时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民族文化，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新文明理想向现实转化的具体途径，为中华民族探索出一条新的文明发展道路。

一、“第三新文明”的历史缘起与理想起点

自工业革命之后，以英国为代表的欧美各国陆续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初步建立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其他地区和民族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随着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的逐渐落伍，“西方中心论”开始成为西方各界的共识。他们自诩西方文明为“普世文明”，认为全人类都应该向西方靠拢，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甚至认为向落后地区和民族推广西方文明是西方人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美国历史学家海斯等人在列举了欧洲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方面取得的诸多成就后，得意扬扬地宣布欧洲白种人不仅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还是“普世文明”的推广者和普及者：“自伯里克利与恺撒的时代直至目前，历史上伟大戏剧里的主角都是由欧洲的白种人担当……15世纪开始，欧洲诸国就一点一点地将它们的文明间接传往世界各地。”^①他们还以“救世主”的口吻宣称，欧洲白色人种对黄色、棕色和黑色等非白色人种负有天生的教导责任，这些人种必须在欧洲白种人的领导下才能实现文明和进步。“西方中心论”作为西方列强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而制造出来的自我认知和舆论宣传，本质上是一种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理论。但在“欧风美雨驰而东”的历史浪潮下，中华民族为了实现救亡图存的时代任务，“向西方学习”成为特定历史时期无法摆脱的思维范式和路径依赖。

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过程中，中国向西方学习呈现出由外向内、由浅入深的递进模式。在经过对西方器物 and 制度层面的认知和实践后，中国先进群体进入学习西方的第三阶段——“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②。五四之前，中国知识界普遍把思想文化的进步视为社会进步的根本和基础，“精神救国”“心的进化”“人格觉悟”“伦理觉悟”等词汇也成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所热议的话题。为了尽快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在文化领域十分盛行，

① [美] 海斯、[美] 穆恩、[美] 韦兰：《全球通史》（下），王颖译，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98 页。

② 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11 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405 页。

在“打倒孔家店”“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再造文明”等思想旗帜下，彻底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化、全面拥抱西方文明被视为救亡图存的必经之路，成为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普遍心理倾向。

随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穷尽人力和物力相互厮杀，惨绝人寰的历史悲剧让无数欧洲人悲痛欲绝，他们对自己的文明和前途感到怀疑、绝望和迷茫，“西方没落”“上帝已死”的悲观论调在欧洲甚嚣尘上。1918年7月欧战结束前夕，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出版了他的成名之作《西方的没落》。斯宾格勒认为，“西方中心论”是一种盲目的自大，欧洲模式绝不是所有国家或民族的必然模式，而只是诸多模式中的一种。每种文化同生物体一样，都是有血有肉但又不尽相同的“超级有机体”，都无法逃避生老病死的客观规律。“每一个文化都要经过如同个体的人那样的生命阶段，每一个文化皆有其孩提、青年、壮年与老年时期。”^①《西方的没落》出版后就立刻引发热议，越来越多的西方有识之士开始正视世界文明的多元性和互补性，杜威、罗素、杜里舒等人也先后访华，并在演讲中发表批判“西方中心论”和赞扬中华文化的言论，极力倡导中西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尽管世界文明的对话交融绝不是一帆风顺的事情，彻底消除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敌意与隔阂也面临诸多的难题，但这毕竟是大势所趋。这对战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中国的掠夺和控制，中国人终于可以用相对独立超然的眼光来审视这场在遥远欧洲发生的世界大战，关于西方文明的讨论也越发激烈。欧战爆发后不久，《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就连续刊发了《大战争与中国》《大战争之所感》等文章，对欧洲列强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给予猛烈抨击：“世界主义，博爱主义，虽为基督教之标帜，而其国民之里面，则褊狭之民族主义，桀傲之帝国主义，固结而不可解。以民族之夸负心，酿成民族战争，同一白色人种之间，犹演出如此之惨剧。吾侪黄人，能勿悚然惧而憬然悟欤？”^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梁启超、丁文江等七人共同赴欧，在先后游历了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等欧洲诸国后，梁启超对中国传统社会及文化的悲观情绪一扫而光，主张每一个中国人都要有“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③。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不仅用他触目惊心的文字为国人介绍了战后欧洲哀鸿遍野的凄惨场景和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所引发的社会危机，而且郑重地向国人宣告西方“物质万能”和“科学万能”的迷梦已经破灭。他还用略带嘲讽的口气批评了中国文化界的“科学派”和“西化派”，认为科学的成功虽然带来了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但这些财富并没有为人类带来预

① [德]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1卷，吴琼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04～105页。

② 周月峰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杜亚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9页。

③ 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0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5页。

料中的幸福和快乐,梦想中的黄金世界非但没有降临,反而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杀戮和灾难,这也成为欧洲思想界自我反思的关键契机。李大钊也指出:“然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因而对于他人之批评虚心坦怀以倾听之者亦较多。”^①

一般来说,后发国家向先进国家学习现代化的模式和经验是不可避免的,也确实有一些国家通过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实现了国家富强。而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上,“几乎对西方出现过的各种现代化模式都进行过快速的试选择”^②,但这些努力无一例外都失败了。当中华民族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再一次面临“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历史困境时,越来越多的国人对中国的前途命运感到悲观、失望和惶恐。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独辟蹊径,在深刻把握人类文明发展趋势和内在规律的基础上,以前所未有的时代高度和理论勇气,旗帜鲜明地提出“第三新文明”的主张,为中华民族探索出一条新的救亡之路,具有打破历史局限性的划时代意义。

首先,“第三新文明”是不断革新的。李大钊认为,人类社会绝不存在永恒不变、尽善尽美的文明形态,人类进步的最显著标志就是文明的新陈代谢。早在1916年,李大钊就明确指出:“第三者,理想之境,复活之境,日新之境,向上之境,中庸之境,独立之境也。第一文明偏于灵;第二文明偏于肉;吾宁欢迎‘第三’之文明。盖‘第三’之文明,乃灵肉一致之文明,理想之文明,向上之文明也。”^③此时,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与以德奥为首的同盟国在欧洲大陆上激战正酣,国内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陈独秀、胡适等人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定义为平等自由与军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若法兰西人,其执戈而为平等博爱自由战者,盖十人而八九也”^④。梁漱溟、章士钊等人则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让西方文明的残酷和堕落暴露无遗,中国未来决不能重蹈西方国家的覆辙,复兴本国固有文明必将成为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⑤。而李大钊的“第三新文明”思想跳出复古和西化的思维定式,打破二元对立的历史藩篱,主张在东西文明融汇的基础上,以不断革新的历史主动精神,不断创造出崭新的文明形态。

其次,“第三新文明”是兼容并包、面向全人类的。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种种方案和举措最初多是以西方文明为范式,直至五四运动爆发之前,绝大多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都抱有相当程度的热爱和信任,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本症结并不是帝国主义的入侵造成的,落后愚昧的传统文化和封建礼教才是中国积

① 《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6页。

②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60页。

③ 《李大钊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0页。

④ 《陈独秀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页。

⑤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20页。

贫积弱的根源。他们把全盘西化视为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甚至寄希望于通过欧美等国的帮助解决中国内外问题。这种被动应对、机械模仿局面的形成，固然是当时世界格局西升东落的客观反映，但也暴露出缺乏包容胸怀和世界视野的弊端。李大钊明确指出，“第三新文明”是灵与肉相一致、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精神与物质相协调的文明，是充满朝气和活力，能够兼容并传承传统东洋、西洋文明的优秀成果而又超越传统文明的新型文明。“第三新文明”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而且也是拯救世界文明危机、为全人类创造新文明的必由之路。正如李大钊所言：“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①

最后，“第三新文明”是独立自主、自觉自信的。1916年年初，李大钊从日本回国后，曾撰写发表《〈晨钟〉之使命》《青春》《新中华民族主义》《大亚细亚主义》等文章，提出“青春中华之创造”“青春中国之再生”“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青春中华之再生”“中华民族之复活”等主张。在他看来，中华民族要想复兴，绝不能过于依赖服从外部环境、照搬照抄西方文明，要以独立自主的态度不断探索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新文明。“太上创造，其次改造，其次顺应而已矣。国家之存立，何莫不然。”^②李大钊对中华文明有着高度的自觉和强烈的自信。他认为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两者都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号召国人“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③，以前所未有的理想觉悟和使命担当，努力完成“创造新文明，改建新国家，俾存立于世界，与西洋之文明之民族相对立”^④的复兴大业。

二、从理想到现实：李大钊对“第三新文明”的艰辛探索

在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关于文明的哲学沉思更多地展开于对人类历史的思考之中。他坚信人类历史就是不断扬弃旧文明、创造新文明的过程，但关于“第三新文明”的认识仍然是模糊的、朦胧的，只是提出调和中西文明以创造新文明的观点。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为困惑许久的李大钊提供了“第三新文明”的现实蓝图。就这样，李大钊将“第三新文明”的理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认为中华民族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

① 《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1页。

② 《李大钊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86页。

③ 《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31页。

④ 《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5页。

（一）寻找“第三新文明”的初步尝试

李大钊所提出的“第三新文明”，其初衷是对中华民族和人类未来道路的乐观态度和美好展望，带有一定程度的理想主义和浪漫色彩。至于“第三新文明”到底是什么样的新文明，人类又该如何实现这样的新文明，李大钊自己也承认对此并没有清晰明确的认知：“顾‘第三’者，有其理想而无其实境。”^①随后，在东西文化论战中，李大钊对“第三新文明”有了初步的构想。与当时关于中西方文明性质和特点的流行观点相似，此时的李大钊把人类文明分为两个阶段和两种性质的文明，认为东方文明是人类第一阶段的文明，西方文明则是人类第二阶段的文明，还用精神和物质、灵与肉、静与动等标准来区分东西方文明。在李大钊看来，人类的“第三新文明”必然是兼具两种性质的文明，调和东西文明则是人类通往新文明的进步阶梯。李大钊关于东西方文明的比较，涉及生产生活方式、衣食住行、政治、哲学、宗教、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多个方面，试图从根本上揭示二者之间的差异，进而以调和的方法取长补短，为创造“第三新文明”奠定基础。李大钊非常看重调和的作用，认为“背调和之道以行者，随处皆是死路也”^②，主张在调和中巩固培植新文明、新生活的地位和势力，不断取代旧文明、旧生活，直至新旧合一，“其打破之方术，在固新文明、新生活之地位，以与旧文明、旧生活分对等之势力，而深养其锋，以迫旧文明、旧生活与新文明、新生活相妥协、相调和，否则征服之而已矣”^③。但是他也明确指出，中华文明现在需要努力的方向，“惟在如何以吸收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出全力以研究西洋之文明，以迎受西洋之学说”^④。

那么，人类的“第三新文明”将在哪里诞生？李大钊依据孟德斯鸠等人提出“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俄国在地理上横跨亚欧大陆，兼具东西方两大文明的特质，是调和两大文明进而诞生“第三新文明”的理想之地。而十月革命的成功，恰恰印证了李大钊关于“第三新文明”的设想。一种科学的、崭新的和具体的社会理想也即将进入李大钊的视野。

（二）社会主义的新理想

在李大钊看来，“第三新文明”不仅是人类的未来的理想文明，也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所在。但他依据“地理环境决定论”将俄国视为“第三新文明”诞生地的论断，仍然存在简单化、绝对化和形式主义的倾向。随着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战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流行，社会主义作为“第三新文明”的一

① 《李大钊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0页。

② 《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6页。

③ 《李大钊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18页。

④ 《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7页。

种系统化、理论化和具体化的实践路径，自然受到了李大钊的关注和追捧。就这样，李大钊关于“第三新文明”的理想开始与社会主义相汇合。基于“向西方学习”和社会进化的文化观念，包括李大钊在内的很多知识分子坚信，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的内涵和主张不仅契合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改造不良社会的现实诉求，而且满足了他们追求公平公正、大同理想的传统心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匈牙利、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都爆发过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或社会主义改良运动，这无疑又强化了李大钊等早期共产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正因为如此，在新文化运动中已经广为流布的社会主义思潮，在五四运动后更是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冯自由用“万马奔腾之势”来形容五四时期知识界热烈追捧社会主义思潮的壮观景象，认为这些思潮唤醒了沉睡的国人，睡眼惺忪的不能不跟着一路走。^①尤其是1920年《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被中国新闻界广泛登载后，各界人士都竞相表达对这份宣言的好感和认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已是大势所趋。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社会主义”内容庞杂，众说纷纭，除去今天耳熟能详、几乎人人皆知的科学社会主义外，还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工团主义、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等。而这些“社会主义”又可以作进一步的细分，如无政府主义又可以分为个人无政府主义、团体无政府主义、社会无政府主义、工团无政府主义等。就连瞿秋白也承认，那时的他对于眼花缭乱的社会主义思潮莫衷一是，还用“隔着纱窗看晓雾”^②形容自己对社会社会主义思潮的体悟。尽管当时的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追求，但依据其根本理论的不同，基本可以划分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长期以来，在中国社会主义传播史研究中，基于非此即彼的思维，空想社会主义被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认为这些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极大地干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事实上，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所憧憬的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等社会理想与共产主义理想是相似的，也可以作为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锐利武器。部分民主主义者借助空想社会主义完成了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李大钊就曾指出：“那互助友谊的精神，不论是科学派、空想派，都拿他来作基础。”^③提倡公平公正、友好互助的道德情感固然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但将其视为社会主义存在的基础，说明李大钊对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还缺乏科学的认识。

理论上的空想性质也会反映在社会实践中，正因为如此，李大钊对工读互助团、新村运动等空想社会主义的试验活动给予了大力支持。随着李大钊对唯物史

① 参见杨奎松、董士伟：《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页。

②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③ 《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页。

观的理解不断深化，他对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联系和区别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逐渐脱离了空想的、唯心的性质，是置于科学的、唯物的基础之上。他不仅认识到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空想社会主义是母，科学社会主义是子”^①，还认识到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历史观的区别：空想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摆脱唯心史观的束缚，导致其理论只能流于空想；科学社会主义得到了正确历史观的指导，对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发展规律及其动因有了科学的认识，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他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一文中指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其历史观的不同：空想社会主义迷信精神的力量，认为人类的理性是社会主义必然实现的基础，是理想的历史观；而科学社会主义则以唯物史观为理论依据，正确解释了人类历史变动的必然规律和真正原因。“科学社会主义派，以其根据置在唯物史观之上，依人类历史上发展过程之研究，于其中发见历史必然法则，于此法则之上，主张造成将来之社会（包括经济的历史观，如经济问题不解决，则无希望）。”^②就这样，李大钊终于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社会主义才是“第三新文明”的具体方案。

（三）跨越“卡夫丁峡谷”：社会主义新文明在中国何以可能？

任何国家和民族从接触、理解、接受社会主义并将其运用到现实中，都将经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会面临诸多的不利因素和阻力。为了帮助落后国家和民族选择更为适宜的发展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光辉设想，认为落后国家和民族不一定必须选择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是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而避开资本主义道路所造成的矛盾和灾难。十月革命爆发后，苏俄先于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国际绝大部分学者、俄国孟什维克的众多理论家，包括普列汉诺夫、苏汉诺夫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坚持认为俄国的生产力还没有达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十月革命的发生是人为“制造的”，在俄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俄国实际，不具备合理性与合法性。这促使列宁撰写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论欧洲联邦口号》《十月革命四周年》《论我国革命》等一系列理论文章为这场社会主义革命发声辩护，揭示其必然性、合理性和历史意义。俄国作为十月革命的策源地都尚且面临诸多困难，要想让遥远的中国正确辨识、理解和接受这场发生在异国他乡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把社会主义和中华文明的前途命运结合起来，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随着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研究的不断深入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成功，他

① 《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7页。

② 《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7页。

已经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不可动摇的历史规律：“无论人愿要他不愿要他，他是运命的必然的出现，这是历史的命令。”^①但是，要想让当时文化水平落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民群众彻底理解和接受社会主义，却绝非易事。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社会上关于苏俄社会主义是否适应中国的争论此起彼伏。有的认为以十月革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革命不具备普适性，就算共产主义可以在俄国取得成功，却并不意味着在中国也可以取得成功。有的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原典中阐述的社会发展理论，认为中国社会缺乏推行“俄式革命”的物质条件、阶级基础和外部环境，根本无法推行“俄式革命”。如张东荪认为，中国社会混乱，实业落后，劳动阶级力量薄弱，帝国主义势力虎视眈眈，如果强制通过革命的方式推行社会主义，只会成为徒有虚名的“伪劳农革命”，“不过在已过的许多内乱上，再添一个内乱罢了”。^②这些争论的中心问题，就是资本主义极度不发达、缺乏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中国，能否直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模式。毕竟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国家行列，有了一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当时的李大钊虽然并不清楚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关于“卡夫丁峡谷”的相关理论，但他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实情作了初步的研究分析，论证了社会主义道路是当时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选择。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一文中，李大钊明确指出，中国是否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不应该只从中国内部的经济情况出发，还必须考虑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世界所面临的经济情况。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势力遍布全球，中国也没有摆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束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封建军阀势力与帝国主义势力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思想教育等诸多方面压榨中国人民，民族资本的发展举步维艰，要想通过资本主义的方式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而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根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中国虽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而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苦痛。”^③李大钊基于对时代潮流和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把握，认为中国要想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就不能亦步亦趋地照搬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否则只能永远屈居人后。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发展生产力，迎头赶上世界的发展潮流，就必须铲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制度，由无产阶级组织领导政府，按照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来发展实业，进而完成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所以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

① 《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08页。

② 左玉河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东荪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4页。

③ 《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9页。

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①

三、李大钊“第三新文明”思想的历史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② 伴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五四运动的爆发，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引和苏俄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启示下，逐步克服了其早期文化观的缺陷和不足，“第三新文明”思想终于实现了从理想到现实的伟大飞跃。在此基础上，李大钊高扬中华文化自信立场，确立了社会主义新文明的发展方向，找到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国情、民族文化相结合的方法论，初步探索了建设社会主义新文明的具体途径。

（一）高扬文化自信立场，凝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信念根基

文化作为文明形态的内核，赋予其根基、价值和目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对中华民族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形成、积淀和演变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是中华民族得以延续传承、发展壮大的“根”和“魂”。新文化运动中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为了尽快扫除传统文化千年不变的自我发展定式，打破国人“华贵夷贱”的文化优越主义，主张在彻底清算和否定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以西方文化为思想观念和文化精神启迪民众，重新塑造国民的文化心理、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进而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新文化运动对本国文化缺乏理性和感情的全面否定，遭到了杜亚泉、梁启超、张东荪、辜鸿铭、章士钊等人的激烈反对。双方围绕中西方文化的内涵、异同、优劣及中华文明的未来，开展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论战。杜亚泉等人强调文化的民族性，认为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是横跨东西、超越古今的永恒存在。而胡适等人则反复强调文化的时代性，认为中华传统文化过于保守和落后，主张全盘西化。二者之间的巨大鸿沟造成了当时知识界文化价值观的断裂。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人物，李大钊曾对中华传统文化开展过系统性的审视和评判。李大钊认为，中华民族自诞生以来，历经五千余年的奋斗、积累和传承，形成了体系完备、内容丰富、繁花似锦、举世罕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足以让国人之为之自豪、崇奉，“典章制度，德礼政刑，历数千祀，足示吾人以崇奉

① 《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60页。

②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6页。

之则者，繁缛彪炳，美矣备矣”^①。在此基础上，李大钊继续指出，中华传统文化是封建农业经济的产物，部分内容确实已经落后于时代；而西方近代文化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的产物，中华传统文化未来发展的首要任务就是充分“迎受”西方近代文化中的先进因子，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但是，中华传统文化亦有自己的特性和价值，实现文化的现代转型绝不意味着全盘西化，而是立足于民族的立场主动迎接时代的挑战，在交流和比较中充分认识到“中西古今”文化的价值，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变‘人’之文明为‘我’之文明”^②，以主体的姿态创造出一种兼具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第三新文明”，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他还在多个场合明确指出，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民族特性，这不仅造就了各个民族的历史，也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传统，必将为未来的新文明建设提供丰厚的文化养料、正确的价值规范、高度的文化自信和坚实的信念根基。

（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确立了社会主义新文明的发展方向

李大钊“第三新文明”思想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破旧”，更在于“立新”。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关于中华文明何去何从的争论也愈发激烈。但是，由于缺少科学的思想指导，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只能局限在文明的表层结构和外在形式，自然无法找到中华文明的拯救之路。早在20世纪初，中国的有识之士就已经认识到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转型势在必行，并由此出现了“中体西用”“西体西用”“中体中用”“中西调和”等多种方案，但无一例外均以失败告终。而李大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引进和研究，突破了唯心主义的理论窠臼，用“物的势力”来分析文化的本质、地位和作用，为探索中国的文化出路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工具，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开始由自发走向自觉。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李大钊以深邃宽广的视野、开放包容的心态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充分吸取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运动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立足于人类历史变迁的宏大语境，诠释了人类文明变迁的普遍规律和根本趋势，创造性地提出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文明的现代化方案，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探索出一条超越之路。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新文明是大同团结和解放的完美统一，是安定有序、全面发展、自由和谐的文明。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了“美感的社会主义”思想，认为社会主义文化是愉悦的、欢快的，可以破除资本主义社会“恶俗的气氛，商贾的倾向”，展现出“纯正的美”。^③他坚信中华文明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那么社会主义之来临，

① 《李大钊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74页。

② 《李大钊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2页。

③ 《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58页。

乃如夜之继日，地球环绕太阳的事实一样确实了”^①。李大钊还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明的过程中，既要以习近平主义为指导，把握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普遍规律，也要对民族经历和文化“加以详密的考察”^②。李大钊的“第三新文明”思想主张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民族文化相结合、相统一，从文化领域率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先河。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③。这足以证明李大钊为中国选择的社会主义新文明道路是正确的、光明的。

（三）探索了建设社会主义新文明的具体途径

李大钊指出，社会主义新文明的建成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要想真正谋求社会主义新文明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并最终开花结果，就必须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进行整体、系统、全面的现代化改造，“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④。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灵肉一致”“物心双面”的文明改造思想，认为中国要想建成社会主义新文明，不仅要开展物质改造运动，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废除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还要开展精神改造的文化运动，以人道主义克服人类在阶级社会中养成的堕落、贪婪和争斗的人心。在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方式问题上，李大钊多次强调进化和革命的辩证统一。为了解释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李大钊将社会主义新文明比喻为鸡子，将腐朽堕落的旧文明比喻为蛋壳，社会主义新文明要想诞生，就必须要以革命的方式打破旧文明的束缚，“卵壳打破，才能产生一个新生命；卵壳打破，才能产生一个新局面”^⑤。但是，李大钊同时也指出，进化是革命得以发生的基础，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是“随着进化的程序自然而然养成的”^⑥。换句话说，要想通过革命来实现文明问题的根本解决，“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⑦。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他敏锐地意识到知识界对社会主义新文明的探求有流于“空谈”的趋势，要求人们“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⑧，探索出“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⑨，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明。

① 《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08页。

② 《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39页。

③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83页。

④ 《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2页。

⑤ 《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6页。

⑥ 《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9页。

⑦ 《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页。

⑧ 《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页。

⑨ 《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8页。

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不仅强调了人民群众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明过程中的主体作用，还特别指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明过程中的领导作用。李大钊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武器，突破了唯意志论和英雄史观的理论和实践局限，准确阐明了文明变迁和人类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指出，人民群众不仅是文明实践的主体，同时也是文明现代转型的决定性力量，并多次强调只有依靠人民群众才能解决中国所面临的文明危机，主张“一切进步只能由联合以图进步的人民造成”^①。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新文明如果离开了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根本无从谈起。而人民群众也要做到自己觉醒，打破束缚自身的铁链，实现自我解放，“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②。但是，民众的主体作用只有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才能实现。李大钊指出，民国以来的政党既没有现代政党的精神，也没有严密的组织和训练，无法充分动员人民群众，这也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转型无法落到实处的重要因素。“这总因为我们团体的训练不充足，不能表现民众的势力，而从事革新的运动。”^③只有组织一个坚固精密、代表劳动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明提供强有力的依托，这也成为李大钊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初衷之一。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④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初，李大钊就对西方文明的优劣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坚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⑤。一战的惨痛教训让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矛盾和历史局限暴露无遗，更加坚定了李大钊的文化自信自强的民族立场，进而提出了调和东西文明以创造“第三新文明”的思想，初步表达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期盼和愿望。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俄的社会主义实践启发了李大钊，使其找到了一条超越资本主义文明范式的崭新道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明，实现“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⑥的历史夙愿，成为李大钊“第三新文明”思想的最终落脚点。考察李大钊“第三新文明”思想的生成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引进和实践，不仅彰显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

① 《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78页。

② 《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92页。

③ 《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0页。

④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6页。

⑤ 《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3页。

⑥ 《李大钊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8页。

兴的初心和使命，也蕴含着为人类谋进步的远大理想和宏阔格局。正如李大钊所言：“我们的目的，在废除人类间的阶级，在灭绝人类间的僭擅。”^①更为重要的是，李大钊在探索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开放包容的主体地位。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的同时，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民族文化相结合，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科学方法论的指引。李大钊的“第三新文明”思想不仅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主动精神，也成为当代中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思想原点之一，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The Generation and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of Li Dazhao's “The Third New Civilization” Thought

Wang Wei Shao Mingzhong

Abstract: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Li Dazhao, based on the realistic needs of “where China is going” and the mission of “saving the crisis of the world”, took the lead in putting forward the idea of “Third New Civilization”, breaking the previous thinking paradigm and path dependence of “learning from the West”;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the socialist practice pursued by Marxism-Leninism provided a realistic blueprint for the “Third new civilization”. Crossing the “Cavdin Canyon” and taking the socialist road became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China’s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ation’s modern civi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the “Third New Civilization”, Li Dazhao raised the position of cultural confidence, advocated Marxism as the guidance, combined with China’s specific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national culture, establishe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new socialist civilization, explored the concrete way to build a new socialist civilization, and had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ation’s modern civilization.

Keywords: Li Dazhao; “The Third New Civilization”; Socialism;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责任编辑：于少青]

^① 《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3页。



文化建设

论文化数字化建设的创新维度^{*}

肖 庆^{**}

【摘 要】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为我国文化数字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机制与模式、数字文化要素的产业化应用和市场化配置，将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夯实数字化根基，为文化建设提供可持续的活力和国际竞争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文化数字化建设要彰显与时俱进、与时偕行的发展特色，永葆创新创造活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新发展理念，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切实维护网络文化安全，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人类。随着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持续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先进技术必将助力展现恢宏文化气象，书写新的时代篇章，向世人展示中华文化独有的精神力量，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征程上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关键词】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化数字化；文化传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离不开文化建设领域的新气象新作为。文化强国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观乎人文”的文化情怀和使命，还需要有“化成天下”的利器与有效路径。纵览人类文明历程，文化的发展总是和科技的进步保持着密切的协同关系，技术的迭代往往意味着文化发展的重大变革。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化数字化建设是铸牢文化发展根基的重要基石，对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从留住文化根脉、守住民族之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战略高度着力推动文化数字化工作，深刻阐述了文化数字化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标准和实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2ZD01）阶段性成果。

^{**} 肖庆，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发展战略、影视文化传播。

的重要意义及其实践路径，为文化数字化的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也勾绘了清晰蓝图。

一、文化数字化建设的发展历程

2020年10月，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①这里明确提出了文化的两个数字化，一是推进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二是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

2021年3月11日，“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②被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作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指导我国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遵循。《纲要》中提出要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壮大数字创意、网络视听、数字出版、数字娱乐、线上演播等产业。《纲要》强调提升公共文化数字化水平，加快文化产业数字化布局，推动科技赋能文化产业。

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融合在一起，统称为“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意见》明确，到‘十四五’时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到2035年，建成物理分布、逻辑关联、快速链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点集成的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中华文化全景呈现，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意见》提出了八项重点任务。一是统筹利用文化领域已建或在建数字化工程和数据库所形成的成果，关联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二是夯实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依托现有有线电视网络设施、广电5G网络和互联互通平台，形成国家文化专网。三是鼓励多元主体依托国家文化专网，共同搭建文化数据服务平台。四是鼓励和支持各类文化机构接入国家文化专网，利用文化数据服务平台，探索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五是发展数字化文化消费新场景，大力发展线上线下一体化、在线在场相结合的数字化文化新体验。六是统筹推进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和公共文化云建设，增强公共文化数字内容的供给能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七是加快文化产业数字化布局，在文化数据采集、加工、交易、分发、呈现等领域，培育一批新型文化企业，引领文化产业数字化建设方向。八是构建文化数字化治理体系，完善文

^①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7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06页。

化市场综合执法体制，强化文化数据要素市场交易监管。”^①

2022年10月，党中央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②。这在党代会历史上还是首次，标志着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已成为全党共识、全党任务。随着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文化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将发生极大的变化，文化和科技融合从单点走向复合立体化方向，从互联网文化新业态走向复合型数字文化新业态模式，从单纯线上的数字化走向虚拟共生无处不在的数字化。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必将夯实文化建设的数字化根基，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征程上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二、文化数字化建设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意义

在文化数字化建设的发展进程中提出的宏伟蓝图，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数字化创新维度上指明了方向。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的建设，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的机制与模式，数字文化要素的产业化应用和市场化配置，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设施和资源要素储备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新基建”）。2019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③ 2020年，“新基建”首次被纳入政府工作报告。同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强调，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步。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到2025年实现“数字基础设施高效联通，数据资源规模和质量加快提升，数据要素价值有效释放”^④。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已经成为与劳动、资本、土地、知识等相提并论的生产要素，与社会生产和消费息息相关。文化数字化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据要素，数据是文化数字化要素支撑体系得以完善的关键，也是技术

①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人民日报》2022年5月23日。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5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9～20页。

④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人民日报》2023年2月28日。

与文化之间的桥梁。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将彻底激活文化领域的数据，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强大的要素支持。首先，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加速应用，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创设出广阔的数字化应用场景，并在推动数据要素生成、渗透以及功能强化的过程中促进文化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创新，推进“数字+文化”的深度融合。其次，利用数据链接数字文化产品生产、传播、消费等各个环节，形成数据化思维，增强数据的流动性、通畅性，使所有关联数据都有自己的“归宿”，能够为数据的共享、管理、存储创造便利，从而发挥文化数据资源的价值。最后，文化大数据建设促进文化产业数字化，推动流程再造、体系重构、高效协同，使文化产品与服务的供需持续突破时空限制，相关信息的连通性、要素的流动性以及利益主体的互动性被提升到新的高度，从而极大提高了文化治理效率，拓展了治理通道和路径，也使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技术基础更加广博厚实。文化大数据建设是宣传文化战线的“新基建”，是对数据成为生产要素在文化领域的落地，是对“新基建”在文化领域的及时回应，旨在适应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要求，顺应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新趋势。

（二）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机制与模式是真正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强国之路

我国文化繁荣发展的根本宗旨是以人民为主体，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在于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和实现人民文化的共享共创，《意见》把实现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作为到“十四五”时期末国家文化数字化的重要目标。“共享”的主旨包含三方面内涵。首先，惠及民生，具有道德意义。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机制能够加快公共文化的普及性，让高质量的公共文化产品融入百姓生活，让亿万人民在共享文化数字化发展的成果上有获得感。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人民对生活的需要也从原来较为单一的物质追求转变为精神方面的更多需求。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机制通过文化传递的方式满足人民群众精神上的需求，提升群众的精神生活质量，在当代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其次，数据分享对于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技术意义。以数据集中和共享为途径，建设全国一体化的大数据体系，将推进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的协同管理和服务，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最后，合理有效的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机制与模式对于推动建立全球范围内的网络空间互联互通、共享共治也具有重要意义。网络空间是现实社会的虚拟延伸。数字化时代，网络空间已成为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新领域。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机制有利于发挥政府、学校、社会组织、网民等全社会多元网络主体的作用，推动建设基于共建共治共享的网络文

明,形成主流意识形态引领网络文明空间的良好态势,汇聚网络文明成果向上、向善的积极作用,使网络文明与人文价值相统一,营造健康、和谐、绿色、清朗的网络空间。

(三) 数字文化要素的产业化应用和市场化配置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可持续活力和国际竞争力

数字文化产业和数字文化消费已经成为我国最有活力的新增长点之一,这也是在开放竞争环境下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是实现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是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探索文化大数据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应用,是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①,将高质量发展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文化产业发展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推进数字文化要素的产业化应用和市场化配置,提高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对于促进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传统文化产业相比,数字文化产业具有创意性、网络化、个性化等特点,是未来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第一,以传媒、动漫、视频、阅读、游戏、数字音乐、展示、演艺等形态为主的数字文化产业核心产品与服务已成为人民群众文化消费的主要形式,其发展的核心要素是文化内容与科技要素的有机结合,驱动数字文化生产,实现数字文化传播,提供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第二,依托虚拟现实、超高清、5G等新技术、新媒体,以技术创新推动产品创新、模式创新和业态创新,加快传统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培植高质量的市场主体——数字文化企业。高质量的数字文化企业通过聚集发展形成高质量的数字文化产业集群,能更有效地融合创新开发和提供数字文化产业核心产品与服务,从而加强数字文化产品、服务在公共文化空间和文化消费中的运用。第三,互联网平台在国际范围内推出的中华流行文化产品和服务,包括数字文学、数字影视、网络直播、网络游戏、数字演艺、数字展览等各种类型的国际网络流行文化产品正在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感知中国发展、接受中华文化的主流渠道。要用数字文化产品精准、精确、精致地传达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蕴含的内在动力、传统精神和普遍价值,才能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第四,数字文化产业是我国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的新业态、新领域,是建设数字中国、发展数字经济、增强文化自信和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重要载体,是推动社会主义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8页。

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抓手。

三、文化数字化建设的实践路径

文化数字化建设已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在数字化创新维度上的重要抓手。在这一过程中,需要“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人类”^①,不断以文化数字化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数字化建设,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切实维护网络文化安全,进一步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进程中凝心聚力。

(一) 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人类

文化数字化建设所务之本,即坚持以人类共同福祉为根本。推进文化数字化战略,尤其不能忘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文化数字化为了人民,文化数字化成果由人民共享。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的依据,“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②,这是推进文化数字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③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再次提出:“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④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为老百姓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务,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⑤在互联网惠农、信息化促进教育公平、建设智慧城市、构建全国信息资源共享体系等方面满足人民的需求。

(二) 践行新发展理念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⑥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3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都进一步强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

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68页。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48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2~33页。

④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9页。

⑤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⑥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70页。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①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才能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数字化建设代表着新的生产力、新的发展方向，也能够践行新发展理念上先行一步。

在文化数字化建设领域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有着巨大的推动和引领作用。第一，技术创新是数字文化发展的驱动力。技术创新不断推动着文化新陈代谢，吐故纳新，定义着网络世界的游戏规则。每一次技术创新都给文化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第二，网络数字空间是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途径、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平台、人们健康精神文化生活的空间，应当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原则基础上确立主导性，在广泛性的基础上强化先进性，使数字文化这种新的文化形态与文化空间同时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表现形态和发展空间。^②第三，文化数字化建设的绿色发展，体现在安全、健康、可持续。第四，“互联网虽然是无形的，但运用互联网的人们都是有形的，互联网是人类共同家园”^③。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凡益之道，与时偕行。”^④第五，让人民群众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是文化数字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共享的内涵即“要适应人民期待和需求，加快信息化服务普及，降低应用成本，为老百姓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务，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⑤。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指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⑥数字文化是否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能否引领文化发展的潮流和方向，关键取决于是否坚持以人为本，是否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是否最大范围地动员和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

文化数字化建设的主体是人民，每一个网民都是文化数字化建设的筑堤人和受益人，充分调动最广泛的主体的力量，形成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广大网民共同参与的局，创造和丰富更多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数字文化产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页。

② 参见沈壮海：《文化软实力及其价值之轴》，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06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59页。

④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52页。

⑤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8～19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

品,是人民迫切的文化需求。

回首我国文化数字化的发展历程,不论是经济新形态、新业态的产生,还是文化新领域、新载体的出现,无一不体现出人民群众的智慧创造,凝聚着中国人民的开拓精神。“网络极大降低了文化生产和接受的门槛,解放了公众的文化创造力,扩大了公众的文化选择权,促进了文化民主……网络文化最大限度地争取了受众,创作者从受众的反馈、建议中吸取创意。”^①新时代,各种艺术门类互融互通,各种表现形式交叉融合,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催生了文艺形式创新,拓宽了文艺空间,也带来了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正确运用新的技术、新的手段,激发创意灵感、丰富文化内涵、表达思想情感,使文艺创作呈现更有内涵、更有潜力的新境界。”^②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中国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更加呼唤能够反映亿万中国人民精神风貌的文艺作品。只有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文化数字化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能不断推动文化强国建设迈向新高度。

(四) 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我国5G、区块链等技术的深入应用将进一步创新文化传播的新方法新途径,以多重维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底蕴,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和形象传达继续焕发新生机,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展现恢宏文化气象,书写新的时代篇章。中华文化全景呈现是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最终目标,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华文化借助数字化工具实现全民共享的体现。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统筹利用已建或在建数字化工程和数据库所形成的成果,全面梳理中华文化资源,推动文化资源科学分类和规范标识,按照统一标准关联零散的文化资源数据,关联思想理论、文化旅游、文物、新闻出版、电影、广播电视、网络文化文艺等不同领域的文化资源数据,关联文字、音频、视频等不同形态的文化资源数据,关联文化数据源和文化实体,提取具有历史传承价值的中华文化元素、符号和标识,丰富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当代表达,全景式呈现中华文化,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可。

(五) 切实维护网络文化安全

作为国家文化安全的崭新领域,网络文化安全日益成为文化强国战略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环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网络

① 庾祖海:《互联网+文化——发展纪事与观察思考》,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24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325页。

文化安全一直保持着高度的战略清醒，充分认识到“网络和信息安全牵涉到国家和社会稳定，是我们面临的新的综合性挑战”^①，审时度势作出了“各方面齐抓共管，切实维护网络安全”^②的战略部署。2014年2月，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成立，更加彰显了党中央对网络文化安全的高度重视，也为网络文化事业健康发展带来了崭新机遇。“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③《中国互联网20年：网络安全篇》对网络安全是这样定义的：“互联网安全就是互联网上的信息安全，是确保信息网络、信息系统、信息服务安全运行，使信息资源的开发应用达到保密、完整、真实、可用、可控、可溯等要求的过程。”^④网络文化安全事关社会主义文化在互联网空间的独立性、方向性和主导性，对于引导人们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有着不容忽视的重大意义。

《周易·益卦》中“凡益之道，与时偕行”的卦辞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把握时机、与时俱进的智慧，文化强则国运昌。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⑤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深刻总结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为创造新时代新文化指明了前进方向，也提供了根本遵循。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推进与实施是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蕴含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在新征程上，文化数字化建设要彰显与时俱进、与时偕行的发展特色，永葆创新创造活力，立足长远，放眼未来。“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⑥随着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持续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先进技术必将助力展现恢宏文化气象，书写新的时代篇章，向世人展示中华文化独有的精神力量，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征程上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72页。

②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

③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47页。

④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编著：《中国互联网20年：网络安全篇》，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17页。

⑤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0页。

⑥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On the Innovative Dimension of Cultural Digitization Construction

Xiao Qing

Abstract: The proposal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cultural digitization strategy has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ultural digitization.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cultural big data system, the sharing mechanism of cultural digitization achievements and the industrial application and market allocation of digital cultural elements, it will lay a solid digital foundation for socialist cultural power construction and provide sustainable vitality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for cultural construction. On the new journey of the new era, the cultural digitization construction should highlight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maintaining the vitality of innovation and creation, adhering to the people-centered, practicing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effectively maintaining the security of network culture, so that the Internet can better benefit mankind.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the national cultural digitization strategy, advanced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Internet,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lockchain will surely help to show the grand cultural atmosphere, write a new chapter of the times, show the world the unique spiritual power of Chinese culture, and cast a new brilliance of Chinese culture on the journey of promoting the socialist cultural power construction.

Keywords: Socialist Cultural Power; Cultural Digitalizatio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责任编辑: 于少青]

生态纪录片中的中国生态正义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

——基于《共同的家园》叙事分析

王 巍*

【摘 要】 纪录片不仅是时空记忆的载体，也是对外交流的窗口、展示国家形象的平台。2021年，央视播出的生态纪录片《共同的家园》生动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文明成就，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生态治理的历史贡献，传播了中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哲学。《共同的家园》在叙事结构上呈现时空线性结构与交互对照结构并存特点，叙事视角上呈现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缝合”特征，综合运用空间叙事、历史叙事、拟人化叙事、模块化叙事与互文性叙事方式，凸显了通俗化、生活化、诗意化叙事风格，同时通过内嵌于短镜头、特写镜头、远景镜头和慢镜头的视觉符号、“物化”符号与动作符号增强了叙事张力与意义表达，通过多元叙事策略、多重符号意象建构了以分配公平、权利平等和差异秩序为核心的生态正义国家形象。基于传播学视角，可以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路径三个维度着手，进一步增强中国生态正义国家形象的传播效果。

【关键词】 《共同的家园》；叙事策略；符号意象；和谐共生；国家形象

2021年10月，央视播出的《共同的家园》生动诠释了中国主动履行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公约、积极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成就，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生态环境治理的历史贡献，传播了中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哲学。《共同的家园》共分三集——守护、相伴、共利，每集围绕特定主题以多元叙事策略从不同视角阐释中国保护生物多样性实践，从深层次建构了以分配公平、权利平等和差异秩序为核心的生态正义国家形象。《共同的家园》为中国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树立了时代样板。

* 王巍，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

一、叙事策略

《共同的家园》采用多元叙事策略，以多元叙事结构为基础，以交互叙事视角为牵引，以多重叙事方式为支撑，以隐喻叙事符号为载体，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叙事方式、叙事符号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中国生态正义国家形象的建构与生成。

（一）叙事结构

《共同的家园》叙事结构呈现“叠合”色彩，一方面围绕空间实践的历史性延续展开叙事，另一方面围绕空间的历时性对比展开叙事，时空线性结构与交互对照结构并存，总体呈现“二元结构”并立特征。

首先，时空线性结构。《共同的家园》以中国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实践脉络为叙事主线，在时空场景中绘制路线图，在线性叙事中观照价值图景，通过线性历史时空话语勾勒中国守护地球上所有生命形态平等生存和发展权利的空间实践过程。《共同的家园》第一集“守护”的开端说道：“1992年，中国参与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在现代化道路上奋力前进的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一道踏上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之路；两年后，《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第一部自然保护区专门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继出台；五年后，中国陆续启动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七年后，全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工程正式开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实践路线绘制了中国“守护”野生物种生存家园的历史图景，彰显了中国生态正义价值哲学。在《共同的家园》第二集“相伴”中，从2003年“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到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的启动，再到近五年国家公园在12个省份相继建立，以平实的叙事风格、简洁的叙事话语在线性历史时空的展开中勾勒了中国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空间实践轨迹。

其次，交互对照结构。《共同的家园》以生态环境的改善作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交互参照”，生态环境的改善作为“参照”中国保护生物多样性实践的叙事主线，在生态环境的“向好”中“回应”实践历程，以同一地点的不同变化“观照”实践成就，在时空流变中“述说”中国的生态正义实践哲学。《共同的家园》第二集“相伴”中说道：“近十万高原居民告别世代延续的牧猎生活，腾让36.3万平方公里土地，还高原野生动物一个安静的家园”“狼从一度濒危到繁衍兴盛，自然生态的改善使狼和人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彼此相伴，以平等自然的方式实现和谐共处。”中国主动向野生物种让渡“空间权利”，使“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恢复了往日的生机与活力。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改善历程作为“明线”，折射出中国保护高原野生物种实践过程的“暗线”，以同

一地点的历时性变化“观照”实践成就。同样,《共同的家园》第三集“共利”中说道:“云南景东县黄草岭过去水冷箐深收成少,山茅野菜渡秋荒,半年洋芋半年荞,而今林草茂盛、山青水绿、生态秀美、生活富足,村民不再进行竭泽而渔的资源掠夺,而是转向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存哲学,林间穿梭的走地鸡,各种野生菌、药材成为村民多元收入的一部分。”生态场景“历史”与“现实”的交织对比,环境改善与生态实践的交互参照,使主题更突出地被烘托出来。正是在交互对照的叙事结构中宏观价值图景得以建构,生态文明建设意义得以彰显,人一物情感依存得以抒发。

(二) 叙事视角

《共同的家园》将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结合,实现宏大叙事的个体呈现、宏观视角的微观表达与微观视野的宏观观照、个体叙事的宏观书写,赋予了叙事的意义张力,推动了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的意义“缝合”。

在《共同的家园》第一集“守护”中,中国农业科学院杨庆文研究员深入田间地头搜寻野生稻的“寻宝”纪实“勾勒”了中国保护野生稻的叙事主线。叙事哲学并非宏大、抽象的意义演绎,而是通过小切口、微观化的纪实风格,以一种写实、接地气同时略带乡土气息的个人视角呈现,建构了宏观叙事的微观视角,同时也书写了微观叙事的宏观意义。《共同的家园》第一集“守护”中说道:“在湖南茶陵野生稻居群周围一百米内不允许有水稻的出现,避免开花串粉,这里100多亩田不种水稻在这边。”野生稻安全区的“生态留白”以空间规划为实践样式实现了空间资源的再分配,保障着所有物种空间资源的正义分配。同样,在《共同的家园》第二集“相伴”中,通过“寻豹少年”高士清和“猫盟”成员王一晴的个体视角叙写了一段非比寻常的“寻豹之旅”。从对未来太行山脉生态廊道修复的憧憬,到深入和顺村庄探访野豹“踪迹”,再到看见华北豹“掠影”时的喜悦,最后到对华北豹“回归”北京山林的期许,以浪漫主义纪实手法表达了中国“年轻一代”致力于保护生态,召唤野生动物重归相伴的希冀与努力,同时也通过“带豹回家”行动纪实这样的微观切口彰显了太行山华北豹保护区生态链向好,中国尊重与保护野生豹种群生存与繁衍空间权利的宏大意义。以小切口、接地气、通俗化、平实化、生活化的表达实现了“宏大叙事”的意义书写,完成了“宏伟画卷”与“个体素描”的缝合,增强了中国保护生物多样性实践成就的意义张力,也勾勒出中国基于权利平等的生态正义价值图景。

(三) 叙事方式

《共同的家园》综合采用空间叙事、历史叙事、拟人化叙事、模块化叙事、互文性叙事等多重叙事方式建构中国生态正义国家形象,在通俗化、生活化、诗

意化的叙事风格中“回应”主旨、“观照”主题，彰显了中国在生态治理上的大国责任与主动担当。

第一，空间叙事。《共同的家园》通过三重空间叙事书写主题。其一，地理空间叙事。《共同的家园》通过长江流域、三江源、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洞庭湖、崇明东滩、海南东寨港、无量山和哀牢山等特定地理场景中人与物的故事推动叙事进程。其二，话语空间叙事。《共同的家园》通过多种文本技巧推进空间结构的建构，重构空间的社会意义。比如，通过旁白解说和“在场”解说的交融表达曹文宣院士对长江流域鱼类生存空间权利的重视与保护。正是在曹文宣院士团队的推动之下，最终实现长江全面“禁渔”，在人与物故事叙事中建构了人与鱼和谐共生的话语空间，重构了中国“生命共同体”的文化空间，暗含着以人向鱼“让渡”空间权利协调和平衡人与鱼之间的空间权利矛盾以及从人的“主我”权利性转向鱼的“客我”权利性的平等化意指。其三，情感空间叙事。在《共同的家园》中，无论是“饲养员程志斌陪伴麋鹿转运洞庭湖”，还是“管护员巴杰在三江源与狼的期遇”，抑或是“金伟国在崇明东滩与黄脚鹬的‘口语’对话”，都表现了人与动物之间的情感交流，表达了当事人对野生物种的尊重、喜爱与眷恋之情，建构了人与物交互式情感空间，书写了当事人对野生物种的“情感观照”。

第二，历史叙事。《共同的家园》通过在现实空间中的历史回溯与故事演绎，拉近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降低了历史的陌生感。《共同的家园》第一集“守护”中说道：“云南是公认的全球生物多样性重要类群分布最为集中的关键地区，这里拥有的高等植物和原生脊椎动物类型占全国一半以上，是名副其实的动植物王国。”随后画面转到昆明生命科学学院，“这些颜色古旧、摆放整齐的卡片绘制者是吴征镒院士，30000多张卡片几乎记录了所有中国植物的名称、样貌和特点，依托这些卡片，中国历经45年编撰完成了世界上最大型、种类最丰富的植物学巨著《中国植物志》”。在现实场景中，通过嵌入《中国植物志》编撰的历史叙事，让历史与现实在空间中“直接对话”，推动历史与现实的交融，从而消解历史教科书式的简单演绎与刻板讲解的距离感。同样，在长江流域“禁渔”的历史叙事中，《共同的家园》通过逆向时间追溯：“2012年生态战略开始纳入国家战略总体布局，2016年确认长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2017年赤水河全面禁渔，2021年长江禁渔十年。”将历史置于现实的时空场景中增强了文本叙事的历史张力，在历史叙事和现实影像的时空交错中诠释中国对长江鱼群生存与繁衍空间权利的尊重与守护。

第三，拟人化叙事。在关于亚洲野生象群“云南自由行”的叙事中，《共同的家园》说道：“象群品美食、赏美景、游乐园，穿越了熟悉的森林草地溪流，还见识了村庄高楼和公路，一路观光十分惬意。”一幅畅想云南自由行的诗意画面，一段说走就走的免打扰云南自由行，《共同的家园》以一种风趣的拟人化风

格、亲切的人物化表征表达了中国对野生象群迁徙权利的尊重与守护，全面生动彰显了中国乐观、包容、仁爱、自信的大国形象，全景式诠释了中国的“生命权利”平等理念。

第四，模块化叙事。《共同的家园》围绕中国保护生物多样性实践成就分为三集，分别围绕“守护”“相伴”“共利”主题分成若干信息模块，每个信息模块通过不同的故事演绎或通过不同的叙事方式呈现，信息模块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彼此贯穿联系，共同服务于同一主题，从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叙事系统。这种叙事方式不仅能够有效契合受众的收视环境与收视习惯，满足多元化的分众圈层群体特质，也可以构造信息知识资源库，有效发挥生态纪录片的知识传递与文化传播功能。

第五，互文性叙事。《共同的家园》通过与现实相互关联的“话语文本”表达意义，通过现实互文凸显主题。《共同的家园》说道：“每个生命都有非凡独特的魅力，每一个生命都有生存繁衍的权利，地球是所有生命共同的家园。”这与习近平主席2017年5月14日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欢迎宴会上“人类生活在共同的家园，拥有共同的命运”的致辞形成意义关联，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互文参照。

在叙事表达中，《共同的家园》并非简单通过刻板、严肃、冰冷的教科书式讲解阐释中国保护生物多样性实践成就，而是通过平实化的言语、通俗化的叙事、故事性的讲解，拉近与观众的距离，消解文本的疏离感与陌生感，增加黏合度。同时，将文本拉入日常生活之中，抓取日常生活场景，如苗寨王二妹的日常“家宴”、黄草岭村民的日常“赶集”、哈尼族人的日常“农作”等，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场景中用生活性话语呈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彰显生态正义价值旨归。此外，文本叙事也勾勒了一种诗意化语境，如贵州苗寨王二妹穿着民族服饰完成“出场”，在蓝天碧水中“绘制家乡美卷”，配之以诗意的画面和诗意的旁白，表达了乡土的视觉之美与生活之美，也书写了王二妹质朴、自然、率真、纯粹的心灵之美。

（四）叙事符号

《共同的家园》中的视觉符号、“物化”符号与动作符号通过短镜头、特写镜头、远景镜头和慢镜头得到表达，符号的表达进一步增强了叙事张力与意义厚度。

在推进长江全面“禁渔”的叙事文本中，伴随着曹文宣院士团队“沿江调研”所见所闻的过程性书写，蓝天碧水、鸟飞鱼游等和谐化的自然视觉符号映入画面。这种“映入”是通过连续短镜头的剪辑实现的，在旁白讲解的“映衬”下与保护长江生态实践完成了“意义缝合”，在连续蒙太奇的视觉影像中书写主题、彰显意义，在时空叙事和视觉影像的立体化交错中诠释中国对长江鱼群生存

与繁衍空间权利的尊重与守护。

同时,在云南哈尼族人的“梯田农作”场景中,“物化”符号即“水木刻”通过特写镜头呈现具体面貌、形状、大小与摆放位置,近镜头的设置使观众能够直观感受到水木刻的历史沧桑与厚重感,再配之哈尼族人的“在场性”叙述说明功能:“将山间流水从主干渠分配到支渠再分配到每一块梯田,保证高低不同的每户田地都能得到充足的水量。”“物化”符号的嵌入深化了文本叙事的哲学性和主题表达的深刻性,有效回应了“共利”主题,诠释了中国“分水制度”的公平与互助理念,也书写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平衡哲学。

另外,在对云南哈尼族人的日常生活描述中,《共同的家园》说道:“农历八月初,稻谷丰收的日子,哈尼族迎来了传统的新米节。采摘、宰牲、尝新,家家户户祭拜天地,祈求日月永照人间。”通过短镜头和远景镜头呈现的丰收节庆场景和仪式动作符号^①,表达了哈尼族人敬畏天地、敬畏神明、敬畏生命的情感意向,勾画了哈尼族人丰富而饱满的精神世界图景,动作符号的嵌入有效增强与增加了文本叙事的人文张力和意义厚度。此外,在贵州苗寨王二妹“离家远行”的场景中,族人穿着盛装、吹笛起舞的送别仪式动作符号通过慢镜头构造了“去”与“留”的冲突感:一方面,王二妹需要走出大山去上学,面临“身体离别”的现实;另一方面,塞入新打稻米的意象和送别仪式的隐喻完成了“家乡”的“情感归场”。苗寨不仅是王二妹的栖居空间和成长乐园,也是王二妹的“精神家园”和“情感寄托”,在“去”与“留”的冲突感中增强了叙事的张力。

二、中国生态正义国家形象的呈现

《共同的家园》通过多元叙事结构、交互叙事视角、多重叙事方式、多重象征符号增强了叙事的张力,凸显了以分配公平、权利平等和差异秩序为核心的中国生态正义国家形象,全面彰显了中国在生态治理上的历史主动。

(一) 分配公平

空间作为一种有价资源,其分配方式从本质上规定着空间正义价值的实现程度。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空间的资本化和空间的政治化加剧了空间资源分配的非均衡化趋势,空间资源占有的不公平成为社会不平等的现实面向。同时,生态空间被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侵蚀”,生态功能价值被“人类中心主义”和“技术万能论”遮蔽,空间分配的正义性被资本的“正义性”掩盖。中国从生态空间的价值本位出发,对生态空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进行科学布局,以空间规划为表征进行空间资源的再分配,重新回归基于分配公平的空间正

^① 参见王巍:《讲好红色故事》,《思想政治课教学》2023年第1期。

义导向。《共同的家园》生动阐释了中国空间资源再分配的实践逻辑，诠释了中國基于分配公平的生态正义价值理念。从洞庭湖保护区到野生动物救护繁育基地，从扎龙自然保护区到普氏野马繁育驯化基地，从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到三江源国家公园，从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到太行山生态廊道，从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到海南东寨港自然保护区，从生态保护到气候治理，中国摒弃了对自我利益的过度“锚定”和对主体力量的过分“陶醉”，扬弃了物质消费主义的锁闭^①，以科学化的空间规划彰显着空间分配正义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通过严格的制度保护生态环境，通过严密的法治改善生态环境，以依靠制度和法治推进空间资源的再分配为一以贯之的根本逻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党和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党章和宪法，赋予其法律地位。同时，出台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构建起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体制保障。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成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划定工作”^②。红线制度为生态空间资源的合理“留存”提供了刚性保障。此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积极完善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体系，在着眼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合理布局的同时，实现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严格、整体和系统保护。制度性“生态留白”以国家空间规划的实践样式进行空间资源的再分配，保障着空间资源的分配正义，践行着中国式空间正义价值哲学。

（二）权利平等

“地球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家园，珍爱和呵护地球是人类是唯一选择。”^③人因自然而生，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而“此在”，人与自然并不是主客二元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共存、共生、共在关系。人作为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不具有超越其他物种的特殊权利和地位，从而扬弃了人类主体权利过度膨胀的“中心性”和主体权利边界过度扩张的“自为性”，复归人与自然的共同价值基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不仅指涉一种科学的自然观，而且包含一种生命权利的平等意向。《共同的家园》诉说着中国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生存和发展权利的重视，这种重视不仅暗含着中国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空间所有权、使用权和居住权的保障，也包含着以空间资源再分配为表征的“生命权利”平等观意指，诠释了中国基于权利平等的生态正义价值理念。生态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有机统一的整体，《共同的家园》诠释了中国式“自然观”，人与自然是“一体化”存在，自

① 参见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2页。

③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62页。

然并非“外在”于“我”的物化存在,而是内在于“我”的生命存在,是“我”之生命构成,是“我”之生命意义,是“我”之生命延伸,自然与“我”是生命共同体,自然与“我”具有生命同构意义,具有和谐共生指向。

无论是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还是启动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工程,抑或开启全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工程,都在诠释着中国保障地球生命个体平等生存与发展权利的空间实践哲学。此外,无论是华北豹保护区的建立,还是太行山生态廊道的修复,无论是港珠澳大桥为保护中华白海豚进行的“绿色”装配,还是青藏公路货车司机对藏羚羊的“文明礼让”,都在书写着中国尊重与保护野生物种生存与繁衍空间权利的实践哲学,都在彰显着中国式“生命权利”的平等理念。

(三) 差异秩序

差异性的重置与多样性的回归拓展了空间的意义与功能,建构了空间正义价值维度。资本主义的城市化加速了空间的同质化、抽象化与模式化进程,空间的差异性被统一性取代,空间的多样性被同一性阉割,生物的多样空间秩序被人以“扩张性”的身体哲学解构,空间差异性的消弭暗含着生命危机。《共同的家园》阐释了中国的生态治理实践,彰显了中国基于差异秩序的生态正义价值理念。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的资源依赖,是人类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社会安全的重要前提,是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地球是所有生命共同的家园,而生命具有不同的秩序形态,因此,保护生物的多样性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就是守护“差异性的生命秩序形态”,就是守护差异性的“空间秩序”。中国守护差异性“空间秩序”的实践在差异秩序的“物化”符号即“种质资源库”和“生物基因库”中得以表达。从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到国家作物种质库,从中国乡土植物种质资源库到小麦近饱和突变基因库再到中国国家基因库,从生物活体库到数字基因库,《共同的家园》以线性时空展现的“物化”符号构造了中国守护“差异性生命秩序形态”的意义空间,诠释着延续差异生命秩序的美学和基于差异秩序的空间正义价值哲学。在本质上,差异性的重置与回归赋予了空间意义与功能,也建构了生态正义的价值维度。^①

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同心协力,抓紧行动,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②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也是命运共同体,因而我们要同心协力,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去同质化的差异空间承载着生命秩序之美,而生命秩序之美需要人民携手共

^① 参见任政:《空间正义论——正义的重构与空间生产的批判》,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103页。

^②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264页。

护。无论是建设生态廊道还是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无论是推进生物多样性治理还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都是对中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哲学的最生动诠释。

三、增强中国生态正义国家形象传播效果的策略

《共同的家园》彰显了以分配公平、权利平等、差异秩序为核心的中国生态正义国家形象，基于传播学视角，可以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路径三个维度着手，进一步增强中国生态正义国家形象的传播效果。

首先，丰富传播主体。传播主体是国家形象传播的重要依托，在中国生态正义国家形象传播过程中，可以通过情感动员激发普通民众对国家形象传播的内驱动力，围绕平台、内容、技术、场景全要素构建国家形象传播论坛，营造有文化内涵、有人文氛围、有历史气息、有文化故事的国家形象传播场景，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政府传播与口碑传播功能，增强中国生态正义国家形象传播效果。同时，也可以依托社会资本网络构建数字媒体“链接通道”，搭建数字化传播平台，强化与海外大型企业的数字传播合作，推动政府、公民、社会组织、媒体、智库、社会团体、市场主体之间相互协作，构造中国生态正义国家形象传播互关网络。

其次，充实传播内容。传播内容是国家形象传播的中心环节，可以重点围绕中国生态正义国家形象开发具有中国特色和生态韵味的文化产品，构建文创合作项目库，成立文创联盟，同步开发相关文化衍生品，充分挖掘中国生态正义国家形象的内在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提升中国国家形象传播力。同时，聚焦中国生态哲学的历史底蕴和人文内涵，以特定的“符号标识”传播中国以分配公平、权利平等、差异秩序为核心的生态正义观，进一步彰显中国深厚的生态正义文化底蕴，提升中国国家形象魅力。此外，打造以《共同的家园》为核心的系列文化访谈栏目，持续推出反映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历史的宣传报道，促进中国生态故事通俗化解读、生态治理信息及时性发布，助推中国生态文化哲学“释义”，推动中国生态正义国家形象传播全方位覆盖、全天候延伸、全领域拓展。

最后，拓展传播渠道。传播渠道是影响国家形象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可以进一步拓展中国生态正义国家形象的传播渠道，通过“网络+”与“文化+”形式推动国家形象传播。面对当前日益加快的媒介融合化趋势，可以充分结合当前个性化、差异化传播新趋势，打造多媒体融合式国家形象传播“矩阵”，构建立体性、智慧型多媒体国家形象“传播链”，促进中国生态正义国家形象融合式传播，提升国家形象传播效果。可以将中国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荒漠化以及水土流失防治等生态治理活动通过大型官方传媒网站进行在线直播，将民众自发性的生态环境保护行动通过社交媒体直播进行定向“推送”，将中国生态治理的“历史全景”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进行历时性再现，将中国生态正义国家形

象的文化内涵通过议程设置邀请知名学者进行文化释义、文化品鉴、文化解读，将中国生态正义国家形象进行言语性阐释和诗意化塑造并通过个性化文创产品“输出”实现海外推广传播。

四、结语

2021 年 10 月，央视播出的生态纪录片《共同的家园》以纪实手法阐释了中国生态治理的历史进程和实践成就，从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叙事方式、叙事符号四个维度全面建构了以分配公平、权利平等、差异秩序为核心的中国生态正义国家形象，生动诠释了中国式生态文明价值哲学，突出了中国对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贡献。《共同的家园》彰显了中国在生态治理上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凸显了中国的历史主动和行动自觉，但面对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媒介话语权，其生态正义话语依然受到质疑，中国在生态治理上的正义之举仍然面临被“污名化”的现实窘境。因此，中国亟须进一步提升自身的媒介话语权，以生态影片为抓手，以生态话语为载体，以生态实践为依托，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路径层面搭建立体化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矩阵”，讲好“中国生态文明故事”，进一步增强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效果，提升国家形象外向认同度，有效破解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话语构陷和形象阉割。

Construc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China's Eco-Justice National Image in Eco-Documentaries —Narrative Analysis Based on *Our Common Home*

Wang Wei

Abstract: Documentary is not only the carrier of time and space memory, but also the window of extern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platform to show the national image. The ecological documentary *Our Common Home* broadcast by CCTV in 2021 vividly interprets the achievement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ese modernization, shows the world th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of China's ecological governance, and spreads the ecological philosophy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people and nature in China. In terms of narrative structure, *Our Common Home* presents the co-existence of spatial and temporal linear structure and interactive contrast structure. In terms of narrative perspective, it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itching” between macro and micro perspectives. It

integrates spatial narrative, historical narrative, anthropomorphic narrative, modular narrative and intertextuality narrative modes, highlighting the popular, life-oriented and poetic narrative styles. The visual symbols, “materialized” symbols and action symbols embedded in short shots, close-up shots, long shots and slow shots enhance the narrative tension and meaning expression, and construct the ecological justice national image with distribution fairness, equality of rights and difference order as the core through multiple narrative strategies and multiple symbolic imag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 of China’s national image of eco-justice can be further enhanced by starting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communication subject, communication content and communication paths.

Keywords: *Our Common Home*; Narrative Strategy; Symbolic Imag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National Image

[责任编辑:焦佩]

“东方主义”的源头始于《波斯人》否？*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

徐 振 庞楷奕**

【摘 要】美国文学理论家爱德华·W. 萨义德在批判“东方主义”时将源头追溯至古希腊悲剧《波斯人》，他认为《波斯人》奠定了“东方主义”的主题：欧洲是强大的、有自我表达能力的，而亚洲是战败的、遥远的。“东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经济基础在于西方近代的殖民活动。古希腊时代殖民与西方近代殖民活动截然不同：古希腊的殖民是农业殖民，主体是城邦；西方近代殖民是商业殖民和资本主义的扩张，主体是民族国家。萨义德在论证《波斯人》中的“东方主义”主题时，实际上是将形成于西方近代殖民基础上的“东方主义”向前推广到了古代世界，因为古希腊的殖民与西方近代殖民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行为，所以这种推广不符合历史事实。故此，萨义德对《波斯人》的后殖民主义批评超越了“东方主义”产生的前提，突破了其运用的界限，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原则。

【关键词】《波斯人》；东方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1847年，恩格斯在评价歌德的作品时提出了“美学和历史的观点”^①。此后，恩格斯在评价斐迪南·拉萨尔的戏剧《弗兰茨·冯·济金根》时特别提出了“是从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以非常高的亦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②。毋庸置疑，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是评价文艺作品的重要标准，其中“历史的观点”或曰“史学观点”即历史唯物主义，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人文学术研究的重要标准。脱

* 本文系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2019J013）阶段性成果。

** 徐振，文学博士，西安工业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庞楷奕，西安工业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7页。

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原则，学术研究离谬误也就不远。例如，作为后殖民主义批评领域的重要理论家，爱德华·W. 萨义德（Edward W. Said）将形成于古希腊时代的戏剧《波斯人》置于“东方主义”的框架中进行演绎阐释时，他的这种演绎就脱离了“史学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原则，置古希腊殖民与近代殖民之重大历史差异于不顾，将东西方的二元对立视为自古及今的一种话语范式，使古代希腊历史陷入“东方主义”的泥淖之中，以合目的论的方式强制阐释了原本在《波斯人》中并不存在的“东方主义”。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无论何种学术研究，丧失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就意味着谬误形成的开始。

一、《波斯人》与后殖民主义批评

公元前 472 年，埃斯库罗斯的戏剧《波斯人》在雅典上演。这部戏剧作品是古希腊悲剧作品中较为特殊的一部，这部作品的题材来源于“当代历史事件”^①。希腊与波斯战争的导火索是公元前 500 年以米利都城邦为代表的爱奥尼亚地区反抗波斯的统治，在斗争过程中，雅典和爱勒多里亚城邦曾经给予援助，此后波斯便以此为由入侵希腊半岛。公元前 492 年，波斯国王大流士发动对希腊的进攻，船队行经阿多斯海角遭遇风暴，波斯被迫撤军。公元前 490 年，波斯发动第二次远征，波斯海军横渡爱琴海，攻占埃雷特里亚后在马拉松平原登陆。随后爆发马拉松战役，雅典方面以少胜多，获得战役胜利。马拉松战役之后，双方积极备战。公元前 480 年春，大流士之子薛西斯率领海陆大军入侵希腊，为横渡赫勒斯滂海峡，波斯人建造了巨大的浮桥连接欧亚大陆，波斯军队辎重由此进入希腊。在希腊中部的温泉关，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率军与波斯军队鏖战数日直至全部牺牲。温泉关战役为希腊联军主力及舰队在萨拉米海湾集结赢得了时间。公元前 480 年秋，希腊与波斯海军在萨拉米海湾展开决战，萨拉米海湾是萨拉米岛屿与希腊大陆之间形成的狭窄水域，雅典舰队充分利用了地利的优势，以运转自如的小型战舰对战波斯的大型舰队，重创波斯舰队，击沉战舰 300 余艘。薛西斯无心恋战，匆忙撤离希腊，战局因此变化。公元前 479 年，希腊联军在普拉提亚击败波斯陆军，希腊获得第二次希波战争的胜利。

戏剧《波斯人》的上演距离希波战争中的萨拉米海战结束约八年时间，在戏剧演出现场观看戏剧的雅典公民中有不少人曾经亲历那次大战，对八年前的那场决战必定记忆犹新，海上大战的情景如在眼前。埃斯库罗斯在反映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时候别出心裁，他将背景设置在苏萨城的波斯王宫，由波斯信使将波斯军队在萨拉米海湾战败的消息报告给由波斯的长老组成的歌队与王太后阿托萨，

^① James Wyatt Cook,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Literature*, New York: Facts on File, 2008, p. 529.

引发歌队对“波斯的王权已经崩溃”^①的哀叹和阿托萨对薛西斯远征的无尽懊悔。埃斯库罗斯亲身参加过马拉松战役、萨拉米海战和普拉提亚战役，他对雅典城邦的热爱从其墓志铭就可以看出^②，他以曾参加马拉松战役而深感自豪。《波斯人》中波斯信使关于萨拉米海战的记录与未曾经历那次大战的希罗多德的《历史》中记载的希波战争是现存的关于萨拉米海战的两份重要的历史文献。^③波斯海军在前行的过程中听到的远处的呼声——“前进呀，希腊的男儿啊，快解救你们的祖国，解救你们的妻儿子女，解救你们祖先的神殿与坟茔！你们现在为自己的一切努力战斗！”^④——更是被史学家频频征引。

恩格斯认为，埃斯库罗斯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⑤，这种“强烈倾向”是什么？结合恩格斯讲这句话的上下文语境，这种倾向是指政治倾向。在《波斯人》中，这种倾向当是埃斯库罗斯在剧本中借由波斯长老所讲的，雅典人“不做奴隶与臣民”^⑥。按照罗念生先生的判断，这部戏剧作品所讲述的战争是通过描写波斯军队的失败反衬希腊胜利的伟大，诗人借这部戏剧“歌颂抗击波斯侵略的卫国战争”^⑦。

然而，在后殖民主义的逻辑演绎中，这部描写保卫城邦家园的作品被阐释成为“政治不正确”的典范。1978年，哥伦比亚大学学者萨义德完成他的传世名作《东方学》，由此引发了后殖民主义批评的潮流。在萨义德的理论体系中，“东方主义”是一种固化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久已有之，它将东方与西方进行二元对立与区分，这种对立区分则构成西方人认识东方世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之基础。在此种思维方式之下，大量的西方人包括诗人、小说家、政治理论家、帝国的行政官员等都潜在地接受了这种二元对立与区分，他们在进行诗歌小说创作、撰写政治评论的时候都自觉地套用了这种对立区分并以此来建构东方世界。埃斯库罗斯、雨果、但丁、马克思等均未能免俗。^⑧

在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中，波斯代表着东方，对于西方世界的希腊人

① [古希腊]埃斯库罗斯：《埃斯库罗斯悲剧六种》，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7页。

② 埃斯库罗斯墓志铭：“雅典人埃斯库罗斯，欧福里翁之子，躺在这里，周围荡漾着革拉的麦浪；马刺松圣地称道他作战英勇无比，长头发的波斯人听了，心里最明白。”参见[古希腊]埃斯库罗斯：《埃斯库罗斯悲剧六种》，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③ 如《剑桥古代史》第4卷中论“萨拉米斯战役与薛西斯的撤退”一节时所引用的文献主要来自埃斯库罗斯《波斯人》和希罗多德《历史》，参见John Boardman,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ume IV, Persia, Greece and the Western Mediterrane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569–588。

④ [古希腊]埃斯库罗斯：《埃斯库罗斯悲剧六种》，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5页。

⑥ Peter Burian and Alan Shapiro, eds., *The Complete Aeschylus, Volume II*,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45.

⑦ 罗念生：《古希腊罗马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0页。

⑧ 参见[美]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4页。

而言，这是一个“非常遥远而且经常充满凶险的他者”^①，这种西方自我与东方他者的形成正是“东方主义”建构而成的结果。除此之外，“《波斯人》中戏剧表述的直接性掩盖了下面这一事实：观众观看的是高度虚构性的表演，在此表演中，一个非东方人被转化为代表整个东方的符号”^②。因为在雅典的戏剧舞台上上演的《波斯人》不可能请波斯人去做演员，而只能是雅典人，此其一。《波斯人》中的人物如波斯长老、阿托萨、大流士的鬼魂以及薛西斯都是波斯人，他们在波斯王宫的对话如何能够为埃斯库罗斯所知？此其二。故此，萨义德认定《波斯人》是“高度虚构性”^③的表演。雅典人在雅典的剧场出演波斯人，这便将是西方人塑造成为东方符号的罪证，是非东方人（即西方人）“代表”东方人的铁证。这也正契合萨义德从马克思那里断章取义截来的那句话：“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④

再者，当波斯的信使告知众人波斯军队在萨拉米海战中彻底战败的战况时，戏剧舞台上的歌队（波斯的元老们）哀叹：“如今啊，全亚细亚都变作了荒凉，痛哭丧亡。哎呀，塞克塞斯劳师远征，哎呀，塞克塞斯败覆归来，他凭靠着海船，把一切事情都弄糟了。那善良的达勒俄斯，苏萨城爱戴的君主何曾做过这样的事？”^⑤这本是波斯元老们对希波战役中死去的波斯人的哀歌，结果这表达悲痛的哀悼被萨义德解读为“颂歌（ode）”^⑥，“亚洲通过欧洲的形象说话并且由于欧洲的形象才得到表述：欧洲取得了对亚洲——大海那边‘另一个’敌对的世界——的胜利。而给予亚洲的则是绝望、失败和灾难感，这似乎为此后东方对西方的责难种下了祸根；同时，对亚洲辉煌已逝的哀悼本身即是欧洲的胜利”^⑦，在“东方主义”的逻辑演绎之下，尽管在雅典的戏剧舞台上上演的是波斯（东方）元老们惶惶不可终日的哀歌，然则隐藏在悲歌之下的却是雅典（西方）胜利的“颂歌”，因为东方的失败正好彰显了西方的胜利，在东方的哀歌之下压抑不住的是西方的欢乐。

概言之，萨义德对《波斯人》的后殖民主义阐释颠覆了我们对《波斯人》的固有认知，通过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演绎，萨义德揭示了隐藏在《波斯人》中的一条关于“东方主义”的“真理”：“欧洲是强大的，有自我表述能力的；亚洲是战败的，遥远的。”^⑧由雅典人饰演的阿托萨就是“欧洲表述了东方”^⑨，埃

①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年版，第 28 页。

②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年版，第 28 页。

③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年版，第 28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67 页。

⑤ [古希腊] 埃斯库罗斯：《埃斯库罗斯悲剧六种》，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6 页。

⑥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1, p. 56.

⑦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年版，第 73 页。

⑧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年版，第 74 页。

⑨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年版，第 74 页。

斯库罗斯掌握了话语的权力,他“表述、激活并建构了自己熟悉的边界之外的另一个地域,如果没有这种表述、激活和建构,这一地域便会永远处于静寂和危险的状态”^①。故此,雅典剧场上的歌队与“东方主义”的学术机构属于一丘之貉,他们都使用了话语的权力掌控东方世界。

二、不同时代的两种“殖民”:古希腊与近代

按照学理逻辑,对文本进行后殖民批评的前提条件是文本中存在着殖民的事实,因为后殖民研究的对象是关于欧洲帝国的前殖民地的历史、文化、文学和话语模式。^②殖民活动是人类历史上常见的一种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古往今来的殖民活动在本质上完全相同。对埃斯库罗斯的戏剧《波斯人》进行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前提条件是:文本中存在殖民的事实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东方主义”意识形态。然而,古希腊时代虽然也有殖民行为,但这种古典时代的殖民和近代以来殖民的性质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这种区别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古希腊的殖民是农业殖民,其典型特征是“殖民者及其后代永居海外”^③,而近代的殖民是商业殖民和资本主义的扩张;第二,古希腊的殖民主体是城邦,而近代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体是民族国家,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组织形式。

大约在公元前两千年的环地中海区域,腓尼基人就已经在东部地中海、小亚细亚、塞浦路斯、黑海沿岸等建立了殖民据点。相比较于腓尼基人的殖民,古希腊的殖民活动要晚得多。大约在公元前一千年,希腊人开始与腓尼基人竞争,腓尼基人便向西地中海沿岸及海中岛屿殖民。希腊人的殖民特征是环海(地中海、黑海)而建城邦,因为“希腊的殖民运动是依靠航海的。它的范围受到腓尼基、伊达拉里亚、埃及等海上敌对势力的限制。殖民点靠着战胜了还未组成强国的土著居民而在岛屿或沿海岸的地带建立起来。当殖民点自己也要扩张时,它们就在相似的地方建立更多的殖民点”^④。故此,希腊人的殖民活动“主要出现在沿海和岛屿,极少在内陆”^⑤。东部地中海因有东方各国,所以他们仅仅在埃及、叙利亚建立商站,向南则到达利比亚、突尼斯,向西到达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南部沿岸,向北到达色雷斯。此外,他们通过赫勒斯滂海峡而进入普罗彭蒂斯海,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而进入黑海地区。参加殖民的希腊城邦据统计有44个,建立的殖民城邦至少有139个,这些广泛分布在西地中海、爱琴海、黑海地区的殖

①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74页。

② M. H. Abrams,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Boston: Heinle & Heinle, 1999, p. 236.

③ [德] 约翰内斯·哈斯布鲁克:《古希腊贸易与政治》,陈思伟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00页。

④ [英] N. G. L. 哈蒙德:《希腊史:迄至公元前322年》,朱龙华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62页。

⑤ [英] 莱斯莉·阿德金斯、[英] 罗伊·阿德金斯:《古代希腊社会生活》,张强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66页。

民城邦“就像蚂蚁或青蛙围着池塘在池畔居住”^①。

古希腊城邦开展如此大规模的殖民活动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主要是人口增加所造成的生存压力。“希腊早期的殖民运动是几个世纪以来移民活动迅速扩大的结果；其全部而唯一的原因就是人口过剩，结果母邦被迫将富余人员驱离出去。最根本的原因是粮食问题：在一块贫瘠而不适合庄稼生长的土地上，不可能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饥饿（而非商业野心）才是殖民运动的根本推动力。”^②此外，也有土地兼并导致部分农民破产不得不另谋生路，还有政治斗争中失败远走他乡等情况。^③值得注意的是，城邦的微小以及它本身拥有的战船数量之少，使这段殖民历史中“没有一个城邦能独立自主主宰海洋和建立公元前5世纪时所谓的‘海上霸权’”^④。尽管殖民活动中希腊人与原住民有冲突，但仍有一些殖民地与原住民建立了友好的关系，甚至出现种族混合的情况。^⑤

与近代民族国家相比，古希腊自始至终都不是“统一”的“国家”，而民族国家诸如西班牙、英国、法国等意味着统一的政权。此外，民族国家的边界和政治国家的边界是重合的，这意味着英格兰岛是英国人的，法兰西则是法国人的领地，而古希腊人与其他各种族则如同青蛙围着水塘一般围着地中海。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开始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就注意到希腊的非“统一”性：“在特洛伊战争以前，没有迹象表明全希腊有过任何共同的行动，这一地区也确实没有被通称为‘希腊’……经过很长时间以后，这个名称才通用于这一地区。”^⑥古希腊的城邦是典型的“小国寡民”，城邦数量虽然多，但各城邦人口有限，城邦之间虽然也会因为利害关系发生冲突，但彼此在政治上奉行独立。“即便是处于鼎盛时期的希腊城邦世界也不存在任何团结的概念；极度的分离主义思想决定着城邦的政治演进过程……古典时代希腊城邦最本质的特征是刻意追求独立自主……希腊世界不过是一个个各自为政的城邦。”^⑦

古希腊城邦奉行的是分离主义的政治原则，这与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发展趋势及旨趣截然不同。这也决定了古希腊的殖民活动与欧洲近代殖民活动存在着原则性的区别，即殖民地与原有母邦之间没有政治上的依附关系，新的殖民城邦一旦建立起来，就成为一个在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城邦，它和原有城邦的联系更多的

① 《柏拉图全集》（增订版）上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07页。

② [德] 约翰内斯·哈斯布鲁克：《古希腊贸易与政治》，陈思伟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99页。

③ 参见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87页。

④ [英] N. G. L. 哈蒙德：《希腊史：迄至公元前322年》，朱龙华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64页。

⑤ 参见[英] 莱斯莉·阿德金斯、[英] 罗伊·阿德金斯：《古代希腊社会生活》，张强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66页。

⑥ [古希腊]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译注修订本），徐松岩译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5～56页。

⑦ [德] 约翰内斯·哈斯布鲁克：《古希腊贸易与政治》，陈思伟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08～109页。

是文化上的某种认同。“希腊人的殖民点就是‘一个远离家乡的居处（apoikia）’。殖民者有‘殖民长’（oikistes）率领，并从母邦祭台上分取圣火以便在行新城邦奠基礼时应用。他们还从母邦承袭一整套宗教、政治体制，如宪法、历法、方言、字母等。新城邦变成了母邦的翻版。”^①新的殖民城邦与母邦之间的联系“集中在宗教和精神层面，而不是政治层面，更不是商业层面”^②。

与古希腊时代的殖民活动迥然有别的是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海外殖民，这是一段充满杀戮与驯化、剥削与掠夺的历史。从15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在近五百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改变了世界其他地区和人民的历史。西方的殖民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荷兰、比利时、德国、意大利等宣称拥有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所有领土、波利尼西亚的99%、非洲的90%、亚洲的50%。西方殖民国家占世界陆地面积的比例不到2%，却成为横跨地球的海洋帝国。它们将殖民者派遣到各个地区，在整个殖民地世界中传播基督教，将西方的语言、法律、制度、技术和价值观出口到全世界。这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扩张主义重塑了非欧洲地区的社会和文化形态。^③

公元16世纪前后，世界一体的进程真正开始。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使过去相互隔绝的状态被打破，欧洲的冒险家们从此走向宽广的海洋世界，开始对世界进行殖民征服的活动，欧洲的贸易也从地中海、北海与波罗的海的小范围扩展到全球，地理大发现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一展身手的新领域，欧洲国家殖民地的最初建立无一例外都是商业因素的推动。“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④在此历史进程中，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先后在海外建立大批殖民地。“在长达3个世纪的时间里，上述国家通过一系列严格的限制措施盘剥殖民地。17世纪和18世纪的殖民地是宗主国倾销国内商品和获取原材料的市场（希腊的殖民地并非如此）。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上述奉行重商主义的国家建立了殖民地，并最终形成了一个个殖民帝国。在人类历史上，还未曾爆发过重商主义时代那样大规模的殖民战争。”^⑤

如果说“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

① [英] N. G. L. 哈蒙德：《希腊史：迄至公元前322年》，朱龙华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65～166页。

② [德] 约翰内斯·哈斯布鲁克：《古希腊贸易与政治》，陈思伟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00页。

③ Thomas Benjamin, ed., *Encyclopedia of Western Colonialism since 1450*, Detroit: Thomson Gale, 2007, p. VIII.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⑤ [德] 约翰内斯·哈斯布鲁克：《古希腊贸易与政治》，陈思伟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97页。

态”^①，指向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欧洲各民族国家内部的变革，那么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②，指向的便是以葡、西、英、法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海外的殖民，而“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则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重点关注和批判的历史对象。

作为《东方学》的“续编”，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完全有理由去详细举证、分析、批判自古及今的西方文化中“东方主义”的“悠久传统”^③，以及古往今来西方与东方这两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④。然而，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前言中却说：“我在这里关注的只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现代西方帝国主义问题，我特别讨论的是作为文化形态的小说。”^⑤何以如此？萨义德为什么要对“东方主义”的所指进行自我设限？论者以为，萨义德的自我限制只能说明东西方的二元对立以及“东方从属于西方”并非从一开始就铁板一块坚实地存在着。例如，马克思在谈到“东方从属于西方”时是有其历史条件和前提的，这个前提条件便是资本主义时代，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近代殖民历史进程。换言之，那种认定东西方二元对立及“东方从属于西方”在古希腊时代便已存在的观念至多不过是对历史的臆测，是以现代的观念想象古典世界，从《波斯人》的字里行阅读出“东方不能表述自己”便是强行使用这种二元对立观及“从属论”对文本解读的结果。

三、“东方主义”的“滥用”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回归

就萨义德对《波斯人》的批评而言，部分论点过于吹毛求疵，例如他声称观众观看的《波斯人》是“高度虚构性的表演（a highly artificial enactment）”^⑥，问题在于历史永远不在场，我们又能去哪里寻找或还原彻底的真实呢？当然，《波斯人》中虚构的成分肯定有。如埃斯库罗斯提到波斯元老的悔恨时就是他的虚构：“全亚细亚的人民不再遵守波斯的王法，不再受国王的威迫前来进贡，不再伏在地下敬畏至尊；因为波斯的王权已经崩溃了。”^⑦这种虚构被研究者视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③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2页。

④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8页。

⑤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页。

⑥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1, p. 21.

⑦ [古希腊] 埃斯库罗斯：《埃斯库罗斯悲剧六种》，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7页。

“自吹自擂”^①是不为过的。而所谓的“一个非东方人被转化为代表整个东方的符号”^②，无非是指雅典人扮演了波斯的王太后阿托萨，但如果回到历史现场，我们能要求雅典公民去请一个真正的波斯人来演出吗？将阿托萨一人视为整个东方又是何种理由？仅仅因为她是波斯人吗？细究萨义德的这些非难和指摘，不难看出这种后殖民主义式的批评范式自身也有诸多漏洞。

在对文学文本进行后殖民主义批评之前，一件必须要做的工作是要对“东方主义”的运用进行批判性考察，即澄清其产生的前提，划定其运用的界限。对《波斯人》进行后殖民批评的方法论是“东方主义”，然则作为意识形态的“东方主义”的经济基础又是什么呢？即西方凭什么可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③，那便是近代殖民的后果。萨义德认为：“东方学不是欧洲对东方的纯粹虚构或奇想，而是一套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蕴含着几个世代沉积下来的物质层面的内含。”^④既然“东方主义”只是“几个世代”的沉积而不是自古以来的传统，那就意味着东西方二元对立思想观念的经济和政治基础是近代西方的殖民进程，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东方主义”的基础在于近代的殖民而不是古希腊时代的殖民。然而，萨义德在论证的过程中又将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与欧里庇得斯的《酒神的女祭司》纳入“东方主义”的体系中。当萨义德论证《波斯人》中波斯不能表述自己只能由西方表述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将形成于近代殖民基础上的“东方主义”向前推广到了古典世界。既然古希腊的殖民与近代西方的殖民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行为，那么这种推广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它超越了其产生的前提，突破了其运用的界限。

在区分了古希腊殖民和近代殖民的前提之下，我们可以判断那种认为《波斯人》中存在着东西方文化二元对立的观点是一种虚妄的理念，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的幻觉，因为这种“对立”不仅在文本中并没有清晰的表现，作为一种思想观念，甚至缺乏其应有的经济基础。在古代世界，东方和西方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而不是截然对立的。例如，关于波斯国王薛西斯的身份，埃斯库罗斯是这么说的：“他的祖先原是‘金雨’的结晶。”^⑤在埃斯库罗斯（或者雅典人）看来，薛西斯的祖先是珀耳修斯（Perseus），珀耳修斯是古希腊神话世界的英雄，他是宙斯化为金雨与阿尔戈斯公主达那厄（Danae）所生的儿子，而珀耳修斯的儿子珀耳塞斯（Perses）便是波斯一族的始祖。^⑥正因为如此，埃斯库罗斯才借歌队

① [美] A. T. 奥姆斯特德：《波斯帝国史》，李铁匠、顾国梅译，上海三联书店 2017 年版，第 328 页。

②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年版，第 28 页。

③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年版，第 4 页。

④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年版，第 9 页。

⑤ [古希腊] 埃斯库罗斯：《埃斯库罗斯悲剧六种》，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6 页。

⑥ Luke Roman and Monica Roman, *Encyclopedia of Greek and Roman Mythology*, New York: Facts On File, 2010, pp. 392-394.

之口唱出薛西斯是“珀耳修斯的后裔”^①的事实。论说源流，希腊阿尔戈斯地区与波斯彼此有亲缘关系，波斯王族与奥林匹斯神话有紧密的联系，这些都是雅典人认可的“事实”，东西方的二元对立并不是这一时代历史的真相，真相应该是彼时的地中海世界就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种族大拼盘”^②。希腊人与波斯人尽管不同，但这种差异性还不至于成为如“东方主义”所宣扬的那般截然对立，正如“希腊人经常会觉得和周围那些不说希腊语、生活习惯也不同的人们有疏离感，与波斯、迦太基的战争更将此种感觉凸显出来。尽管如此，他们从未将此种意义上的‘希腊性’转化为政治统一，而在公元前300年后，希腊人与外族人的差异更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③。

中国学者将“强制阐释”视为当代西方文论的“基本特征和根本缺陷之一”^④。形成强制阐释的重要原因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缺位，即这类理论的先行者与倡导者不能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处理问题。在强制阐释中，主观预设被视为强制阐释的“核心因素和方法”^⑤。萨义德对《波斯人》的阐释就是典型的立场先行，即在对《波斯人》进行分析批评之前，“东方主义”作为工具论已经前定先行，“东方主义”被明确为西方建构东方的本体论，也是西方认识东方的方法论，举凡来自西方作家群体（包括萨义德所言的诗人、小说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帝国行政官员等）的文本都不可避免地会浮现出“东方主义”的幽灵，这是来自西方的“原罪”。

萨义德完全明白“作为一个地理的和文化的——更不用说历史的——实体，‘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方和地理区域都是人为建构起来的”^⑥，同时也非常清楚“东方学来源于英法与东方——直到19世纪早期，东方指的实际上仅是印度和《圣经》所述之地——之间所经历的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⑦。也就是说，萨义德对“东方主义”建构的本质及建构的时间界限是明白无误的。然而，当他进入具体文本的时候，却又刻意模糊“东方主义”建构的时间界限，丧失了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中，他实际上已经将“东方主义”视为自有永有一般的存在，将“东方主义”视为所有西方文本的潜在特质或显在特征。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东方主义”的主观预设就位以后，对

① David Grene and Richmond Lattimore, eds., *The Complete Greek Tragedies: Aeschylu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9, p. 223.

② [美] 伊恩·莫里斯、[美] 巴里·鲍威尔：《希腊人：历史、文化和社会》，陈恒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③ [美] 伊恩·莫里斯、[美] 巴里·鲍威尔：《希腊人：历史、文化和社会》，陈恒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

④ 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⑤ 张江：《作者能不能死：当代西方文论考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70页。

⑥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7页。

⑦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6页。

文本的分析只不过是证明这一预设的准确性,批评的目的并非阐释文学文本,而是证明理论的正确。故此,对《波斯人》《酒神的女祭司》的批评成为典型的合目的性批评,理论家们可以从这些作品的字里行间解读出“东方主义”的内涵,为追求政治正确“努力在过去被奉为经典的死去的白种男性作家作品的字里行间找问题”^①,从如《波斯人》这样的文本中解读出文明的冲突。这种现象诚如国内学者所言:“批评不是为了分析文本,而是为了证明结论。其演练路径是从结论起始的逆向游走,批评只是按图索骥,为证实前在结论寻找根据。”^②

恩格斯在谈到德国的唯物史观时曾指出:“德国的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件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③这就告诉我们,论证《波斯人》中“东方主义”的前提条件和正确途径是从产生《波斯人》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中寻找证据,而不是抛开这一途径对《波斯人》预设理论立场。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差别时有言:“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④萨义德在讨论古希腊文学文本中的“东方主义”时摒弃了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他试图从古希腊时代中找到“东方主义”的历史范畴,从“东方主义”的观念出发阐释《波斯人》的思想主旨。概言之,萨义德对《波斯人》的理论评判既不是站在古希腊现实历史的基础之上,也不是从古希腊的历史实践出发进而得出结论。

在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的具体实践中,当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彻底丧失,其后果便是“东方主义”的滥用。表面上看,萨义德对《波斯人》的批评似乎是反“东方主义”的立场,因为他解读出的主题是亚洲不能表述自己,只能由欧洲来代表,但实际上,萨义德对《波斯人》的批评结论会形成两个结果。第一,按照萨义德批评《波斯人》的学理逻辑,东西方的二元对立自古希腊时代便已存在,这是萨义德抛开历史唯物主义原则,逆行推广“东方主义”的必然后果。如前所述,“民族国家的概念在古希腊根本就不存在”^⑤，“东方主义”是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崛起的产物,萨义德这种逆行推广“东方主义”的论证实际上是强化了“东方主义”的历史地基,完全忽视了形成“东方主义”的历史前提条件与历史基础。第二,按照萨义德的解读,《波斯人》中蕴含着东方和西方清晰对

① 孙惠柱:《谁的蝴蝶夫人——戏剧冲突与文明冲突》,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8页。

② 张江:《作者能不能死:当代西方文论考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7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4页。

⑤ [美]伊恩·莫里斯、[美]巴里·鲍威尔:《希腊人:历史、文化和社会》,陈恒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立、截然两分的态势，这容易遮蔽重要的历史观点，即西方文明的源头起源于东方。马丁·贝尔纳的《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之所以牵动欧美学界的中枢神经，就是因为其研究挑战了那种“将希腊视为本质上是欧洲的或雅利安”^①的非常“东方主义”的观点，萨义德的批评恰恰就是建立在希腊历史的“雅利安模式”之上的。萨义德或许未曾料到，当他以《波斯人》《酒神的女祭司》为例证开始对“东方主义”的源头进行揭露批判时，此种批判不仅未能达到揭示“东方主义”的目的，反倒是用《波斯人》《酒神的女祭司》等文本模糊了“东方主义”的历史视域，同时也遮蔽了雅典娜的“黑色血统”。凡此种种充分说明，人文学术研究不能任意脱离恩格斯所讲的“史学观点”。任何研究缺失了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谬误和偏见也就随之而生；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和“史学观点”，谬误和偏见自然随风而逝。

Does the Origin of “Orientalism” Begin with *Persians*?

—Investigation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Xu Zhen Pang Kaiyi

Abstract: American literary theorist Edward Said traced the source of “Orientalism” to the ancient Greek tragedy *Persians* which was written by Aeschylus, which he believed laid the theme of “Orientalism”: Europe is powerful and articulate; Asia is defeated and distant. The paper believes that “Orientalism” is based on western colonial activities in modern times. Colonization in ancient Greece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western colonial activities in modern times. The colonization of ancient Greece was agricultural colonization, and the colonial subject was city-state; the colonization of modern western countries was commercial colonization and expansion of capitalism, the colonial subject was nation-state. Said actually extended the “Orientalism” formed on the basis of modern western colonization to the ancient world while demonstrating the theme of “Orientalism” in *Persians*, the colonization of ancient Greece and modern western colonization are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behaviors, so his demonstration does not conform to historical facts. Therefore, Said’s post-colonial criticism of *Persians*

^① [英] 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第1卷，郝田虎、程英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7页。

transcends the premise of “Orientalism”, breaks the limits of its application and violates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Keywords: *Persians*; Oriental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责任编辑: 于少青]



动 态

为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贡献学术力量

——“习近平文化思想学术研讨会暨教育部重大课题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研究’成果发布会” 研讨述要

武文豪*

【摘要】2023年12月28日，由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人文社科研究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主办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学术研讨会暨教育部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研究’成果发布会”在山东大学召开。与会学者围绕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内涵、体系建构、理论价值、指导意义以及“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更好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等重要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并对教育部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研究丛书”进行评介，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学术性和创见性的思想观点，鲜明体现了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的学术自觉。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新时代的文化使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2023年10月7日至8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进程中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为加强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研究和宣传阐释，深入探讨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科学揭示新时代文化建设和文明发展的内在规律与实践路径，2023年12月28日，由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人文社科研究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主办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学术研讨会暨教育部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研究’成果发布会”在山东大学召开。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天津大学、湖南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人民

* 武文豪，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

出版社等高校和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山东大学师生代表近70人参会。与会学者围绕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内涵、体系建构、理论价值、指导意义以及“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更好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等重要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并对教育部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研究丛书”进行评介,提出了诸多富有学术性和创见性的思想观点,鲜明体现了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的学术自觉。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内涵和体系建构

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①我们加强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必须着重对其中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行学理化阐释和体系化建构,讲清楚其科学内涵和理论体系。基于此,与会学者聚焦新时代文化精神、文化主体性、“第二个结合”等议题进行学理探讨,并尝试对习近平文化思想进行体系建构。

第一,新时代文化精神的核心要义。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颜晓峰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问题,可以将体系结构、思想内容、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等作为深化研究的切入点。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关于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结构的描述,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启发。会议既对这一思想的“体”作了若干方面的概括,又对这一思想的“用”作了若干方面的概括。把“体”和“用”作为理论体系的概括,为我们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包括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新的启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应该理解为新时代的文化精神。可以说,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新时代文化精神的理论反映、理论结晶,这个理论反映、理论结晶概括起来就是文化自信、开放包容、守正创新。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新的文化使命”这一表述,新的文化使命是什么?可以说,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作了明确的表述。在这个明确表述中,我们需要认真思考三句话:一是继续推动文化繁荣,二是建设文化强国,三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第二,文化主体性的哲学解读。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贾英健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构建了体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要求的人民主体的本体论。主体性是一个关涉人与对象、人与自我关系的概念。人的主体性使其能够在与客

^①《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人民日报》2023年10月9日。

体对象的关系中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和活动目的,处理好自我与对象的关系,使自己的目的得到实现,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所说的主体性是在人的实践当中来把握生成的逻辑。文化的主体性尽管源于人类实践,但它形成以后就表现出超高的稳定性和持续的传承性,也表现为一种具有强大凝聚力和辐射力的群体价值取向,并且逐渐积淀为一个群体的精神文脉和文化之魂,对社会的个体和基于个体的社会具有越来越大的塑造功能。作为文化主体性的领导主体,中国共产党是以其先进性和对文化建设的全面领导为使命担当的。从人民群众主体性的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人作为文化主体发挥领导作用,无论如何都不能取代人民群众作为文化发展的主体地位,这是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的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已经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关于人民主体的历史观汇聚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并在百年奋斗中始终依靠人民群众,书写了包括文化主体性在内的历史主体性创造的崭新辉煌篇章。习近平总书记在充分肯定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民群众作为文化创造主体作用的时候,把这一思想进一步提升到了文化哲学本体论的高度,从文化与人、主动与被动、需求与供给、普遍与特殊、江山与人民等多重关系出发,构建了体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要求的人民主体的本体论,党和人民作为文化主体在双向成全的主体性创造过程当中完成了从实践主体性向文化哲学的本体论建构的理论升华。

第三,“第二个结合”的科学依据。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何中华深入解读了“第二个结合”的提出背景和科学依据。首先,“第二个结合”是确立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客观需要。新时代的事业和目标都与我们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息息相关,这种主体性来自哪里?主要来自最深沉的基础,来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果不确立主体性就没有办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这一语境下,我们必然触及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其次,“第二个结合”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发生历史性变迁的客观需要。近代以来,在漫长的救亡图存的探索中,特别是伴随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百年奋斗的辉煌成绩,国民的心态逐渐由文化自卑转向文化自信。正是这种文化自信,支撑起“第二个结合”。最后,“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深化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不断向未来敞开的过程。这个过程经过了语言转化、实践探索、理论创新和反思升华四个阶段。一是让马克思主义说汉语,这种语言转换本身就是中国化的重要步骤,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性规定;二是中国化、汉语化的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接受和掌握,诉诸自己的行动,这就进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阶段;三是在这个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对此进行反刍和升华,变成了理论的形态,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四是反思阶段,我们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内在机制和规律,以及它赖以实现的条件。在反思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

那就是怎样看待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

第四,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系建构。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商志晓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内容丰富、体系完整,具有内在的逻辑线索,可以从总论、分论、知论和行论等方面去把握。第一部分是总论,涉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整体性论述、要旨性理念。第二部分是分论,涉及一些事项性的论述、领域性的理念,包括科学理论武装论、思想政治教育论、意识形态工作论、核心价值工程论、哲学社会科学论、新闻舆论主导论、文化创作导向论、文化遗产保护论等。第三部分是知论,涉及一些说理性论述、阐释性理念,包括文化自信论、文化两创论、两个结合论、中华文明论、文化主体性论、文化交流互鉴论等。第四部分是行论,涉及一些践行性论述、操作性理念,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繁荣、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提升、人类共同价值倡导与人类文明形态创建等。这四个部分是有序排列、互相关联的整体,具有内在的逻辑线索,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基本架构。习近平文化思想仍然在丰富和发展之中,不是封闭停滞的,而是不断展开的,是科学系统的思想体系,其内容既相对稳定又不断更新。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①有鉴于此,与会学者围绕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以及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文化建设的战略选择、核心要义与实践进路等议题进行理论探讨,力求准确揭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第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国祚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在诸多方面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我们理解和把握“原创性贡献”,不能将其看作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而应当着眼于对前人理论的继承、丰富、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的“三个事关”的战略定位,即“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

^①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人民日报》2023年10月9日。

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对理论武装问题作出的“四个真”和“三个化”的重要论述，即“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深化、内化、转化”，关于文化自信作出的“三更”和“三最”的重要判断，即“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都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第二，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主任谭好哲重点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认为应当将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文化观点上的创新突破放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的坐标中深入探讨。首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史，其次是整个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史。我们着眼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去看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习近平文化思想进行一种历史审思和现实思考，会有更真切的理解。一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从人类文明进程的角度解决了文化的宣传教育问题；二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解决了文化发展中的人民主体地位问题；三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解决了文化发展的动力问题；四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文化发展的道路和路径上提出了创新性的观点，从中国文化自信的角度提出了“两创”论，从世界文化的发展角度提出了文明互鉴论；五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解决了文化发展的目标和方向问题，回答了文化向哪走、中国的文化向哪走、世界的文化向哪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思考的问题，他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的建构当中，文化的使命是什么？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同时要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人类文化的发展归根结底是要推动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发展。

第三，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文化建设的三维审视。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徐国亮全面论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文化建设的战略选择、核心要义与实践进路。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文化建设的战略选择，具有重要的系统性、关联性、社会性和国际性意义。其中，系统性意义讲的是文化建设是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关联性意义讲的是文化建设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因素；社会性意义讲的是文化建设是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的重要力量源泉；国际性意义讲的是文化建设是提升文化软实力、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文化建设的核心要义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化；是坚守中华文明立场，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文化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立足于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的文化；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是聚合了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文化；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文化。习近平文化思想指

导文化建设的实践进路包括：强基点，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抓重点，广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破难点，推进“第二个结合”，赓续中华文脉，推进理论创新与思想解放；稳原点，以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打支点，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握要点，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树亮点，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

三、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更好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①我们学习和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最终必须落实到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更好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上来。基于此，与会学者围绕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重点、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议题进行了探讨。

第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重点。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郝立新认为，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应当注重研究其理论精髓、理论品格、理论逻辑。一是理论精髓。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精髓集中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三句话，即文化自信、开放包容、守正创新。二是理论品格。习近平文化思想最鲜明的理论品格就是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三是理论逻辑。理论逻辑通常有几个概念值得我们关注。首先，理论主题是什么？其次，理论主线是什么？这是我们在逻辑上架构一种思想理论所必须明确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主题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再具体一点，就是“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我们要从宏观上把握这一主题，然后着眼具体论述，进一步研究文化的本质、文化的发展道路和路径等问题。主线就是围绕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实践，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是大的主线，这个主线怎么聚焦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

第二，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冉探讨了“古今中西”之争何以成为一个问题的历史逻辑，认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是相辅相成的。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即“器物—制度—文化”。以往学术史上的研究到这里基本就停下来了，这恰恰说明近代以来非常重要的共识就是解决文明的问题。文明绝对不是文化本身，文明问题的解决一定有赖于这个国家现代性的成长，也一定有赖于文

^①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明新形态的拓展。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的困惑是非常深的，陷入了一种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困扰，不断地在古与今、中与西之间作选择，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中西结合，都是在作这种选择。到今天为止，关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三次突破性的历史进展：第一次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第二次是毛泽东思想的诞生，尤其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确立，我们有了自己文化的主体性；第三次就是今天我们要再次挺立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这个文化主体性就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真正破解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古今中西”之争。这显然没有任何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因此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此破解“古今中西”之争。

第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孙来斌认为，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中华民族需要怎样的现代文明，怎样建设这样的现代文明，这是关乎中华文明发展走向、关乎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独特的文明性质、特定的时空属性，既是相对于世界文明、外国文明而言的，也是相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明而言的。那么，它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文明形态呢？首先，它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其次，它是西方文明的超越形态。今天，西方国家日渐陷入困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无法遏制资本贪婪的本性，无法解决物质膨胀、精神贫乏等痼疾。中国式现代化既充分吸收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因素，又克服资本主义文明的消极因素，同时增加了人民性、协调性、生态性等崭新因素，造就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超越西方文明的文明形态。最后，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崭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敢于打破过去社会主义实践中僵化过时的做法，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不断赋予科学社会主义以鲜明的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实践特色，创造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新的中国版本，创造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崭新文明形态。

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研究”课题研究概况

此次会议的一个重要环节便是对教育部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研究丛书”（以下简称“丛书”）进行公开发布。发布会上，课题组首席专家介绍了课题的研究情况，“丛书”出版方介绍了“丛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与会学者从不同维度对“丛书”进行评介，充分肯定“丛书”的学术价值和出版意义。

第一，课题的研究概况。课题组首席专家、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周向军作大会总结。他表示，此次会议邀请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集中探讨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对系统、完整、准确地

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有重要意义,为课题的最终成果提供了科学启迪和有益参考。他简要介绍了课题组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问题的长期研究和取得的成就。他表示,对文化问题的关注,我们最早承担了教育部的课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规律研究”,后来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大关系研究”,再后来承担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重大招标课题“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最后承担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攻关课题“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研究”。到结项为止,课题组成员共发表了120余篇学术论文,其中CSSCI来源期刊有60余篇,同时出版了十几部以博士论文为主要内容的学术专著。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将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

第二,“丛书”的出版之路。山东人民出版社编审李怀德详细介绍了“丛书”选题、编辑、出版等情况。一是“丛书”的撰写、修改、编辑、出版历经10年时间,可谓“十年磨一剑”。从2011年选题立项,到2017年提交稿件,前后五六年的时间,从2017年一直到2022年年底最后出版,前后漫漫十年,这样一套“丛书”对每一位作者和编辑来讲都是人生难得的一段记忆。概括起来,可以说是“一套‘丛书’,漫漫长路,筚路蓝缕,铸就精品”。二是“丛书”具有极其重要的出版价值。从选题到理念,“丛书”中的很多内容都能够与习近平文化思想相契合、融合、连贯,真正体现了学术研究的创新性、前沿性和前瞻性。三是“丛书”规模宏大,思想厚重。六本书接近300万字,历经五年的编辑,每一本书都经过了至少五六遍甚至七八遍的清样改动。鉴于“丛书”选题的重大性、内容的重要性,书中所引用的文字大都涉及经典著作和党的重要文献,编辑部对此进行了严格的校对。梅花香自苦寒来,经过这么多年的打磨,到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份惊喜。

第三,“丛书”的学界反响。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国祚认为,“丛书”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导向,又站稳了中华文明的立场,彰显了天下情怀,很好地坚定了文化自信,秉持了开放包容,坚持了守正创新,体现了学者孜孜以求的追求、志向、责任、担当,非常值得祝贺。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颜晓峰认为,“丛书”的出版发行为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基础性、学术性支撑的研究成果。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商志晓认为,“丛书”内容丰富、体系完整、探析深入、思考缜密,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方面具有开拓性、标志性,对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在认识上和思维上具有引领性和指导性。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郝立新认为,“丛书”研究基础深厚、研究视野开阔、研究内容创新,体现了多视角多学科的交叉,能够从多方面给人以启迪。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孙来斌认为,“丛书”内容丰富、逻辑严谨、思想深刻,具有标志性、系统性、基础性和引领性。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冉认为,“丛书”彰显厚道与厚重,正

是因为坚守“为天下储人才，为国家图富强”的初心使命，才能秉持厚道、大爱的学术品质；正是基于山大厚重的哲学社会科学底蕴、齐鲁大地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的系统性突破。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主任谭好哲认为，“丛书”聚焦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基础性、前沿性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学术思考，具有厚重的学术含量和理论分量。

Contribute Academic Strength to Shoulder the Cultural Mission of the New Era

—Summary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Culture Academic Seminar and the Major Project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

Wu Wenhao

Abstract: On December 28, 2023, the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Culture Academic Seminar and the Major Project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 was held at Shandong University, sponsored by the School of Marxism, the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Institute of Marxism. The attending scholars conducted in-depth discussions on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theoretical value,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culture, as well as important topics such as using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culture as a guide to better shoulder new era’s cultural missions. They also scientifically reviewed the phased achievement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major research project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Series of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a series of academic and innovative ideas have been put forward, which clearly reflects the academic consciousness of shouldering the cultural mission of the new era.

Key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Culture; The Cultural Mission of the New Era;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责任编辑：靳贺]

论点摘编

一 “驾驭资本”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思考

郝 戈

进入新时代以来，党的创新理论回应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国与世界的文明发展问题，并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主题。而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与伟大创新，关键在于科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对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的扬弃与超越、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于西方式文明形态的借鉴与超越，尤其是如何正确看待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如何合理驾驭资本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并不是要彻底否定或抛弃资本，而是要合理地驾驭资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是社会主义合理驾驭资本的前提。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是资本一般本质和普遍规律的纯粹形式、典型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表现出受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的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中国式现代化自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将对资本一般本质和普遍规律的科学认识，践行和发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驾驭资本的创造性实践之中。驾驭资本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方面，是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现代化一般规律与中国特色相统一的重要实践路径。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2023 年第 12 期）

二 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创新理路、理念与重大理论成果

刘红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使命引领、守正创新，从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解决大党独有难题、跳出历史周期率高度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创造性地将现代治理理念、系统观念、辩证思维运用到管党治党之中，紧紧围绕“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命题与党的建设的主题主线进行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深化了对党的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新时代，党的建设理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具有相辅相成性。概括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对党的建设进行系统规划，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形成新时代党的全面领导理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形成党的自我革命理论，提出与推进依规治党、形成依规治党理论，这五个方面是理念、理论、制度与方式方法的有机统一，集中体现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具有开创意义。

（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10期）

三 列宁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丰富内涵及其当代价值

苑秀丽

在19、20世纪之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背离、攻击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时代背景下，在俄国深受错误思潮影响的背景下，列宁捍卫和坚持并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结合俄国革命和建设实践，阐发了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新结晶。列宁以其理论发展、组织活动及实践创造开创了俄国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新时期。列宁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经历了五个历史时期：提出组建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时期，创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时期，推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时期，十月革命胜利后确立和巩固党的领导时期，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推动制度建设时

期。列宁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内容丰富、科学系统，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理论为指导，创建、发展和完善党的领导。新时代，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中国共产党更加团结统一。

（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 年第 12 期）

四 新的文化生命体：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考察

张 梧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经由“第二个结合”而造就的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第二个结合”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承担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必由之路，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原创性贡献与标识性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与生动典范。立足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有助于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的历史必然性与世界历史意义。在世界历史展开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体现了“非资本主义”属性，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相契合之处。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有“前资本主义”属性，亟待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激活，也为马克思主义提供文化土壤，这正是二者的互相成就之处。进入世界历史后，“第二个结合”破解了如何在经济社会相对落后、资本主义基础薄弱的古老中国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之谜”。当前世界历史正在发生重大转变，马克思主义的“再中国化”旨在实现“再现代化”，即合理扬弃资本主义现代化，在资本主义的文明限度上重新定义现代化，此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

（摘自《哲学研究》2023 年第 11 期）

五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创造性发展

戴木才

一般而言，所谓“现代化”，是指以工业革命和科技创新为发展动力，以现代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为依托，以工业化、市场化、民主化、城市化、个体化、

绿色化等为标志，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发展进步的社会化过程和状态。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化发展阶段，首先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的，形成了所谓的“西方式现代化”。唯物史观认为，西方式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本质决定了其被超越的历史必然性。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性地实现了从西方式现代化的资本本位到人民本位的制度置换，创造性地实现了对西方式现代化的本质超越。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性地建构了以共建共享、历史主动、和平发展、命运与共、合作共赢等为丰富内涵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路径，从而超越了以逐利本性、自发生成、丛林法则、全面扩张、唯我独霸等为主要内容的西方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和发展路径，走出了一条现代化发展的新道路，创新发展丰富了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为世界现代化理论作出了创造性贡献。

（摘自《哲学研究》2023 年第 12 期）

六 “第二个结合”形成的历史逻辑

冯继康

“两个结合”的理论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新格局，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其中，“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表明我们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第二个结合”的提出经过了一个长期的、连续的过程。近代以来，民族危机深重，一些进步知识分子逐渐从被动接受西方文化转变为主动向西方文化学习，并在这一过程中坚持中华文化主体性。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代表旧制度和旧文明的传统文化基本持批判态度，毛泽东则主张将中华民族历史遗产和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化用到自己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中，为我们党正确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基本遵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提倡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把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推进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最终提出“第二个结合”的理论。

（摘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4 年第 1 期）

七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概念的源流考释与话语创新

齐道新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概念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代文明”追求，萌发于中国共产党早期“青春之文明”构想和对“俄罗斯新文化”的向往，是在文明反思与抉择中生成的以马克思主义关切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新型概念表达。作为中国共产党文明话语体系极具标识性的新型概念表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概念的生成与形塑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表征了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过程和意蕴。新启蒙运动后，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澄明对待中西文明的正确立场，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高度现代文化”锚定了自身文明追求；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持续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和“西化”思潮，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指明中华文明“向前”的方向；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语境中坚持守正创新，以“第二个结合”创新方法论正式提出并全面形塑了这一重大原创性概念。“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概念是在古今中外对比和守正创新中对自身文明发展作出的创新标定，具有“术语革命”的理论想象力和实践引领力，支撑了新时代“文明”话语、“文化”话语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话语创新。

（摘自《科学社会主义》2024 年第 1 期）

八 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母体”资源

刘同舫

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是与西方传统文明视野中的世界文化格局存在根本区别的新型理论范式，致力于超越传统交往模式下的利益共同体并塑造以文化多样性共存共荣为根本追求的精神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基本“母体”始终是萦绕在其深处的理论眷注，即人的生存发展和世界文明互相融合进步的主题，具体表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丰富内容。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文化构建实现自身思想体系的丰富完善和新型文明体的塑造，其前提性问题是现代理论语境中澄清思想的理论根基，这

指向文化构建的“母体”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儒家大同社会理想赋予其“天下为公”的胸怀，仁爱精神的文化基因更是凸显出人民主体意识与和谐相处之道。形成于特殊历史时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内蕴启蒙、包容、科学、自由和民主的思想理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提供了具有人类文明普遍意义的智识资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可追溯到“世界人民大团结”的价值理念，其从权力话语、制度话语和发展话语多重维度标识出社会主义中国对人类解放的责任与担当。

（摘自《山东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

九 Understanding China's Road to Common Prosperity: Background, Definition and Path

Shiyun Li

China's ambition to realize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the people has received worldwide attention since its complete victory over extreme poverty in 2020. This paper summarize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who, what, when and how” that essentially characterizes common prosperity, i.e. common prosperity is prosperity for all the people, is prosperity in all aspects, means step-wise prosperity and calls for joint contribution, and clarifies that it is not equivalent to “becoming rich at the same time” or “being equally well off”, nor is it the same thing as egalitarianism. Pursu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is not an easy task and faces several challenges, including the development challenge, the distribution problem and the issue of public products supply. At present, China's modernization has entered its ‘second half’, and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and development goal of China's road to achieve that. Emphasizing both efficiency and equity as the principle i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Chinese people are speeding up their new journey toward common prosperity by comprehensively practicing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of being ‘innovative, coordinated, green, open and sharing’. Possible solutions may be foster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ptimizing income distribution, strengthening the social safety net, achieving effective digital governance and promoting high-level opening-up.

（摘自 *China Economic Journal*, No.1, 2023）

十 The Chinese Reception of Western Marxism: From Wary Onlookers to Confident Participants on the World Stage

Roland Boer

This study presents an analytic overview of forty years of study of Western Marxism by Chinese scholars. Organised into four main sections, it begins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wider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this Chinese research. Here, I deal with the beginnings of research on Western Marxism in China and outline the two main periods of this research, which turn on the important educational reforms of 2005. The next section focuses on the initial period of research on Western Marxism, from the early 1980s to the education reforms, which may be characterised in terms of the work of “wary onlookers” writing introductions and surveys of Western Marxist scholars. The following section covers the last two decades after the 2005 education reforms. This period is of most interest, so more attention is devoted to developments during this time. It has been a time of increasingly confident participants on the world stage, who focus on core issues, realistic demands, and problem-based research. The final section concerns assessments of the limitations of Western Marxism, which have been identified through the in-depth research of the second period. In conclusion, while Western Marxism may be seen as a legitimat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a capitalist context, it is a tributary from the mainstream.

(摘自 *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1, 2024)